炎黄春秋

99/11
总第92期

■『发展才是硬道理』之我见

■毛泽东评赞习仲勋

■晋西事变中的薄一波

■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

■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第一步

■林则徐澳门巡阅记

邓小平会见马万祺

“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在京举行

由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中国藏学中心、中国社科院民族研究所和中央民族大学民族学研究院联合举办的“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9月16日至17日在北京举行。长期从事少数民族工作的领导干部和民族问题研究的学者五十多人与会。

与会学者就中华民族起源与多元一体格局的形成和发展、各民族在中华文化发展过程中的地位和作用、炎黄文化在中华民族长期发展过程中的凝聚力和核心作用、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格局的发展和巩固对维护民族团结、实现祖国统一和现代化的意义等问题，各抒己见，畅所欲言，交流成果，共同提高。他们认为，民族问题，本质上是文化问题。源远流长的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是我们团结国内各民族、增进民族自信心、增强民族凝聚力的最有力的纽带。

上图：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会长费孝通讲话

左图：黑伯理（右二）、李宝光（右一）、冯征（左一）、郝时远（左二）在学术讨论会上

下图：“炎黄文化与中华民族”学术讨论会会场

目　录

炎黄春秋

专　稿

2 "发展才是硬道理"之我见……孙代尧

春秋笔

4 晋西事变中的薄一波……余广人
14 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王若水

英杰谱

20 毛泽东评赞习仲勋……汤　洛执笔
26 抗联老战士陈雷、李敏的故事……姜　国　谢中天

陨星篇

30 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中共代表刘鼎……王光远

时代风

34 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薛攀皋
38 乡村民主化的第一步……辛秋水
40 用现代科学探索中医疗法的辛随成博士……徐玲玲

赤子心

42《歌唱祖国》作者王莘风雨五十年……陈哲源

同心结

44 为中美友谊奔波终生的罗森夫妇……高　梁
48 莲花区旗即将与五星红旗一起升起……宁　军

群言堂

50 鼓励记者讲真话……杜导正
52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钱理群

古今谈

60 谈韬晦……官伟勋
64 林则徐澳门巡阅记……邱远猷
57 包拯千年诞辰纪念存疑……李　邮

遗闻录

68 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马龄国
70 一个革命家庭与反革命家庭的恩恩怨怨……浩　望

九州景

74 台湾探亲……戈　金

文荟园

25 庐山上看唐伯虎的《庐山图》……田　萍
78 豫剧名旦赵晓梅……鲁　煤

顾问(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朝闻　杨静仁　赵朴初
胡絜青　费孝通

特邀编委(以姓氏笔画为序):
王俊义　冯　征　冯其庸
刘颖南　李　庄　李　普
李学勤　吴　象　苏双碧
张　锲　张国琦　凌　云
韩劲草　廖盖隆　穆　青
戴　逸　魏久明
社长(法定代表人):杜导正
副社长:
方　实　宋文茂(常务)
徐　孔　程理嘉
执行主编:
刘家驹　舒元璋　吴　思
理 事 长:杜导正
副理事长:陈　渊
理事单位:
深圳市亚大实业发展有限公司
秘 书 长:徐　孔
法律顾问:程振勇

中华炎黄文化研究会主办
中国标准刊号:CN11-2581/K
国际标准连续出版刊号:
ISSN1003-1170
社址:北京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电话:64072452　84020890
　　84020891
印刷:丰润县印刷有限公司
国内总发行:北京报刊发行局
国内邮发代号:82-507
订购处:全国各地邮局(所)
国外总发行:中国国际图书贸易
　总公司(北京399信箱)
国外发行代号:1274M
网络电子版全球总代理:
　龙源网上书店
网址:www.dragonsource.com
　　gb.dragonsource.com
　　www.qikan.com
出版日期:每月4日
广告经营许可证:
　京西工商广字0079号
定价:4.80元

“发展才是硬道理”之我见

● 孙代尧

把中国发展起来，使中华民族立于世界强大民族之林，是邓小平终身追求的理想和毕生奋斗的目标。晚年他在南方谈话中把它凝聚为一句话：“发展才是硬道理。”这个贯穿在邓小平整个理论之中的重要命题，具有丰富的内涵。

1 邓小平站在时代的高度，通过对战后时代主题转换的敏锐把握和对时代特征的科学分析，提出了和平与发展是当代世界的两大主题的科学论断。邓小平认为，在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中，和平是发展的条件，没有一个和平 国际环境就难以集中心思发展经济；而发展是实现和平的根本出路，“越发展和平力量越大”，因此发展问题或者说经济问题是核心。

邓小平把中国的发展与世界的和平与稳定联系起来，指出第三世界国家中人口最多的中国，是世界和平力量发展的重要因素。“从政治角度来说，中国的发展对世界、对亚太地区的和平和稳定都是有利的。……等到中国发展起来了，制约战争的和平力量将会大大增强。”这就是说，中国加快发展起来，本身就是对世界和平与稳定的重大贡献。邓小平清醒地看到，中国是一个大国，它应该起更多的作用，但现在力量有限，名不副实。如果我们国家发展了，更加兴旺发达了，我们在国际事务中的作用就会更大。邓小平满怀信心地认为，中国只要实现了自己的发展目标，就会对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可见，“发展才是硬道理”是一个带时代性和国际性的命题。

应当看到，和平与发展这两大问题至今一个也没有解决，特别是最近的科索沃事件表明，国际上自恃实力优势的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依旧猖獗，世界并不太平。但是，世界要和平，国家要发展，社会要进步，经济要繁荣，生活要改善，已是世界各国人民的普遍要求，不能因为霸权主义的挑衅而对当今时代主题产生不正确的判断，干扰我们的中心工作。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只有更加奋发图强，发展自己，增强综合国力，才能有力地回应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的挑战。

2 以开放的眼光，从比较中充分认识到中国同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的发展差距，清醒意识到我们搞的社会主义是“不够格”的社会主义，是邓小平下定决心实施改革开放，提出有中国特色的发展理论的历史起点。

邓小平复出工作后，从 1975 年到 1979 年五年间，先后出访了法国、日本、泰国、马来西亚、新加坡、美国等发达国家和新兴工业化国家，亲身体验了欧美资本主义发达国家和我们周边几个中等发达国家的发展状况，在比较中对中国的落后状况有了更清醒、更深切的认识，从而更加增强了加快我国发展的紧迫感。

1978 年 5 月，邓小平在谈到他准备在全军政治工作会议上的讲话内容时说：“我们的脑子里还都是些老东西，不会研究现在的问题，不从现在的实际出发来提出问题，解决问题。这样天天讲四个现代化，讲来讲去都会是空的。”

1978 年 9 月 12 日，邓小平在朝鲜访问时对金日成说：“我们一定要以国际上先进的技术作为我们搞现代化的出发点。最近我们的同志出去看了一下，越看越感到我们落后。什么叫现

代化？五十年代一个样，六十年代不一样了，七十年代就更不一样了。”

1978年10月22日到29日，邓小平应邀访问日本。访日期间，邓小平参观了丰田、松下等现代化企业，也走进了普通的日本工人家庭，亲身感受了日本高度发达的科技水平和日本国民的富裕生活，并对之赞叹不已。日产汽车工厂每名工人一年生产94辆汽车，而我国最先进的长春汽车厂，平均每名工人却只能生产1辆汽车。邓小平说：“我懂得什么是现代化了。”

在邓小平出访前后，一个又一个被派往西欧发达国家的中国高层考察团收集了大量的新信息，打开了新思路。年底，中央和邓小平最后下定了对外开放的决心，并在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上确立了以经济建设为中心，实行改革开放的战略决策。

直到1992年初南巡谈话时，邓小平还谆谆告诫：“抓住时机，发展自己，关键是发展经济。现在，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发展比我们快，如果我们不发展或发展得太慢，老百姓一比较就有问题了。”只有发展起来了，人民才能从内心里拥护社会主义，才能说服那些不相信社会主义的人们相信社会主义。

中国面临的问题千头万绪，对外要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维护世界和平，对内要尽快提高人民的生活水平，还要实现国家统一。解决所有这些问题的关键都要靠自己发展起来。

1989年春夏之交的政治风波和苏联及东欧剧变过后，邓小平在总结经验教训时得出的一个主要结论就是：不解决好发展问题，社会主义就坚持不住。中国如果没有十年高速经济发展的成果，人民没有从发展中得到实惠，“六·四”这个关我们就闯不过。世界上一些国家发生问题，从根本上说，都是因为经济发展上不去，长期过紧日子。“人民现在为什么拥护我们？就是这十年有发展，发展很明显。……这不只是经济问题，实际上是个政治问题。”

3 1979年11月，邓小平在与我国学者的一次谈话中曾讲到：“中国六十年代初期同世界上有差距，但不太大。六十年代末期到七十年代这十一二年，我们同世界的差距拉得太大了。”60年代后中国与周边一些国家和地区经济差距逐渐拉大的一个重要原因是，这些国家和地区抓住了战后西方发达国家产业结构调整和转移带来的发展机遇，果断实施出口导向的发展战略，在很短的时间里实现了经济起飞。而中国由于种种原因，没有能够把握住这次历史机遇。从70年代末才抓住发达国家新一轮产业结构和产品结构调整的有利时机，果断实施改革开放政策，使经济走上了高速发展的轨道。

80年代末90年代初，面对复杂多变的国际形势，邓小平再次反复强调要利用机遇，把握机遇，不可错过机遇，以实现发展。当苏联、东欧国家发生剧烈动荡，国内一些人或者产生了悲观情绪，或者觉得事态严重，想要收缩对外开放的范围的时候，邓小平以其远大的目光和深邃的历史洞察力，预见到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1990年3月，他在一次谈话中说：“世界上矛盾多得很，大得很，一些深刻的矛盾刚刚暴露出来。我们可以利用的矛盾存在着，对我们有利的条件存在着，机遇存在着，问题是要善于把握。”“现在世界发生大转折，就是个机遇。人们都在说‘亚洲太平洋世纪’，我们站的是什么位置？……我们不抓住机会使经济上一个台阶，别人会跳得比我们快得多，我们就落在后面了。要研究一下，我总觉得有这么一个问题。机会难得呀！”邓小平一再向中央建议，力争隔几年上一个“台阶”，广东等条件较好的地区还要争取用十年左右的时间赶上亚洲“四小龙”。在南方谈话中，他还在强调：我就担心丧失机会。不抓住机会，时间一晃就过去了。发展机遇稍纵即逝，丧失时机，犹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我们又站在了新世纪的门槛前。“世纪”本来纯粹是一个计算年代的单位，但世纪转换往往成为历史转折的重要关头。现在，20、21世纪之交正好又面临着历史的重大变革：知识经济和经济全球化、网络化滚滚而来。这一变革对每个经济体参与全球竞争以提升自己赋予了难得的机遇，也提出了尖锐的挑战，如果掌握不住“冲浪”的本事，就会被越来越激烈的竞争所淹没。

（责任编辑：刘家驹）

晋西事变中的薄一波

● 余广人

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的阎锡山，想起了被山西两次通缉的薄一波

1932年阎锡山东山再起，重新掌握山西军政大权以后，虽然他与蒋介石的争斗告一段落，并貌合神离地相处着，但他知道，蒋介石吞并山西的想法一直没有改变。3年以后的1935年，在一种错杂的形势下，阎锡山明显地感到"土皇帝"的交椅不太安稳了。

这一年，侵华日军策划的华北"自治运动"，不但与阎锡山独占山西、发展山西阎记官僚资本的利益发生了冲突，而且已将山西纳入到了"侵略华北之计划"，亡国亡省的危险就在眼前。

尽管阎锡山是在日本毕业的，并一直与日本保持着良好的关系，但是，在日本的铁蹄要叩响山西的大门的时候，如果与日本妥协，不但不能保持山西的安全，还有可能成为遭人唾骂的汉奸。"倾巢之下，安有完卵"，这个道理他是知道的。

蒋介石怎么样？面对着日本的威胁，阎锡山开始整理军备、修建防务工事对付日本时，"曾数次电请中央，将晋绥军队与国家财政统归中央统一"，希望蒋介石给予经济上的援助。阎锡山此举当然有乘机扩充自己的势力的念头，但毕竟考虑的是抗日的问题。但此时蒋介石仍在推行"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对阎的要求不但置之不理，反而数次催阎出兵陕北，剿灭红军。阎锡山认识到，拥蒋是没有出路的。但蒋毕竟是中央，他只能表面拥蒋，实际拒蒋。但是"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山西抵抗不了，蒋介石也抵抗不了，怎么办？"他把目光转向了共产党领导的红军。

对于共产党，以阎的本性而言，是绝对敌视的。但是，此时共产党所倡导的抗日主张，在东征过程中的大力宣传，扩大了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影响。共产党要求援绥抗日、实行对日武装作战的主张，与阎锡山保卫晋绥的目标有共同之处。在蒋介石频频催促他出征陕北之时，他已明确地意识到，借助共产党的力量保卫山西也许是一条比较好的计策。于是，阎锡山想出了一条"变通"的策略：请一位坚决抗战又有号召力的共产党人，但是不以共产党员的面貌出现，而是以山西抗敌救亡活动家、组织家的面貌出现；采取共产党的进步措施和主张，但是提法上要换成"山西话"，组织上戴阎锡山的"帽子"即官办团体的"帽子"；借助共产党的政治影响、做法，但又打着山西的旗号——扩充实力，应付危机，渡过难关。阎锡山认为，这样既可以把群众发动和组织起来，抵抗日本的侵略，赢得爱国的名誉，又可为将来与日本谈判增加筹码；既可顶住蒋介石吞并他的企图，又可保存和发展自己

的实力；既可同共产党搞好关系，又可在合作中交一些共产党朋友，借以提高自己的身价。这就是他所谓的“配为、当为、能为三者合一”的万全之策。他说：“现在是八仙过海，各显神通的时候，就要看谁能制服谁了。”后来，薄一波曾在一次会议上对他的这种做法作过这样的形容：“阎锡山是在三个鸡蛋中间跳舞，哪一个也不能碰着。”

阎锡山在作出这样的策略的时候，人选也早已考虑好了，那就是曾在山西两次被通缉的同乡薄一波。

而此时的薄一波，还在北平草岚子监狱里。

1936 年 8 月下旬，阎锡山派郭挺一到北平狱中找到薄一波说：“阎先生派我来营救你，带来了活动经费和给宋哲元的信，请宋帮忙。另外，阎先生还有信带给你。”当时，我们党也在营救薄一波等同志出狱。所以，薄一波兴冲冲地告诉郭，不必营救了，自己马上就要出去了。郭将这一情况电告阎锡山后，阎立即发来一份电报，要郭转给薄。电报大意是：目前山西形势危急，“希望一波兄回晋，共策保晋大业”。而作为共产党的领导干部的薄一波，对此并不动心。他对郭说：“共策保晋大业云云，你做可以，我不适合。我在外边搞了这么多年，在山西又曾两次被通缉。对阎锡山这个人，我不感兴趣。”

但是，薄一波出狱后，与接头人徐冰谈起这件事后，徐冰报告了北方局的领导人、化名胡服的刘少奇时，刘少奇对此很重视，第二天就让徐冰找到薄一波。徐冰转达了刘少奇的指示：“当前党的任务是：组织抗日民族统一战线，联合全国各党、各派、各军、各界一致抗日。北方局刚刚收到陕北来电，毛泽东同志在电报中提出，阎锡山等华北六省市军政负责人处，‘一有机会，即须接洽。统一战线以各派军队为第一位，千万注意’。这样的机会我们找还找不到，现在阎锡山找上门来，你却拒绝不去，是不是还有一点‘左’倾关门主义的顽疾？‘左’倾关门主义就是不懂得要善于把公开工作同秘密工作相联系，把合法斗争同非法斗争相联系，把上层统一战线工作同下层统一战线工作相联系。过去我们就是吃了‘左’倾关门主义的亏，使白区党的工作受到重大的损失。”很显然，刘少奇坚决主张薄一波到山西，与阎锡山开展上层统一战线工作。

1939 年任山西决死一纵政委的薄一波

而薄一波对此是犹豫的，他请徐冰报告刘少奇不愿回山西的理由：“我在狱中读过共产国际七大的全部文件，其中季米特洛夫的报告最感人；还读了共产国际十三次委员会各位委员的发言。这两次会议都是反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对照我长期在白区做军运工作的经验教训，我对‘左’倾关门主义的危害深恶痛绝。中央瓦窑堡会议的决定，我在狱中也认真学过，反对‘左’倾关门主义，我是坚决的。不过，我不去山西有自己的理由。并不是因为我做党的秘密工作已经多年了，不熟悉上层社会的人情世故和待人接物，不适合到那里工作。主要是不愿意和

阎锡山这样的人共事，何况郭挺一已经知道我仍是共产党员。”

刘少奇对薄一波的理由并不理会，他让徐冰给薄一波下了命令：“去也得去，不去也得去。彻底转变我们过去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学习和创造新的斗争方式与工作方法，这是新形势向我们提出的要求。不会就学，到工作中去学。阎锡山正因为知道你是共产党员，才会对你这样欢迎嘛。”

薄一波对毛泽东刚来的电报指示和刘少奇的考虑是完全领会的，况且党的决定，作为一名党员是没有二话可说的。在征得刘的同意后，薄一波到山西实地考察了40天左右。在考察过程中，薄一波将山西的情况全摸得清楚了，对在山西开展工作心中有了底了：“按照党所提出的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方针来衡量山西的情况，觉得不但可以做工作，而且大有文章可做。”

1936年10月下旬，薄一波正式赴晋工作。离开北平时，徐冰传达了北方局对开展山西工作的指示：(1) 这次到山西去，首先要争取站稳脚跟。不要搞“左”倾关门主义和空谈主义，不要提阎锡山根本不能接受的口号，不要怕到上层机关去和戴“官办团体”帽子。(2)要踏踏实实地做群众工作，发动群众，组织群众。不做“清客”，不“抬轿子”，要争取抗日民族革命的领导权。(3) 由薄一波、杨献珍、韩钧、董天知、周仲英五同志组成中共山西省公开工作委员会，只作公开工作、合法工作。这个组织绝对秘密、不对外。可开会，也可不开，因为阎锡山请的是薄一波，实际上就是通过以薄一波的名义来进行工作。公开工作委员会直接受北方局领导。同时成立山西省临时委员会，由张友清任书记。党的公开工作和秘密工作完全分开。

刘少奇还特别交代：“一波同张友清是一块从草岚子监狱出来的，互相很熟悉，无话不说。从现在起再不能发生横的关系，各搞各的，薄搞薄的，张搞张的。张做秘密工作，省委名义是公开的，可以发文件、开会。公开工作委员会不能发文件，也不必开什么会，就是由薄一波在那里领导。”

薄一波一行5人在11月3日到达太原，阎锡山的代表梁化之、郭挺一已在火车站迎接。第二天，阎锡山就将薄一波请到省政府“东花园”赵戴文的参事室进行会谈。曾经做过薄一波的老师的赵戴文和薄的高小同学梁化之陪同。对于这次谈话，薄一波回忆说：

见面稍事寒暄之后，我就开见山地说：“这次能回来在阎先生领导下做点事情，很高兴。山西对我有两道通缉令……”梁化之马上打断了我的话，半开玩笑地说：“现在不‘通缉’，不就请到了吗？”……阎对我也是心中有数的，特别是知道我是真共产党员之后，更是高兴，所以谈得非常之好，无拘无束，而又严肃认真。我说：“我愿意在阎主任领导下工作，是做工作，不是做‘清客’。按咱们家乡（阎和赵是五台人，我和梁是安襄人，我家和阎家、梁家又是邻村）的话说，‘先小人，后君子’，把丑话说在前面。有几点情况我想需要说清楚，然后好共事。第一，我参加共产党多年，可以说是定型了，说话行事总离不开共产党的主张，希望得到理解；第二，我只做抗日救亡工作，对抗日有利的事情都做，不利的事情都不做；第三，在用人方面要给予方便，对我用的人要保障安全，其中会有不少是共产党人。”阎一一表示同意。赵插了一句：“一波，道理全都你占了，我也提一条：在山西省政府里、军队里，你不能发展共产党的组织。”我回答：“可以保证不发展。”有意思，这同北方局对“公开工委”的决定恰好一样。这个“约法三章”，为我们以后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合法的依据。我们和阎锡山建立的特殊形式的上层统一战线，就这样开始了。

这次谈话后，赵戴文和梁化之似乎有点不太满意，觉得阎锡山太倚重薄一波了。而阎锡山对此却不在意：“现在抗日是第一等好事，就得用第一等好人去做。”

戴阎锡山的“帽子”，说“山西话”，执行的却是共产党的主张。

在薄一波到达山西的同时，中共中央也在积极地作阎锡山的统战工作。毛泽东派彭雪枫，作为与阎锡山联系的代表，并数次致电阎，阎也

作出了积极的回应。中共中央与阎锡山建立的统战关系，一方面为薄一波在山西工作的开展提供了基础，另一方面，薄一波的工作又促进了这种统战关系。因为薄在山西建立的上层统一战线，“特殊就特殊在：它戴的是阎锡山的‘帽子’，说的是‘山西话’，贯彻执行的却是中国共产党的主张。总之，形式是阎锡山的，内容是共产党的”。

薄一波在山西开展的第一项工作，就是接办牺盟会。牺盟会是山西省牺牲救国同盟会的简称，成立于这一年的“九·一八”5周年大会。但是，由于会员成分比较复杂，而成立时所发表的《纲领》、《宣言》、《告同胞书》引起了日军和国民党政府的反对和质问，阎锡山又采取搪塞的态度，因而牺盟会成立后并没有开展工作。

薄一波接手后，对牺盟会进行了改组，组成了以薄一波、董天知、韩钧等为首的新的工作班子。改组后的牺盟会，成为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救亡组织，也成为薄一波等在山西开展工作的“基地”。薄一波利用牺盟会的组织形式，广泛发动群众，宣传共同抗日的主张，使山西的抗日工作在全国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各地青年纷纷来山西，参加抗日的准备工作。当时的《上海党声》杂志著文盛赞山西的抗日宣传工作：“不分国与共，共组同盟救祖国”的统一战线歌声，响彻晋阳大地。

在积极宣传抗日的同时，薄一波还把目光放在了组织抗日武装力量上。以薄当时的身份，公开提出组织武装力量，必然会导致阎锡山的猜疑及顽固派的反对。薄一波明白这一点，总在寻找适当的时机，不显山不露水地把这个问题提出来。不久，机会就让薄抓住了。

牺盟会改组后不久，阎锡山召开了一次高干会议。他在会上出了一个题目：“假如日本人打进山西来，我们该怎么办?”让大家讨论。会议开了几天，许多人发了言，但阎一直不表态。薄一波看出阎锡山想扩军的意图，决定抓住这个时机，让董天知发言试探一下。薄一波对董说：“阎锡山要征求意见，看样子，他有所图谋。他有个‘雄心壮志’，要训练30万国民军，想扩军，但办不到。你今天到会上可以这样讲：‘日军步步进逼，晋绥首当其冲，不早作准备，将来必吃大亏。不成立一支以保卫桑梓为宗旨的强大部队，就不足以抵抗日本人侵。因此，像阎会长讲的，发展30万国民兵是当务之急。’”

董天知在会上如此这般地讲了。阎锡山听了虽没有说话，却掩饰不住高兴的神色。薄一波知道，机会是抓住了。果然，会后，阎锡山就让薄负责主持“招兵”的工作，并把负责培养军政干部的军政训练委员会交给牺盟会领导。军政训练委员会的实际办事机构是政训部。政训部的组织、宣传、训练分别由梁化之（主任)、薄一波(副主任)、宋劭文、刘岱峰负责。薄一波通过牺盟会，首先开办各种训练班，培养干部。如1936年12月，连续举办两期“临时村政协助员训练班”，训练1000名宣传抗日的专职人员，并发展牺盟会会员60万人。在此基础上，又开办了“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先后训练10个团，2万余人。这为以后组建新军，坚持山西抗战准备了干部。

在实际工作中。薄一波是持十分谨慎的态度的，在宣传的用语及尺度的把握上，尽可能戴阎的“帽子”，说“山西话”。薄在制定任务的目标时，所讲的“一方面，加紧守土抗战的工作；另方面，积极准备收复失地的工作。”就是用的阎的话。1936年11月绥东百灵庙抗战胜利，阎从中捞到了政治资本，于是他把以前提出的“屋顶战”的口号改为“守土抗战”。他说：“收复失地是利害问题，守土抗战是是非问题。”一方面打起了抗战的旗帜，另一方面又避免使用“抗日”的字眼。根据阎的意愿，薄一波本来拟用的“抗敌救亡下乡宣传团”，改成了“临时村政协助员”的名称。1937年2月，在太原召开的主要由太原市各界代表参加的牺盟会代表会议上通过的牺盟会工作纲领，薄一波与杨献珍也仔细推敲，把政治语言改为“山西话”，“抗敌救亡”；“停止内战，一致对外”，改为“动员民众，守土抗战”；“不分党派”改为“不分派别”。虽然用的是阎锡山的语言，实际上是我们党的主张。

组建新军，奔赴抗日前线

抗战开始以后，阎锡山急于扩大部队。一

1938 年在沁县群众大会上薄一波与朱德、傅钟在一起

天，他找到薄一波说："一波，战争开始了，还没有兵，你看怎么办？"薄一波斩钉截铁地对阎锡山说："组织新军，改革旧军。"阎锡山说："旧军是不好改革啦，你就先组织一个团的新军试试吧！"

薄一波请示了北方局，刘少奇答复："要去！不要说一个团，就是一个营、一个连也要去。你赶快回去，把牺盟会的日常工作委托给一个合适的人，除了重大问题你过问一下外，主要的工作就转到组建新军的工作中去。"此后，薄一波的主要精力就放在了组建新军的工作上。

经过薄一波的发动和各方面多次研究，决定以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团和国民兵军官教导团第八团、第九团各 300 名学员组建新军第一个团，原来准备叫抗日青年先锋队，阎锡山把它改成"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山西新军的第一支战斗部队从此诞生了。薄一波担任这个总队的政治委员，徐绩章任总队长，牛佩琮任政治主任。新军实行政委制，即政委是最高领导人和决策人，没有政委签署，一切军政大事不得实行。全队共辖三个大队，每个大队辖四个连，共两千多人，都是投身抗日救亡的爱国知识分子，这是决死队的精华。三个大队的政治工作分别由廖鲁言、周仲英、王鹤峰负责。军事各级指挥人员则都由旧军官担任。政治工作人员则全部由共产党员和进步青年担任。

山西青年抗敌决死总队成立后，经过 50 天紧张训练和准备，于 9 月 21 日由薄一波率领，从太原开赴五台山地区，准备建立抗日根据地。行军到盂县时，遇到朱德。薄一波回忆说：

我向他（朱德）汇报了决死队建立的经过和到晋东北创建根据地的打算。他向我详细转达了毛主席在新形势下的战略意图。他说：毛主席最近一再强调指出：在华北大局危急的情况下，山西将在华北形成特殊局面。原因有两条，主要是因为有八路军，其次是因为阎锡山与我们合作。由于这两个力量的结合，将造成数百万人民的游击战争。我们的根本方针是争取群众，组织游击队。在这个总方针下，实行有条件的集中作战。毛主席还说：游击战争主要应放在敌人的翼侧及后方，山西可分为晋西北、晋东北、晋东南、晋西南四个区，向占领中心城市和交通要道的敌人，取四面包围袭击之态势；不宜集中于五台山脉一区，集中一区是难以立足的。毛主席要求八路军把五台山作为重要的游击区域，同时要充分注意晋西北管涔山脉地区的部署，太行、太

岳山脉之间的晋东南，与吕梁山脉所在的晋西南，也要抓紧做好准备工作。毛主席对战局的精辟分析和高瞻远瞩的战略目光深深吸引了我。我正在沉思在战争的全局中，我们这颗“棋子”究竟应该下到哪里，这时候，朱德同志又说话了。他说：晋东北地区已有八路军一一五师，你自然不要去了。我建议你设法取得阎锡山的同意，到晋东南去。毛主席说，我们跟日本打的是持久战，要有根据地，而且是一批根据地。这和下围棋一样，只有一个眼不行，那还是死棋，要做几个眼。晋东南地区也是毛主席选定的一个眼，战略地位十分重要。接着，他又说：“我们得到情报，阎已委任托派、汉奸张慕陶为上党地区专员、游击司令，张要占据那块地方。你去把他撵走，能不能办到？”那时正值山西旧军在雁北打了败仗，是阎锡山表现最进步的时期，也是我们最能说上话的时候，所以我很有把握地回答：“不成问题，可以做到。”

我一面命令部队向晋东南上党地区转移，一面自己到太和岭口（阎前线指挥所驻地）去见阎锡山，我向阎提出：“上党地区是军事重地，我要求率部队到那里去，建立一个抗战的立脚点。”阎锡山不知道我的意图，摇头晃脑地讲了一通历史：“自古都说山西是形胜之地，表里山河。其实上党才是表里山河的表里山河呢！五代梁、唐、晋、汉、周，都是从那里起家的。上党居心腹之地，当四达之冲，肘京洛而履河津，倚太原而跨河朔，自古为兵家必争之地。”要求出兵上党，这步棋走对了。阎很高兴，马上同意了我的要求，并任命我为山西第三行政区政治主任（后改为山西第三区专员公署专员）。

1937 年 10 月，继雁北、大同失陷后，阎锡山的内长城防线又被日本侵略军攻陷。山西旧军节节失利，阎看到旧军连遭重创，士气不振，于是把更多的希望寄托在扩建新军上。八路军三个师的主力相继东渡黄河，挺进山西敌后，9 月 25 日，平型关一役，首战告捷，接着又在晋西北、晋东北点燃了抗日游击战争的烽火，更促成了阎锡山扩大新军的决心。

薄一波抓住这一时机，正式向阎建议，以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为基础，组建五至十个旅的新军。阎同意先组建五个旅，并以第二战区司令长官名义发布命令，由薄一波全权负责，从速组建。当时，已有军政训练班、民训干部教练团、国民兵军官教导团、军士训练团等 13 个干部训练团。这些训练团队，由于兵力不足，马上难以组成五个纵队（旅），便决定先组建四个纵队，每纵辖三个总队（团）。各纵先给两个总队，组成纵队后再自行发展一个团。这四个纵队，陆续在 1937 年底至 1938 年初组建完毕。各纵的政治委员由薄一波来提名，分别由薄一波、韩钧、董天知、李力果担任。对以上方案，阎锡山没有异议，只是提出了个小问题：政治委员是否都用山西籍人好些？

薄一波当然明白阎的用意，立刻表示同意，决定由薄一波、张文昂、戎子和、雷任民同志分别担任一、二、三、四纵政治委员，牛佩琮、韩钧、董天知、刘玉衡（后为李立果）分别担任各纵政治主任。各纵队的纵队长，由阎锡山晋绥军中选任。在干部问题上，八路军给了许多帮助。早在抗战前夜，办军政训练班时，薄一波就通过北方局从延安要来陈玉堂、苏鲁等十位红军团、营干部。现在，八路军总部在干部奇缺的情况下，却迅速从一二九师派遣 80 余名干部到一纵队工作。二、三、四纵队建立以后，又陆续给这些纵队输送过 400 名以上干部。新军除四个纵队外，还有郭挺一组建的工人武装自卫旅。

新军组建后，先后到晋东南、晋西南、晋西北，配合八路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八路军总部也十分重视决死队的工作。1938 年 6 月初，总部在沁县西林村专门为决死一纵队办了一个班，分批轮训排以上的干部。8 月，薄一波又组织了一纵队的 200 名中高级军官的军事参观团，到八路军连队参观学习。在八路军的影响与带动下，新军的政治素质和军事素质等方面都有了很大的提高。

秋林会议与晋西事变

1938 年 2 月，阎锡山在临汾西南温泉村召开“第二战区抗战工作检讨会议”。他在会上肯定了牺盟会和决死队在抗日战争中的作用和建

立新政权方面的工作；同意任命牺盟会推荐的40名县长，批准《山西民族革命十大纲领》，加发给每个决死纵队100万发子弹，200挺轻机枪。会议期间，他又提出了成立“民族革命同志会”的意见，想利用这个组织显示他的进步。

但也是在此次会议上，机警的薄一波已发现，阎锡山已有准备倒退的迹象。薄一波回忆说：温泉会议期间，他曾在会上拿出徐永昌从武汉打给他的电报，内容是当时德国驻华大使陶德曼建议的“和平”条件，要大家发表意见。与会者面面相觑，默不作声。阎锡山说：“这些条件并不苛刻，可以接受。打下去会亡国灭种。”显然，这是放一个准备妥协的试探气球。我当即说：“抗日战争不能中途妥协，妥协就是亡国。牺盟会和决死队坚决反对妥协投降，一定要抗战到底！”阎沉默良久，说：“看蒋先生的吧。中日战争总有和平了结之一日，我们以后不应该说反对和平妥协。”这次会议不欢而散。这时，阎锡山的旧军队已溃不成军，他还需要决死队和牺盟会支撑山西的抗战局面，所以他除了发出妥协的试探信号以外，还不敢有进一步的动作。

1938年2月28日临汾沦陷后，阎锡山仓皇退到吉县。这时旧军节节败退，溃不成军；而新军却挺进敌后，迅猛发展，搞得如火如荼。新旧力量之间此消彼长的巨大变化，使阎锡山惴惴不安。于是，他在“逃过了灭亡”之后，开始对抗战以来依靠和支持牺盟会、决死队的政策，进行了全面的反思。他对旧军发出警告说：“不要使最后胜利的场中，没有了自己！”要求旧军赶快准备，保存和扩充实力。到1938年六七月间，阎锡山的政治态度进一步发生变化，“扶旧抑新”成为他这一时期政策变化的集中表现。

1938年7月和9月，阎锡山在吉县古贤村召开了两次高级军官和文职干部会议。阎锡山虽然没有正面反对新军，却费尽心机，挑动、鼓励旧军军官来反对新军。他居心叵测地对旧军官说：“这次会议是给你们开追悼会的。但是，如果你们懂得了道理，也可以说是庆生会。”“现在你们的力量大大减少，再这样下去，不到3个月，你们就全完了。所以预先给你们开个追悼会。”他还用激将法挑动说：“你们反对新军。反对薄一波他们，你们算什么？薄某人是大骡子拉马车，轻松得很，你们这些人哪个能赶上他？哪一个够格？”“欲存在，须以弱变强；欲成功，须以弱胜强。”

吉县会议前后，阎锡山一面积极安排投降、反共、倒退，一面与薄一波领导的新军虚与委蛇。高度警觉的薄一波，也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准备可能出现的破裂。薄一波回忆说：

1938年5月底，决死一纵队纵队长鲁应麟(旧军官)趁我不在部队之机，命令部队打临汾、打王陶（沁源北部的日军据点），强攻日军坚固工事，打阵地战，牺牲多少人他也不在乎，阴谋假手日寇消灭新军。我从阎那里开会回来，批评他，他不接受，我就拿出《山西青年抗敌决死队政治委员制度条例》，对他说：“这里规定：政治委员为部队中之最高首长，我的命令，你要服从。你不听，你就走！我不要你。”又对他说：“你可以带上警卫员和你的左右手，其他一概不能带。”就这样把他赶走了。……和旧军官作斗争，我们积累了丰富的经验，斗争的方式也多种多样。……这样，到1938年下半年，我们不但在政治上掌握了部队，军事指挥权也基本上拿过来了。当然，这里说的旧军官，不包括许多进步的、中间的(大部分是非阎嫡系)军官。

吉县会议以后，国内的政治形势也发生了急剧的变化。1939年，中国的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在长期抗战的困难面前，一些人对抗战前途发生了动摇。汪精卫投敌在前，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在后，阴谋牺牲中国的远东慕尼黑也一直在酝酿。一时间，对外妥协、对内积极反共的乌云笼罩了全国。

新年伊始，阎锡山就在吉县五龙宫召开部分晋绥高级军官会议，要求陈长捷、王靖国等旧军将领实行强民政治。这次会议刚结束，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随即召开，确定“溶共、防共、限共、反共”方针，秘密通过《防制异党活动办法》。这一“巧合”表明，阎锡山这一时期政策的改变与一些人对日妥协动摇的想法是一致的；而国民党所确立的反共政策，又加速了阎锡山在山西的反共。不久，阎锡山就明确提出了反共的想法：“不能同共产党合作，‘道不同，不相

谋'。"在蒋介石发动的第一次反共高潮中,阎锡山告诫手下:"天要下雨,要赶快备雨伞。一落人后,就要吃大亏。"为了实现这一主张,改变3年来实行的联共抗日路线,阎锡山于1939年3月25日至4月22日在秋林镇召开了师长及独立旅长以上军官、各区专员及保安司令以上行政区干部、公道团主要领导干部、牺盟会各中心区及部分县特派员等参加的军政民高级干部会议,这就是有名的秋林会议。

以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决死队的主要领导干部都参加了,旧派的主要领导人也都参加了。有一天,阎锡山在会上公开地说:"我昨天晚上做了一个梦,梦见一个人对我说:你不要看不起你过去用过的那个破车,那个破车可以把你拉到目的地,只是慢一点而已,你不要相信你现在用的那个新车,这个车可以飞得快,但也可以把你翻倒在地。"这无疑在宣称他以前依靠牺盟会和新军是错了,要抛弃"新车"用"旧车"。因此,他对军政干部职务和职权作了重新分配,把陈长捷、王靖国等一些旧军官提升为集团总司令。而对薄一波为首的牺盟会和新军的领导者则予以调职。薄一波回忆说:

会议的中心内容就是一条:取消新军政治委员制度,文官不能兼任军职。阎宣布:这是蒋委员长的命令,我实在不能不执行。此外,会议还讨论了取消战地动员委员会,限制牺盟活动,缩小专员权限,取消进步法令等内容,也都是围绕着取消新军政委这个中心内容提出的。会议表面上一直是温和的,实际斗争非常紧张激烈。阎锡山装出一副可怜相,说他的处境很困难,全国都没有文官兼军职的,现在蒋介石在压他,要我们取消政治委员,帮他过这一关。会上,二纵政委张文昂表现慷慨激昂,说:"你不要我们就算了,我们搬上铺盖就走。你不让行政官员带兵,我现在就辞掉专员,留下政治委员。"我的表态只是一句话:"政委制不能取消。山西搞了这么些时候,就是搞了些新军,帮助了阎先生抗战。现在这样不行。"阎锡山看到说不服我们,又从重庆调回赵戴文和赵丕廉。他们两人当时在重庆国民政府担任要职,是我和张文昂在山西国民师范学校读书时的前后两任校长。这两位校长找我们两人谈了一上午。谈得很和蔼、亲切,似有难言之隐。最后,赵戴文对着我俩说:"阎先生碰到了困难,只要你们现在帮帮他的忙,渡过困难,日后他会报答你们的。"阎还表示,要我担任山西省建设厅厅长,主持省政府工作,我断然拒绝了。这样软缠硬磨了几个月,最后还是要按照"蒋委员长的决定"办。……

到了5月底,我们的人陆续都回去了,但阎锡山还把我留下不准回去,戎子和同志等着和我结伴同行,也留下来,阎、梁对决死队早有个估计:一纵百分之百是共产党的;三纵百分之百是他们的;二纵是一半对一半,是斗争的焦点;四纵没有专员兼政委的问题,但估计也是一半对一半。当然,这只是阎、梁的估计,实际上我们党在三纵有相当的力量,在二纵的力量也远远超过"一半对一半"。当时我们已经看出,阎要"摊牌"了,同时估计,斗争的焦点是在二纵队。果然,阎锡山"摊牌"了。他对我说:"文官不能兼军职是蒋委员长的决定,只能执行。我们必须取消专员兼任的政治委员。"为了摆脱阎的羁绊,及早返回部队,我对阎说:"化之说得对,决死一纵队完全是共产党掌握的,即使取消了政治委员,也不可能回到山西旧军序列。不过,我回去,还可以做点工作,你看怎么样?"阎犹豫好久,说:"也对。"便让我回来了。我是同戎子和一起回晋东南的,这时已经是1939年6月初了。

秋林会议就成为阎锡山由联共抗日转向积极反共的转折点。已经准备好"雨伞"的阎锡山要动手了。

从秋林回到太岳后,薄一波立即向北方局汇报了秋林会议的情况和研究的对策,北方局完全同意他们对形势的分析和布置。1939年8月6日,北方局专门发出《制止阎锡山之动摇与巩固山西统战的指示》。9月21日中共中央发出《关于在山西开展反逆流斗争的指示》,接着中央又用山西省委名义发出了《关于坚持山西抗战克服危险倾向的宣言》。号召干部分析形势,部署行动。薄一波回忆说:

这时我已经从专区搬到决死一纵队司令部。6月在沁源活凤村召开了决死一纵队第三次全体干部会议(也叫活凤会议),对切实掌握

武装作了具体布置。11月初，又召开了决死一纵队第四次扩大干部会议，我作了《如何克服目前时局危机与坚持长期抗战》的报告，指出妥协投降的危险十分严重，山西顽固分子反共、反决死队、反牺盟会、反敌后抗日根据地的活动日趋严重。因此，要切实加强思想上的准备，认清妥协投降的危险形势。特别提醒大家要吸取1927年大革命失败的教训，当时就是因为思想上没有准备，使轰轰烈烈的大革命葬送在血泊之中。我还强调提出，要加强组织上的准备，掌握部队，进一步巩固政权，准备在顽军进攻的时候，进行坚决的武装斗争。

1939年下半年，新军各纵队都作了不同的准备，我和新军各纵队之间都通消息。……一纵队早已对反动的旧军官做过清洗，尚余旧军官100多人，其中有不少是进步的或比较进步的，梁述哉等。我把他们集合起来，对他们说："我们过去处得并不错，或者说很好，但现在形势发生了变化，形格势禁，决定你们现在一起到路东(白晋线东)抗大分校(校长罗瑞卿)去学习。"……他们的职务，由政工干部取代。我向这些政工干部提出："你们虽然过去做政治工作，但是也受过军事训练，还有一些实战经验。现在你们只要把枪保持住，把部队保存在我们手中，就是胜利。"

秋林会议以后，阎锡山一直在准备力量，观察形势，等待解决新军和一切进步力量的时机。1939年12月1日，阎锡山以对日军发动"冬季攻势"为名，命令决死二纵队于12月5日向灵石、霍县段的同蒲路实行破击；同时命旧军为"预备队"，置于新军之后。就在二纵队准备向日军发动攻势之际，旧军从背后向二纵队开了枪。二纵队政委韩钧立即给阎锡山发电报：

总座伯川先生：

六十一军欺我太甚，甘作汉奸。学生誓与二纵队万余健儿，为总座争一伟大胜利，兹定于十二月十二日誓师。此后半月内，恐无暇报告钧座。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此是生报告恩师最后之一言，胜利的结果将见。学生韩钧敬叩　印

阎锡山收到电报，立即召开高干会议，在会上宣读了韩钧的电报。他说："韩电对我不称长官而称老师，不称职而称学生，并说十二月十二日誓师，表示不相隶属了，韩钧反了！"以此为借口，宣布韩钧"叛变"，通电全国，进行讨伐。酝酿已久的晋西事变终于爆发了。

阎锡山原以为在"晋绥军中，以我的地位为最高，就作官说，我要舒服，谁也不能阻挡我"，事变前，他与梁化之估计，经过这么长时间的部署，除了薄一波领导的决死一纵队共产党力量强大，不易得手外，其余的三个纵队他们都可以控制，只要他一下命令，他的"扫荡晋西南，掌握晋西北，摩擦晋东南"的行动总方针就可以大功告成。但是，他低估了以薄一波为首的共产党人的力量。在事变前薄一波的周密部署，已经尽可能地做到了防患于未然。事变中，薄一波发电要求所有新军部队，必须明确表态站在二纵队一边，予以支持。一纵队也动员了三个主力团，准备前去支援。各部队和牺盟会的领导人，也纷纷致电阎锡山，抗议王靖国、陈长捷、赵承绶、孙楚挑起的反革命事件。与此同时，八路军大力协助新军。因而，事变的结果远不像阎锡山计划的那样美妙。

事变中，新军除了三纵队有4个团，二纵队有极小部分分离出来外，其余33个团全部离开阎锡山。阎的部队虽然扫荡了晋西南，却在晋西北遭到彻底失败，晋东南也让国民党的中央军乘机插足进来。他的地盘损失了四分之三。他更不愿意看到的是，螳螂捕蝉，黄雀在后，蒋介石已经乘机把手伸向山西。1940年1月30日，国民党军令部下令："胡宗南部派两师增援晋西，归阎长官指挥，……以卫长官统一指挥晋东南之中央军及孙楚部。"大有在山西取代阎锡山之势。续范亭形象地描绘说：阎锡山发动晋西事变，是"阎王定下杀马计，跑了马儿又伤身"。

事变以后，中共中央审时度势，科学地分析当时的形势，既看到了阎锡山在坚持华北抗战中还有一定的进步性和重要性，又看到了蒋介石要搞掉阎锡山孤立共产党的企图，等等，因而提出了调停的建议。中央指示薄一波等人，在痛斥阎锡山的部下进攻新军、破坏牺盟会，残杀抗日人员的罪行以后，要表示愿意和平解决山西内部问题，并愿意在阎锡山领导下继续团结抗

日，以免被敌人利用。

与此同时，中共中央也采取措施，敦促阎锡山和平处理事变。

1940 年 1 月 27 日，中共中央以陕甘宁边区留守兵团主任萧劲光的名义致电阎锡山，表示愿意调解新旧军冲突，使山西恢复团结抗战局面。2 月 11 日，毛泽东又亲笔起草了致阎锡山电，指示用薄一波的名义发出，电报全文是：

长官阎钧鉴：三个月来，山西内部阋墙之争，中外惊疑，敌人拊掌，而演变所极，尤属痛心。盖我为鹬蚌，人为渔人。此渔人者，不但有一日本帝国主义，更有一顽固势力。彼挟其地位以临吾人，企图挑拨吾新旧两军，取吾两军而置其囊中。先取其一，使钧座陷于孤立，继取其二，使钧座陷入绝境。然后分之裂之，摧之折之，而晋绥军尽矣。设此企图而能实现，非但抗战不利，钧座不利，新军不利，即旧军同人亦绝无所利。为今之计，极宜由钧座调和两军，重新团结，一致抗日。两军虽一时以兵戎相见，然新军全属自卫，绝无成见。苟利抗日，无不服从钧座之指挥，想旧军同人亦必不固执己见。钧座一纸团结之令，则和协之局立现，抗日战线重整于三晋之间矣。一波忝受知遇之恩，心所谓危，不敢不告。敬祈速决大计，俾有遵循，大局幸甚。

此电不提任何条件，只提两军团结，使阎及旧军好转弯。待萧劲光去谈判时，再与阎磋商条件。如各守现地，互不侵犯，双方均不加处罚等。此电只用薄一波出名，续范亭也可打同类电报去。如阎同意妥协，再由新军诸领袖联名发一团结抗日宣言，就可了事。

山西全省新军应公开发表下列口号：1 拥阎抗日；2 新旧两军团结起来，一致抗日；3 新军不打旧军，要求旧军停止打新军；4 枪口对外，停止内争。以上这些口号，应在一切接近旧军的地方写出来。

以薄一波名义的电文发出后，给了阎锡山一个挽回面子的机会。于是，阎复电中共中央，表示不拒绝谈判："萧主任有暇，希望前来一谈。"2 月 25 日，萧劲光、王若飞持毛泽东给阎锡山的亲笔信到秋林见阎。萧、王向阎及各方转达中共中央及八路军赞成新旧军团结，拥阎抗日，赞成新军仍属晋绥军，不受国民党中央政府改编，巩固阎之地位的意见，不但阎锡山、赵戴文、杨爱源、梁化之、李冠洋等表示欢迎，而且王靖国、薄右丞等也表示欢迎。在融洽气氛中萧、王向阎提出了和平解决办法：(1) 双方停止军事行动；(2) 双方停止政治攻击；(3) 新军表示拥阎，不受中央政府改编；(4) 双方互不处罚，互不侵犯；(5) 今后统一于进步，实现阎之十大纲要；(6) 恢复与新军电台联络及人员来往。阎表示：(1) 新军仍属晋绥军是其愿望，但问题已交中央，不便说话，只好让其自然演变，不了了之；(2) 已令各军停止军事行动及政治攻击，如韩钧等受日寇攻击，他还要助韩；(3) 与新军电台经常联络，并未断过；(4) 今后当注意以进步求团结。阎锡山还公开说，他是国共两党之间的中间力量，他的存在是于团结有利的。阎锡山答应我党提出的恢复晋西兵站线的条件，但不同意沿线驻兵。

随后，双方代表又经过谈判，终于在 4 月初正式达成协议。晋西事变的斗争至此告一段落。

此后，薄一波有一段时间依然在山西进行创建抗日根据地的工作。与以往不同的是，他并没有再得一张通缉令。

邮购启事：

本社尚有少量往年合订本：

1996 年合订本精装 52 元/本，简装 49 元/本。
1997 年合订本精装 54 元/本，简装 49 元/本。
1998 年合订本精装 56 元/本，简装 51 元/本。

此外还可补购今年各期单刊 4. 80/本，
全年 57. 60 元。

邮购时请在汇款单上注明邮编、地址及要求。
地址：北京市东城区雍和宫大街戏楼胡同 1 号
邮编：100007
联系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毛泽东时代的两桩哲学公案

——从“思想和存在的同一性”讨论到“合二而一”批判

● 王若水

1959年—1962年的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讨论和1964年对“合二而一”的批判，表面上好像仅仅是围绕杨献珍的观点，其实背后都有国际背景；前者牵涉到斯大林，后者牵涉到赫鲁晓夫。

《实践论》和《矛盾论》都写于1937年。1938年，苏联出版了《联共党史》，其中第四章第二节《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斯大林亲自撰写。斯大林按照他自己的理解，把马克思、恩格斯和列宁的哲学观点加以整理，构建了一个体系。

斯大林把辩证法概括为四个特征，第四个特征是承认事物内部的矛盾。他说：

从低级到高级的发展过程不是通过现象的和谐的开展，而是通过对象、现象本身固有的矛盾的揭露，通过在这些矛盾的基础上活动的对立倾向的‘斗争’进行的。

“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讲过的话，但列宁同时还说过“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斯大林只讲前面一句话，不讲后面一句话。不但如此，斯大林还给“和谐”一词赋予一种贬义，声称发展过程不是通过“和谐”的开展。这就把列宁说的“发展是对立面的同一”否定了。

1951年，毛泽东相继把《实践论》《矛盾论》这两篇论文相继公开发表。

《实践论》在《人民日报》发表后，苏联方面的反应是热烈的。《真理报》全文译载，还配合发表了一篇社论。此外，还有一些著名哲学家发表评论。

《矛盾论》发表时，情况就有些不同了：不是由《真理报》发表，而是由联共的理论刊物《布尔什维克》登载，而且不是一次登完，而是分两期登完。是因为文章太长了吗？《矛盾论》虽然长了一些，但苏联刊物上长篇文章有的是，并不是非得分两次登不可。做过编辑工作的人会懂得，这是一种委婉的降低文章的重要性的方式；而且，可能特别是降低文章的后一半的价值。果然，当登出文章的后一半时，有些懂俄文的中国读者发现，原文中讲到战争与和平的“同一性”的地方，俄译文改成了战争与和平的“互相联结”；另外一些地方的“同一性”这个词也改成了“统一性”。这就暴露了联共中央对《矛盾论》的不同意之处。

1954年付印的《苏联大百科全书》中有“毛泽东”一条，其中说：

1937年7、8月间，毛泽东写了两篇著名的哲学著作：《实践论》和《矛盾论》，其中阐译了马列主义的认识论和马克思主义辩证法的基本规律——对立的斗争是运动泉源的规律。

这个叙述歪曲了毛泽东的原意：只提对立的斗争，不提对立的同一。苏联共产党的作风就

是这样怪，他不是客观地介绍某人的观点，而是按照自己的想法来叙述别人的观点。大概编者和作者觉得他们不能无批判地介绍毛泽东"矛盾的同一性"的观点，于是只好不提，似乎毛泽东根本没有过这样的观点。

毛泽东在 1937 年作他的《实践论》和《矛盾论》的讲演时，他的主要参考书籍并不是马克思、恩格斯或列宁的哲学经典，而是当时苏联一些哲学家如米丁、西洛柯夫、爱森堡等人的著作。毛也参考了李达的《社会学大纲》和艾思奇的《大众哲学》。自从 1988 年国内出版了《毛泽东哲学批注集》以后，这一点已经十分清楚了。

《实践论》是讲认识论的，《矛盾论》是讲辩证法的。这两篇文章都是列宁在《哲学笔记》中的思想的解释和发挥。这个解释和发挥的功劳属于苏联哲学家；毛泽东并没有什么增添。但是苏联哲学家的著作写得冗长累赘，加上翻译的问题，读起来诘屈聱牙；毛泽东把这些著作中的精华加以集中和概括，又用通俗易懂的，形象的，精练的语言表达出来，因此，应该说他在普及化方面作出了贡献。

毛泽东在《矛盾论》中指出：所谓矛盾，就是"对立统一"(而不仅仅是对立)。"一切事物中包含的矛盾方面的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决定一切事物的生命，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可以注意到，毛泽东在这里说的是"相互依赖和相互斗争"，而不单单是相互斗争，推动一切事物的发展。

毛泽东没有照搬斯大林；当苏联哲学家不再提自己过去的著作时，毛泽东还继续坚持《实践论》和《矛盾论》中的基本观点。其中《矛盾论》对对立统一规律的阐释，特别是对"矛盾的同一性"的阐释，明显地与斯大林的不同。

可以看出，正确的是毛泽东，而不是斯大林。毛泽东的观点虽然是来自西洛柯夫和米丁等人，但是他们后来把这个观点放弃了，而毛泽东却仍然坚持着，没有盲从斯大林。

苏联的批评和毛的反批评

苏联著名哲学家罗森塔尔起初显然对毛肯定"矛盾的同一性"感到高兴，他在《马克思主义的辩证法》中肯定了这个原理。可是不久，在 1953 年第一期的《哲学问题》上，出现了一篇批评他的文章。这篇文章似乎是有来头的。文中说："我们认为罗森塔尔教授所使用的'对立的统一'及'对方的统一和斗争'等名词是不妥的。斯大林同志在其经典著作《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中已规定'发展是对立面的斗争"，这是"马克思主义科学的最新成就"，而"对立的'同一'或统一是黑格尔表达方式的残余"。

同年《哲学问题》第四期，罗森塔尔发表了自我批评。

以后，在尤金和罗森塔尔合编的《简明哲学词典》的 1954 年第四版的"同一性"这一条中，加进了如下的话：

有时，有些人错误地把马克思主义的同一性原理应用于一些根本对立的现象。例如：一些人说，和平和战争是同一的；另一些人说，在资本主义制度下，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是同一的，等等。这样简单的理解同一性其实就是滥用黑格尔的术语。孟什维克式的唯心主义格外热衷于这种做法。像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等等现象不能是同一的，因为它们是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

这里面谈到的"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和死"这三个例子都是《矛盾论》中用来说明"矛盾的同一性"的。很显然，这是不指名地批评《矛盾论》。罗森塔尔这样做，当然是要表示他的"改邪归正"；但是，批评毛泽东这样的事，如果没有斯大林的授意，罗森塔尔是不敢的。

生与死的同一性是黑格尔首先提出来的。恩格斯也不止一次讲到这一点；例如他在《自然辩证法》中说："今天，不把死亡看作生命的本质因素，不了解生命的否定本质上包含在生命自身中的生理学，已经不被认为是科学了，因此，生命总是和它的必然结局，即总是以萌芽状态存在于生命之中的死亡联系起来加以考虑的。辩证的生命观无非就是如此。……生就意味着死。(《马恩选集》4 卷 370 页)

《简明哲学词典》的第四版在1955年译成中文出版，“同一性”那一条一字未改地发表了出来。毛泽东当然不会不把这个批评放在心上，但在当时，他只能忍耐。

1953年斯大林逝世。三年以后，在1956年苏共第二十次代表大会上，赫鲁晓夫作了批判个人崇拜的报告，揭露了斯大林的错误和罪行。这个报告震动了全世界。毛泽东觉得可以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对斯大林进行反批评了。

在1957年1月的各省、市、自治区党委书记会议上，毛泽东批评了斯大林“只讲对立的斗争，不讲对立面的统一”，说《简明哲学词典》反映了斯大林的观点，是根本错误的。毛泽东再次阐述了战争与和平、生与死、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的同一性，然后说，“对立面的这种斗争和统一，斯大林就联系不起来。”(《毛选》第五卷第347-348页)

接着，2月，毛泽东作了《关于正确处理人民内部矛盾的问题》的演讲。毛再次强调：“对立统一规律是宇宙的基本规律”，“矛盾着的对立面又统一，又斗争，由此推动事物的发展和变化。”

毛在这篇演讲的开始部分含蓄地批评了斯大林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的矛盾，说对许多人说来，承认对立统一规律是一回事，应用这个规律去观察处理问题又是另一回事。“许多人不敢公开承认我国人民内部还存在矛盾，正是这些矛盾推动着我们的社会向前发展。许多人不承认社会主义社会还有矛盾，因而使他们在社会矛盾面前缩手缩脚，处于被动地位……”

毛泽东还进一步说，社会主义社会的人民内部也可能发生对抗性的矛盾。这是毛的新观点。

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

1958年，《红旗》总编辑陈伯达（他是毛的政治秘书之一）找到了中央党校的副校长杨献珍，问他“敢不敢批评尤金”，对《简明哲学词典》提出不同意见，阐明一下矛盾的同一性问题。杨献珍接受了这个任务，在这一年的8月写出了《略论两种范畴的同一性》这篇文章。这篇文章表明，陈伯达找错作者了。

当时，在中央党校内部，正在进行一场争论。这个争论是在讲授恩格斯的《费尔巴哈和德国古典哲学的终结》一书时产生的。恩格斯讲到，思维和存在的关系问题，除了何者是第一性的问题以外，还有另一方面，就是：我们的思维能不能认识现实世界？“用哲学的语言来说，这个问题叫作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绝大多数哲学家对这个问题都作了肯定的回答。”(《马恩选集》第4卷221页)。这个意思很清楚，恩格斯把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用哲学的语言概括为“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承认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就意味着承认思维能够与存在符合一致，承认世界可以认识；否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就是不可知论了。

这里的“同一性”在德文原文里是Indentitat，就是英文的identity。中文译作“同一性”，译成“一致性”也可。说两个东西是identical(同一的)，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一个东西（如说“启明”和“长庚”是同一颗星）；但也可以意味着这两个东西是相似的、一致的、符合的（如说译文和原文是同一的）。恩格斯当然是在后一个意义上使用这个词的。因此，“同一”在这里是“一致”或“统一”的同义语。列宁就说过：“对立面的同一（他们的‘统一’，也许这样说更正确些吧？虽然同一和统一这两个名词的差别在这里并不特别重要。在一定意义上这两个名词都是正确的)”(《哲学笔记》第397-398页)。

恩格斯是把“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作为各派哲学家的共同问题提出来的。唯心主义者也好，唯物主义者也好，都要回答世界可不可以认识的问题，而这个问题实际上就是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的问题。问题就在这个“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是黑格尔常用的语言，而黑格尔是在唯心主义的基础上来解释和论证这个原理的。黑格尔认为一切都是精神，他把整个宇宙和历史都当做绝对精神的显现，自然界也是如此。正因为这样，世界才是可以被精神认识的。但在黑格尔的体系中，自然和精神又是不同一的，有区别的，自然只是精神发展的一个阶段，

是理念的外化。黑格尔批评谢林，就因为谢林主张思维和存在的“无差别的同一”。把黑格尔的体系颠倒过来，唯物主义者也可以说：一切都是物质，精神不过是物质发展到一定阶段的产物。物质和精神有共同的规律，因此物质可以认识。这就是对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两种截然不同的解释。这个观点是杨献珍不能接受的；他认定，唯物主义无论如何不能承认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尽管黑格尔主张的是“具体的同一性”，它包含差别于自身，也就是又同一又不同一，但杨献珍根据自己的理解，以为承认这种同一性就意味着思维和存在是没有任何差别的同一个东西，说思维和存在是同一的就不能再说思维和存在是不同一的。他的这个观点和艾思奇发生了分歧；艾认为恩格斯也是肯定了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在这个哲学问题上，分歧至今存在，这里反映的只是作者一方的观点。

看来陈伯达事先并不清楚党校内部的这场争论。当陈伯达找到杨献珍写文章时，他的意图是希望这篇文章能够阐明“矛盾的同一性”是普遍原理，批评《简明哲学词典》说的“根本对立和相互排斥”的矛盾没有同一性。杨献珍写的文章分两部分，第一部分批评了尤金和罗森塔尔，阐述了战争与和平、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生与死这样的矛盾有同一性。如果写到这里就交卷，那么这篇文章也许还可以发表；但是杨献珍却同时企图利用这个机会来批评艾思奇，于是他在文章的后半大讲“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只能是唯心主义的原理。这样，他的文章的前半和后半是矛盾的：前半说根本对立的矛盾也有同一性；后半却否定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

自然，《红旗》无法发表这篇文章，但是，杨献珍却通过他的追随者把他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的观点发表到刊物上去，批评与艾思奇相同的观点。这就引发了一场长期的争论。

杨献珍在“文革”后把这场争论说成是“批判”。实际上当时双方都在报刊上发表文章，批评也是相互的。笔者当时也属于争论的一方。我们批评对方是机械唯物论，对方则批评我们是唯心论。杨献珍当时没有发表文章，并非因为报刊上拒绝刊载，而是他不愿意发表（据我所知，《哲学研究》杂志曾约请杨献珍写文章）。正因为如此，不同意杨献珍的一方并没有提他的名字。

1961年到1962年之间，毛泽东在读苏联《政治经济学教科书》时曾顺带谈到他同意说思维和存在有同一性，说：

“思维和存在有没有同一性这个问题，争论很久了。认为思维只是思维，存在只是存在，思维不能达到存在的彼岸，存在不能被认识，客观不能被主观所认识，这就一定要走到二元论，最后走到康德那里去。

“存在是第一性的，思维是第二性的，只要肯定了这一条，我们就同唯心主义划清界限了。然后还要进一步解决客观存在能否被认识，如何认识的问题。还是马克思说的那些话对，思维是‘移入人的头脑并在人的头脑中改造过的物质的东西’。说思维和存在不能等同，是对的，但是因此就说思维和存在没有同一性，则是错误的。

不过毛泽东并没有干预这场讨论。只是到了1964年，在毛泽东的授意下，报刊才开始了对杨献珍的有组织的政治批判。

转折点：用“一分为二”反对“合二而一”

毛最早使用“一分为二”这个词，是在1957年11月8日的莫斯科共产党和工人党代表会议上；当时毛说，“其实我们的支部书记是最懂得辩证法的，当他准备在支部大会上作报告的时候，往往在小本子上写上两点，第一点是优点，第二点是缺点。一分为二，这是个普遍现象。”(《毛选》第五卷第498页。)这是说要看到事物的两重性或两个方面，避免片面性。这里是含蓄地批评赫鲁晓夫没有对斯大林“一分为二”，其水平还不如中国的一个支部书记。

1963年12月，毛在审阅周扬的《哲学社会科学工作者的战斗任务》一文时，加进了这样一段话：

怎么有些人会从革命的、科学的社会主义学说的拥护者，竟然堕落到反革命的、反科学的

修正主义道路上去呢？其实一点也不奇怪。世界上无论什么事物，总是一分为二。学说也是这样，总是要分化的。有革命的、科学的学说，就一定会在其内部的发展过程中产生它的对立物，产生反革命的、反科学的学说。……这个理论早已为马克思主义哲学的历史和各个社会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也为自然科学的历史所说明了。(《建国以来毛泽东文稿》第十册，p. 401-402)

这是毛泽东第一次用"一分为二"来说明马克思主义和修正主义的对立。在此之前，"一分为二"的"分"是指分析、区分，在这里，"分"却是指分化、分裂了。

"文革"时期的中国报章杂志曾吹捧说，提出"一分为二"是毛泽东对辩证法的新贡献。其实，这只不过是对对立统一换了一个表述方式，算得了什么呢？而且，这个毛的这种说法是从列宁那里来的。列宁说过，"统一物之分为两个部分以及对它的矛盾部分的认识，是辩证法的实质。"(《哲学笔记》397页)这就是"一分为二"的意思。这种说法本来没有错，但不如"对立统一"的提法完整；而毛泽东把它称为"两分法"，常常排除了事物的中间状态，变成了"两值逻辑"。

从50年代末到60年代初关于"思维和存在的同一性"问题的争论情况来看，杨献珍一派似乎是处于劣势，至少在哲学界同意他们的观点的人不多。到1963年底，杨献珍想摆脱被动局面，表示自己并不是如对方所说的只讲唯物论不讲辩证法，他开始在中央党校讲授辩证法，讲"对立面的同一"了。杨献珍在讲课中引用了明代哲学家方以智的"合二而一"这个话来解释对立的统一；又说，"所谓统一，就是不可分地联系着的"。可以看出，他局部地改变了自己的观点。

然而，当杨献珍开始转向辩证法的时候，毛泽东却从辩证法后退了。

毛泽东抓住了杨献珍的"合二而一"这句话，认为这是和自己讲的"一分为二"唱对台戏。其实，杨献珍并没有否定"一分为二"。"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并不是非此即彼地对立的。事物之所以能"一分为二"，正因为这个"一"里面已经潜在地包含了"二"，这个"一"是"合二而一"的"一"。这就好像一枚硬币的两面，从这面看是"一分为二"，从另一面看是"合二而一"。

"合二而一"的观点本来和毛在《矛盾论》里的观点是一致的。《矛盾论》曾说矛盾双方"共处于一个统一体中"，这不就是"合二而一"吗？为什么毛泽东改变了自己本来正确的观点呢？

这个原因不能从理论本身去找，而要从当时的政治背景中去找。

这个时期毛正致力于树立自己的绝对权威，而在他眼中，杨献珍并不是他的忠实信徒。杨是一个正统的共产党员，他为何触怒了毛？杨献珍不会故意提出"合二而一"来和毛泽东唱对台戏。我认为真实的原因有两件事：一是杨献珍在中央党校讲哲学课，只是抱着列宁的一本《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不讲毛泽东的哲学著作；仿佛读通了列宁这本书，弄懂了"物质第一性，意识第二性"之后，别的书就不用读了(杨献珍被撤职以后，他的继任者林枫吸取教训，把读毛著列为中央党校的首要任务)；另一个原因是杨献珍在1958年直率地批评了"大跃进"中的主观主义，说"卫星田"是"唯心田"等等。因此，毛不喜欢杨献珍。

在我看来，只讲《唯物主义与经验批判主义》而不讲《实践论》是不对的。列宁的这本书只讲了认识论的唯物论，对认识论的辩证法很少涉及；其次，列宁对实践在认识中的作用讲得不够，只讲实践是检验真理的标准，没有讲实践是认识的起源。这两个缺点，在《实践论》中得到了弥补(自然，我在前面已经说过，毛泽东的观点来自苏联哲学家)。至于第二点，杨献珍当然是正确的，表现了他坚持实事求是的勇气。

不过毛的转变的最重要的原因，还要到国际背景中去找。

60年代初，苏联哲学界提出了对立面可以"融合"的论点(米丁、费多谢也夫)，这是为赫鲁晓夫的"全民国家"、"和平共处"的概念作辩护。共产党对意识形态的重视，使得他们的领袖在提出一条路线和一项基本政策时，一定要证明它的背后有一条普遍的规律。这样，赫鲁晓夫

为了肯定新路线的合理性，就需要从哲学上来论证并不是一切矛盾都是不可调和的；而毛泽东也需要通过批驳矛盾“融合”的观点来证明赫鲁晓夫背叛了马列主义。

其实，苏联哲学界使用的“融合”这个术语是来自马克思。马克思在叙述黑格尔的辩证法观点时说：“两个相互矛盾方面的共存，斗争以及融合成一个新范畴，就是辩证运动。”(〈马恩选集〉1 卷 144 页)采用这个概念，是同斯大林的观点背离而向马克思的靠近；从理论上说，这是一个进步。但毛泽东是从政治需要来评价这种转变的。

这个时期，毛泽东正在加紧进行反对“修正主义”的斗争部署。1963 年，中苏两党的论争进一步公开化。从 1963 年 9 月到 1964 年 7 月，《人民日报》和《红旗》两个编辑部陆续发表了九篇批评苏共的文章（“九评”）。在国内农村，从 1963 年到 1964 年进行了“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文化领域，1963 年毛作了对文艺界进行严厉批评的批示。在外事领域，毛批评了对外联络部的所谓“三和一少”路线（对帝国主义、修正主义、各国反动派要和，对各国人民革命支援要少）。中共已和苏共分道扬镳。毛需要宣传中苏分裂的必然性。

正好这时杨献珍提出了“合二而一”，毛认为这可以抓住这个机会从哲学上来论证矛盾的不可调和，反对妥协与合作，反对联合。

毛嘱咐《红旗》对正在进行的关于“合二而一”的讨论发表一篇评述。这篇题为《哲学战线上的新论战》的评述经过陈伯达的审阅和修改，在该刊 1964 年的 16 期发表。于是一场大规模的批判运动开始了。

这篇文章说：“一分为二”和“合二而一”是“两种根本对立的世界观”。现在，国际上反帝反修的斗争正在蓬勃发展，国内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两个阶级的斗争，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两条道路的斗争正走向一个新的阶段。面对这种形势，毛泽东强调要用“一分为二”的观点来进行斗争。杨献珍在这时宣扬“合二而一”论，就是适应修正主义和敌对阶级的需要，宣传阶级合作和矛盾调和，对抗社会主义教育运动。

这顶帽子是很大的。杨献珍是不是真有这个目的，这对毛泽东并不重要。不管是不是，毛泽东也要这样说。这是政治的需要，这才是真正重要的。

这些言论体现了毛泽东的观点。杨献珍后来说，这是康生在整他。其实，这是毛泽东的部署。当然，毛泽东可能是听了康生的报告。

这篇评述被《人民日报》在 1964 年 8 月 31 日转载。此后，报纸上出现了一系列批判杨献珍的文章*。这场批判甚至扩展到工人和军队之中，成为群众性的批判运动。作者也曾在 1964 年 10 月 16 日的《人民日报》上发表了《评杨献珍同志的矛盾观》的文章，其中批评杨献珍否认“一分为二”，还给杨献珍戴上了“反对社会主义革命，反对党的路线的修正主义”的政治帽子。我已经不止一次承认了这个错误，现在再次在这里提一下。

就在转载《红旗》述评的当天，《人民日报》在头版登出了中共中央对于苏共中央 7 月 30 日来信的复信。苏共中央的这封性是邀请中共派代表参加筹备共产党和工人党国际会议的工作。中共中央的回信斥责苏共执行了一条“反共、反人民、反革命路线”，斥责这封信是“发出了公开分裂国际共产主义的号令”。复信断然宣称“决不参加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国际会议”，“决不能分担你们分裂国际共产主义运动的责任”。并说，召开这种分裂小会是“自寻绝路”，“我们已经警告过你们：你们召开分裂会议之日，就是进入坟墓之时。”这封信的语气之强烈和措辞的尖刻令人震惊。我毫不怀疑这是毛泽东的口吻。

毛泽东准备“一分为二”了。

（责任编辑：致　中）

毛泽东评赞习仲勋

● 汤 洛 执笔

今年10月15日是习仲勋86周岁华诞，他在耄耋之年，以高度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经过深圳九年的疗养，身体健康状况很好。在庆贺他86周岁之时，将我们了解到的毛泽东评赞习仲勋的真情实感介绍出来，乃是最珍贵的礼物。

纵观习仲勋的革命生涯。可以清楚地看到一条鲜明的红线——一贯坚持实事求是反对极左，是他一生信守的原则。

“他是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1945年，抗日战争胜利，原中共中央西北局书记高岗受党中央、毛主席之命，率领一批干部离开延安，奔赴东北，开辟东北解放区，在遴选西北局书记一职时，毛泽东说：

“我们要选择一个年轻的担任西北局书记，他就是习仲勋同志。他是群众领袖，是一个从群众中走出来的群众领袖。”

是年，习仲勋33岁，时任中共中央组织部副部长。

毛泽东对习仲勋这个评赞，始于十年前的印象。1935年，他率领中央红军长征抵达陕北根据地，在几处村落墙壁和大树上，看见张贴时日已久的《陕甘边苏维埃政府布告》，上面署名“主席习仲勋”。后来，他在瓦窑堡，从被“左”倾分子关押中释放出来的同志里，面识习仲勋后，感到惊讶：“这么年轻。”

此时习仲勋年方23岁。

在陕北根据地，少数老同志中曾有一种议论：“陕北救了中央。”习仲勋严正指出：“这句话应该倒过来：“中央救了陕北。”他列举了毛泽东和党中央长征尚未到达陕北前，陕北根据地“外受国民党重兵‘围剿’；内遭‘左’倾路线的危害，许多优秀的党员、干部、知识分子和下级军事指挥员被枪杀、被活埋。毛主席不到陕北，陕北根据地就完了；毛主席晚到四天，就没有刘志丹和我们了；要不是毛主席‘刀下留人’，我早已不在人世。他们(左倾机会主义者)已给刘志丹和我们挖好了活埋坑。”

1951年7月1日，中国共产党诞辰30周年之际，习仲勋以《跟着毛泽东走就是胜利》为题著文。“跟着毛泽东走”成为习仲勋终生不渝的信条。

“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1951年初秋的一天傍晚，林默涵同胡乔木在中南海湖水中划船休闲，看见毛主席坐在湖岸藤椅憩息，他们将船划拢岸边，向毛主席问好。

毛主席说：“告诉你们一个消息，马上给你们派一位新部长来。习仲勋同志到你们宣传部来当部长。他是一个政治家，这个人能实事求是，是一个活的马克思主义者。”

这是毛泽东对习仲勋的又一个评赞。

1952年习仲勋奉调来京之前，曾经真心实

意地向毛泽东反映，按照他的经历和水平，怎能担当起全国宣传文教的领导工作？毛泽东曾告诫他说：“蛇，看起来十分可怕，但印度人要蛇，得心应手，关键在于真正谦虚地摸到事物的客观规律，任何工作都可以做好！”

习仲勋从西北局调到中央人民政府担任政务院文教委员会常务副主任不久，在 1953 年 3 月第一届电影艺术工作会议上发表长达两个多小时的讲话，在文学艺术界引起热烈反响，作家、艺术家异口称赞。

他对一些作家进城几年不出作品，认为作家有责任，但是，作为党的领导也有责任。领导应为作家创造条件到群众中去。对有些作品不是基本立场观点上的错误，就不能完全否定；即使是立场观点上的问题，也要耐心帮助，反复修改，而不是乱找岔子，夸大缺点，使作家无所适从。

要求作家提供作品，也不能像工厂加工订货那样，限期交货，要给作家充分的创作时间。

文艺批评也要有高度的批评艺术，批评的恰到好处，而不是倾盆大雨，狗血淋头，结果弄得不欢而散。他反对上纲上线，扣大帽子，不实事求是，乱找岔子。

延安时期的习仲勋

要善于引导作家前进。要鼓励作家的旺盛士气，要激发作家的创作热情。

习仲勋的讲话，是对当时存在在文艺工作领导上的官僚主义的针砭。

习仲勋对作家、艺术家的甘苦深知入微，与他们有着密切的联系。1945 年，他任西北局书记时，曾亲自领导由著名三十年代初上海电影演员陈波儿编导的、以誉满解放区的劳动英雄吴满有为原型的电影故事片《劳动英雄》的拍摄工作。建国以后，他在西北局工作期间，对著名京剧艺术家程砚秋、著名豫剧艺术家常香玉、陈素贞和著名秦腔艺术家李正敏等，在政治上、艺术活动上以及生活上，都备加关怀，无微不至。抗美援朝战争爆发后，他对常香玉巡回义演捐献飞机一架的爱国主义、国际主义的行动，不仅热情支持，积极鼓励，并且作了具体安排。诗人柯仲平在创作反映陕甘革命运动的史诗时，作家柳青在创作长篇小说《种谷记》、《铜墙铁壁》、《创业史》时，杜鹏程在创作《保卫延安》时，以及剧作家马健翎处在工作与创作之间矛盾的苦恼时，都得到习仲勋的支持、帮助与鼓励，并解决了创作条件上的种种困难。

“炉火纯青”

近些年，每当习仲勋的亲属去给薄一波拜年祝福时，薄一波就回忆叙述毛泽东对习仲勋的赞许：“炉火纯青”。

——那是 1952 年初，习仲勋任西北局书记

和西北军政委员会副主席的时候。一天，薄一波去毛泽东处。毛泽东正在阅读习仲勋从西安发来的报告:《关于中共中央西北局委员会全体会议情况》。这个报告内容:西北地区的土地改革、统一战线和民族工作等等，内容丰富，论述精辟。这个报告为中央领导幅员辽阔、民族众多、社会复杂的大西北政治改革各项工作提供出一个蓝本。毛泽东欣悦异常，于是问薄一波:

"你讲讲，习仲勋这个同志怎么样?"

"年青有为。"薄一波讲。在延安时，薄一波就听到过毛泽东以此语赞誉过习仲勋。

毛泽东说:"如今已经'炉火纯青'"。

习仲勋对事物的敏锐观察力为人们所公认。尤其是对"左"倾现象的觉察，触角十分灵敏。

1947年冬季，人民解放军节节胜利，各个解放区兴起了轰轰烈烈的土地改革运动。运动中，苏维埃时期的老区，抗日战争时期的半老区，出现与新区土改不加区别的现象和过激行动。习仲勋于1948年1月4日至2月8日，一个月内，就"老解放区的土地改革问题"、"要注意克服土地改革中'左'的情绪"和"按三类地区有区别地进行土地改革"等重大问题，向党中央、毛主席三次函电，直言不讳地提出:反对"左"倾情绪。

在1月4日给中央的信中，习仲勋指出:

"如以一般概念进行老区土改，必犯原则错误"，"地主、富农占中国农村百分之八左右的观念，在老区必须改变"，否则"势必犯严重错误"。他严正地指出:"在老区发动群众运动，要坚决反对小资产阶级的'左'倾形式主义"。他列举了陕甘宁边区绥德分区发生的违犯政策的现象:在辛店贺家石村，边区文化协会的胡采领导的工作团规定，民兵吊地主、打干部。许多群众斗争会上，总有几名打手，专门捆、打、吊、烤，弄得人心惶惶。他指出:"这种'左'的情绪，不是群众原来就有的，而是干部带去的。"

毛泽东当即于1月9日批示:

"完全同意仲勋同志所提各项意见。望照这些意见密切指导各分区各县的土改工作，务使边区土改工作循正轨进行，少犯错误。""华北各老根据地亦应当注意。"

1月19日，习仲勋就"义合会议"问题电毛泽东。

义合会议，是1947年冬在陕北绥德义合镇举行的陕甘宁晋绥边区土改三查会议，会上刮起一股极"左"旋风。在所谓坚持"贫雇农路线"反对"中农路线"的口号下，发生少数人起来乱斗、乱扣、乱打、乱拷、乱没收财产、乱扫地出门的极端混乱。更甚者，提出什么"志丹四大家族"，将陕甘宁苏区创建者、群众领袖刘志丹和他的战友马锡五、王子宜、曹力如等的家属，列入土改对象。部队司令员张达志的弟弟被吊打，索银洋。更甚者，有烈士家属被扫地出门。有的劳动英雄因有余粮被当成斗争对象。

习仲勋在电文中严正指出:"由于义合会议潜伏一种'左'的情绪，由于晋绥直接影响，土改一到农村，就发生极'左'偏向。"他又说:"我看一有'左'的偏向，不要半月，就可以一切破坏得精光，"

习仲勋在电文中，对老区阶级状况，以马克思主义的观点，作了科学分析:"在老区，有些乡村贫雇农很少。其中，有因偶然灾祸贫穷下来的。有的是地、富成份下降未转化好的。有因好吃懒做，抽烟浪荡致贫的。""由他们起来领导土改，就等于把领导权交给坏人。吓得区乡干部有逃跑的，有自杀的。"他论断地指出:"真正的基本好群众在中农阶层及一部分贫农中。"

毛泽东当即于1月29日批示:

"完全同意习仲勋同志这些意见。华北、华中各老解放区有同样情形者，务须密切注意改正'左'的错误。凡犯有'左'的错误的地方，只要领导机关处理得法，几个星期即可纠正过来，不要拖延很久才去纠正。同时注意，不要使下面因为纠正'左'而误解为不要动。"

不久，中央由周恩来起草的"关于老区半老区土改问题的决定"颁发各个解放区。

习仲勋曾对秘书田芳说过:当王震于1944年做为八路军南下支队司令员南下之前，毛泽东曾找习谈话，大意是:我们不能老困守在陕甘宁边区，为了全国人民的解放，我想建议你随王震一起南下。但没过几天，毛泽东找习谈:我考

虑再三，你还是应该留在陕北，让我们一起首先把陕甘宁边区建设好，巩固好，这是当务之急。

“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1952 年 7 月，习仲勋受毛泽东之命，亲赴新疆，妥善地解决了发生在那里的一场民族纠纷事件，稳定了新疆政治形势，使各民族重归于好，和睦如初。

撤出延安时习仲勋(左 3)和彭德怀(左 2)

前些年，全国政治协商会议主席李瑞环曾向一位同志讲：

“李维汉和习仲勋同志关于民族统战工作方面的讲话和著作，是我们当今民族统战工作的法宝。”

此语并非过实。

西北地区，幅员辽阔：339 万平方公里；民族众多：汉、回、藏、维、蒙等十多个兄弟民族，共 2350 万之众。同时，政治复杂，经济落后。习仲勋提出：一切工作都要在民族团结基础上采取“稳进慎重’方针进行。

“争取各民族上层人士，争取宗教方面人士，然后去发动，不可颠倒过来。”这是习仲勋当时解决民族矛盾的方程式。

争取青海省昂拉部落第十二代千户项谦归顺，是习仲勋在西北地区解决众多民族问题中一个代表。

事后，毛泽东见到习仲勋时，说：

“仲勋，你真厉害，诸葛亮七擒孟获，你比诸葛亮还厉害。”

确实如是。

项谦结合马步芳一〇〇师师长谭呈祥、骑兵十四旅旅长马成贤等反革命武装，组织所谓“反共救国军”第二军，发动叛乱。争取项谦的归顺工作，自 1949 年 12 月始至 1952 年 7 月 11 日下午，项谦从南乎加该森林回归，时达两年七个月之久。从 1950 年 9 月到 1952 年 4 月，中共青海省委统战部长周仁山、藏传佛教大师喜饶嘉措、藏族部落头人、寺院活佛等 50 余人，身入虎穴，亲赴昂拉，先后与项谦和平谈判达 17 次之多。其复杂曲折，变化多端，颇具戏剧色彩。

习仲勋亲自领导这场斗争中，显示出他那“炉火纯青”的智慧和才干。

他高瞻远瞩，多次向青海领导指出：正确解决昂拉叛乱，不仅对解决昂拉藏族同胞关系极大，而且对于我党在青海其他藏区和少数民族地区站稳脚跟，建立人民政权，开展工作关系极大；甚至对于甘、川、康藏区乃至西藏也有重大影响。他说，必须坚持在充分军事准备基础上以政治争取为主的方针，十分慎重，首先是用和平方式解决。对于项谦必须采取反复争取，特别宽大政策。

针对有些人急于军事进剿的情绪，习仲勋电告青海省委书记张仲良：“决不能打，万万不可擅自兴兵，只有在政治瓦解无效以后，才能考虑军事进剿。”

1950 年 8 月，项谦归顺，来到西宁，向政府深表悔悟，但是，回到昂拉却又背信食言。

1951 年 9 月，对项谦第八次政治争取失败后，人们义愤填膺，青海省各族各界代表会议上，代表们提议，坚决要求政府出兵昂拉进剿。

习仲勋当即复电劝阻：争取和平解决昂拉问题，于我政治上有利，应当仔细向喜饶嘉措、班禅行辕等许多藏族人士征求如何争取昂拉千户。过

去历次所做争取工作是否都完全适当,也可以稍加总结,以便政治争取工作做得更好。我们顾虑的是对广大藏区的影响问题，如果我们功夫不到,且不说军事上打不好,致其流窜所生的麻烦,即使打好了,对其他藏区工作仍会有许多不好的影响,给以后增加许多困难。如果我们政治方面工作还未做得周到(当然还有军事上的准备),军事进剿仍不妨甚至可以肯定应当推迟。

1952年5月1日发起的平叛战斗于5月3日结束后,项谦隐匿在同仁县南乎加该森林。有些人认为争取项谦可能性不大，没有什么价值。习仲勋即电省委书记张仲良:只要将昂拉地区工作做好,不犯错误,争取项谦归来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尽速派出项谦信任的汉藏人员向项谦诚恳表示，只要他归顺政府，则对他负责到底;项谦若回来试探,不管真诚与否,我们均应以诚相待,以恩感化。

1952年8月11日，项谦在兰州负疚抱悔地握着习仲勋的手，躬身认罪地向习仲勋献上洁白哈达,喜泪盈眶地向习仲勋举杯谢恩。

以诚相待,以恩感化。习仲勋以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分析研究了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在本民族本地区的社会地位、社会作用、社会影响等的形成与存在，和在历代政治制度下的政治活动、政治态度,以及宗教信仰对他们思想意识和精神品德的教化效应，而以共产党人的远大眼光,坦荡襟怀,博大爱心,与各少数民族上层人士交相共事，使他们感受到中国共产党真正是他们民族的拯救者。

甘肃南部藏族首领黄正清，可说是习仲勋的至交挚友。习仲勋卧病期间,他千里迢迢前往探望。这是数十年间合作共事中逐渐凝聚的情谊。黄正清最为感动的是习仲勋对他的信任无疑。

1953年春,甘肃临夏原国民党县参议长马良,纠集国民党军残部和流氓惯匪,在甘(甘肃)川(四川)边界藏族地区,在台湾国民党的指挥和援助下,继续与人民为敌,气焰十分嚣张。

同时，台湾国民党特务机关企图用封官许愿、物质引诱,策动已任我西北军政委员会委员的黄正清脱离政府，使马良能在甘南地区立足作乱。

为坚决彻底剿灭马良反革命武装力量，由人民解放军第11师和几个骑兵团前往进剿。黄正清受命为剿匪总指挥部副司令（司令员张达志、政委黄维嵩、副司令有朱声达、徐国珍)。

黄正清在离开西安前往剿匪前线时，习仲勋约他话别。

习仲勋将自己携带多年的博克手枪馈赠给黄正清,说:“带上它,好护身。”

黄正清接过手枪,顿时,热泪横流,百感交集,在他身遇台湾国民党施行诡计之际,共产党领导能够如此这般的信任不疑，岂能不使他激动万分。

黄正清就座后，习仲勋语重心长地说:“组织相信你能完成这次剿匪任务。这次去要大胆地工作,发挥你的影响。我们共事几年了,都十分了解你,也相信你。今后有事可随时打招呼。不管外面有人说什么,你都不要顾虑。”

习仲勋将有关方面获得的情况，坦诚地告诉黄正清:台湾国民党正在到处找他,并已派飞机窜入甘南上空,给他空投下来一封任命状、一个关防、一部电台,都在马良手里。

习仲勋对黄正清宽慰地说:“你到甘南后，如果有人将那些任命状、关防、电台给你送去，你不要怕,收下后,向上反映就行了。”

黄正清到甘南夏河的第三天，果然马良派人送来一张蒋中正签署任命他为“守备司令”的任命状和一颗关防印记。他当即交给朱侠夫转至西北军政委员会。

他称誉喜饶嘉措为三爱大师：爱党、爱国、爱佛教。

习仲勋对少数民族上层人士和宗教界活佛、喇嘛、主教、阿訇等礼贤下士,交往甚广。诸如十世班禅大师、外逃前的达赖喇嘛、以及鲍尔汉、马腾霭、达里扎亚等,都是他的座上嘉宾。

(责任编辑:致　中)

(此材料由习仲勋前秘书田方、范新民、张志功和曹振中提供)

庐山上看唐伯虎的《庐山图》

● 田 萍

此次游庐山，给我留下最深印象的就是庐山博物馆珍藏着唐伯虎的传世之作《庐山图》。唐伯虎，明代江苏吴县人。少时聪颖过人，29 岁乡试第一，会试时因牵连科场舞弊案被革黜。后游历名山大川，性格放荡不羁，才华横溢，钟情丹青，卖画为生，留下不少诗和画，是当时文坛上诗、书、画三绝的艺术家。

据史证，唐伯虎的这幅《庐山图》，绘的是庐山三峡桥的山水景物。三峡桥，即今日观音桥，始建于宋大中祥符七年。鬼斧神工，宛如天半飞虹，横跨于含鄱岭南的三峡涧上，长 24 米、宽 4.5 米、高 10.7 米，全部是由石头砌成。然而，就是这么一座气势宏伟的大石桥，在唐伯虎的笔下却变成了：朔风怒号、云雾弥漫、古木摇曳中一座摇摇欲坠的小木朽桥。如此反差，在丹青界，实乃少见。特别是桥下涧水湍急，桥上一童子正在挥鞭驱赶着不堪负重的瘦驴，更让人浮想联翩。画面左上方唐伯虎亲题了一首七绝：“匡庐山前三峡桥，悬流溅扑鱼龙跳。羸驂强策不肯渡，古木惨淡风萧萧。”看画品诗，无论是诗还是画，都给人一种寒气逼人、气氛压抑之感。因此，这幅《庐山图》放在风景秀丽的庐山是独一无二的。

被称为“江南第一风流才子”的唐伯虎，为什么会构思绘出这样一幅凄楚悲凉、一片冷岭萧瑟的画面境况呢？说来这主要与他当时的处境是分不开的。唐伯虎所处的时代，朝廷早已没有了洪武年间那种励精图治的锐气，宦官专权，一场反对中央集权的斗争正在当时的江西南昌宁王府酝酿。为了网罗人才，宁王朱宸濠曾派人专程到苏州礼聘唐伯虎。唐伯虎来到南昌，住了一段时间后，逐渐发现朱宸濠要他来南昌的真实意图。他孤云野鹤闲散惯了，且对明王朝的统治早已失去了信心，哪里还愿意卷进这场如临深渊的残酷政治斗争中去？他既已成为笼中之鸟，怎样才能脱身呢？思来想去，只有装疯卖傻，唐伯虎一直闹到大庭广众之下赤身露体，朱宸濠看到他如此丑态，哭笑不得，以为他真疯真傻了，只好差人包点银两，打发他回老家。在回老家江苏的途中，他顺便游览了庐山栖贤谷，触景生情，绘下了这幅《庐山图》。在画中，他以飘摇于朔风中的三峡桥象征明王朝摇摇欲坠的统治，用涧中鱼龙来比喻王室和朝廷的夺权斗争，而把自己则比喻成那只瘦驴，任宸濠鞭打、驱赶也“不肯渡”，不愿走向那“古木惨淡风萧萧”的去处，不愿做统治阶级争权夺利的殉葬品。

诗言志，画寓情，唐伯虎的《庐山图》，正表达了他不与封建统治者同流合污的思想感情；一幅《庐山图》正是他正直心胸的写照，也是那个封建时代的见证，更是他借景抒情为明王朝送葬的一曲挽歌。

（责任编辑：刘家驹）

抗联老战士
陈雷、李敏的故事

● 美　国　谢中天

这是一对饱经沧桑的传奇老人。男主人公陈雷,82岁,中共十二届中央委员、十三届中顾委委员，黑龙江省原省长;女主人公李敏,76岁,黑龙江省政协原副主席。

1943年,他们在苏联伯力雅斯克东原始深山北野营抗联基地结成革命伴侣至今，相携相爱，走过了56年共同生活的历程。

59年前,他们还是一对可爱的年轻人……

一句话点燃爱情之火

1941年3月的一天,正在护士排上课的朝鲜族女战士李敏收到一张条子，看到熟悉的字体她面露微笑。傍晚，她按照约定的地点，踏着一脚深一脚浅的积雪向距离大宿舍不远的树丛走来。她一眼看见过去给六军教导队上过课的陈教官在一棵树旁跺着脚，呵气像一缕炊烟,从嘴中吐出。3月的西伯利亚，依然冰封雪裹,出奇的冷。

“我要去出征了，回祖国，到黑河、大兴安岭一带。可能——明天就出发!”陈雷凝视着她,缓缓地说。

“嗯。”她低着头,不知想什么。

突然,他笑着说:“你知道你哥哥对我说的一句话吗?”他停顿一下，看着她变化的脸色，说，“这话，我是往心里去了。”

她哥哥叫李云峰，抗联六军1师6团政治处主任，和陈雷1938年一同西征的战友，是莫逆之交。李敏知道：哥哥的话是把她这个小妹许配给他。她心里一阵狂跳。她认识陈雷是在1938年，知道他是一个大学生出身的抗联教官，去年9月，陈雷等人来到北野营地，他们常常在一起谈学习、谈战斗、谈人生、谈未来，总有说不完的话题。爱慕之情在两个年轻人的心中滋长，这次要西征，不知何时能相见，陈雷是仗着胆子约她出来的。

第二天，陈雷随第三路军总指挥李兆麟返回祖国。他怎么也想不到，他走后李敏会遭到厄运。

抗联野营驻地的女同志极少，一百比一，目标就相对大了。李敏和陈雷傍晚谈话，受到党组织的严厉批评，受到男战友的抨击。她被撤销党小组长职务，多次作检查。抗联国际教导旅党委成员找她谈话时指出，野营有纪律，不准谈恋爱。陈雷是“赵尚志反党集团成员之一，已被开除党籍。”“陈是地主子弟，将来靠不住。”但倔强的李敏反而更冷静了。她觉得陈雷有知识有能力，既聪明又朴实，从心里敬重和喜欢他。

一滴泪倾注无言的深情

1942年4月,大地还没有完全解冻，冰凌花已顶着寒风开放了。

一个不幸的消息令李敏泪如泉涌，陈雷在执行任务中身负重伤。

这是冯仲云将军告诉她的。详细伤情他也不清楚，但知道他们这次出征干得非常出色，战斗也相当激烈。

原来，三路军三支队缺少政工负责人，李兆麟根据王明贵的请求委派陈雷担此重任，得到王明贵的器重，两个人工作十分协调。三支队在王明贵的率领下，横扫大兴安岭、嫩江、甘河、漠河……连续打了27个大胜仗，同时在林区扩大了队伍，鼓舞了人民群众的抗日信心。这支活跃在黑龙江西部的抗联队伍，令敌人胆战心寒。为了消灭这支抗日队伍，1942年2月，日伪调集重兵在大兴安岭库楚河山谷中游将三支队包围。经过一场恶战，百余名抗联壮士血洒疆场，只有11个人突围幸存。陈雷在激战中身负重伤，右手腕被子弹打中，动脉血管被打断，当时鲜血喷出1米多高，几次用纱布塞都被鲜血浸透，后来用根树枝把纱布硬顶到血管断口，才算止住了血。同时，又一颗子弹打在他的后颈部，险些致命。撤到苏联境内后，陈雷作为重伤员被送入陆军医院治疗。

正当李敏日夜为陈雷的伤势而担忧时，有一天，医务室突然闯进一个吊着右臂的伤员，用凝重的目光盯着她！天啊？这不是陈雷吗！他瘦多了，颧骨突出，圆脸变长，显露大病后的憔悴。

他们相视无言。她急切地小心翼翼地打开纱布，为他的枪伤换药。她揭下最后一层纱布，看见了一块殷红的伤口，这儿曾喷涌出他的鲜血，这儿的动脉管已不复存在。

一大滴苦涩的眼泪，滴落在陈雷手腕的伤口处。陈雷觉得有一股热流涌遍全身。

几天后，旅部要在男宿舍召开大会。这种宿舍又叫大筒子房，建在山上，坐南朝北。房内中间是过道，两面是几十米的大统铺，一面铺就可睡三四十人。屋里点着马灯，光线很暗。李敏随妇女排进来时，远远看见吊着右臂的陈雷半起身，吃力地离开他的睡铺，李敏心里很高兴。便抢先坐到他的铺位上。坐在对面铺位的陈雷，眼睛虽然近视，但极力注意李敏在他行李前的举动。散会后，陈雷高兴地回到铺位，他行李上的军大衣显然被叠过，急忙寻找，一封厚厚的信出现在眼前。他找个僻静之处仔细阅读，心中好像燃烧起火焰。李敏以真诚、坦率、细腻的感情，向他表达了爱情。她认为他是坚强的革命者，出生入死、屡次为祖国负伤，决不是

1945年，时任东北自治军龙南纵队政委的陈雷与李敏在一起

什么反革命分子。她告诉他，你能活着回来，我非常高兴。我会永远爱你，直到终生。但由于客观条件限制，暂不公开，回国后再处理个人的问题。

此后，有一位热心肠的小梁战士，常常为他们传递书信。

1942年12月9日，陈雷奉命带队回东北执行侦察任务。李敏不便出面送行，又恰逢她学习报务员业务正举行发报考试。出发的汽车在轰鸣，李敏心中难过。手指发颤怎么也按不出点来。苏联考官问她怎么回事？她眼泪直流，推说头疼，跑回宿舍。不一会儿，一位送丈夫西征的女战士回来，把陈雷给她的纪念品送来：一个写满诗的笔记本，一封信，一把战利品口琴。她把这些东西紧紧抱在胸前。

1992年陈雷、李敏出访朝鲜和金日成在一起

一间小屋留下 患难与共的温馨

陈雷此次执行任务十分顺利，一个半月后返回野营。不久，旅司令部任命陈雷为六连政治副连长、中尉军衔（此时陈还未恢复党籍）。

陈雷和李敏相处已有三年，都把各自的感情深深埋在心中。但出乎意料的事情发生了，旅领导同意他们结婚，并在大地窨子中分出一间作新房。那是一个大雪纷飞的天气，陈雷接到命令后匆匆告诉正在学习的李敏，李敏一时被突如其来的喜讯惊呆了，不知该怎么办才好。

几天之后，李敏上山滑雪训练后回到宿舍，行李卷不见了！金玉顺、朴景玉两位鲜族女战友把她送到“新房”。李敏走进房门，看见陈雷正穿着衬衫，用破旧报纸糊墙呢。这种墙是由木板皮钉成的，做为与另一家的间隔。而靠外走廊的板墙正呼呼透着风。屋内气温太低，哈气可见，糊上的纸很快冻在墙上，他便用脸盆烧着木炭火，边糊边烤，两手炭黑，满脸像个灶王爷。可是李敏不顾一切的投入到“灶王爷”的怀里。他们就在这样的房子里度过新婚第一夜。没有结婚仪式、没有喜庆鞭炮、没有亲朋好友举杯祝福、更没有大铺大盖锦衣绸缎。但是，他们觉得这是世界上最美好最温馨最幸福的新房，他们心满意足。因为在婚姻的诸多条件中，感情是第一需要。“问世间情为何物，竟叫人生死相许”，只要感情相系，处处充满阳光。没有窗帘，李敏向卫生所要来一些纱布，用针线连接起一个纱

帘。陈雷找了一张白纸,用红兰铅笔画了一朵寒梅、一朵牡丹。他说,我们的爱情像寒梅一样,经历寒冬终于怒放了。牡丹花是我们百年合好的象征。

婚后是幸福的,夫妻互敬互爱。陈雷劳累过度,在晚上直打呼噜,害得李敏常常彻夜不眠。后来李敏想出一个高招,用两个棉花球塞满耳朵,“再打雷我也不怕了。”

对于这一段颇具浪漫色彩的生活,陈雷有诗为证:

异国他乡结小家,
心花怒放乐无涯。
纵有困难忧心事,
自能克服自能剋。

风雨相厮相伴到永远

1945年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15日,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9月3日,中国战场上的战事基本结束。不几天,陈雷、张光迪、王钧等率三个小组乘飞机回国。从此,陈雷和李敏双双携手开始了新征途。

直到1966年“文化大革命”风暴骤起,一张大字报诬陷陈雷,说他杀了百名抗联战士。1966年8月26日就开始揪斗了。这对恩爱夫妻又被拆离八年之久。

时任中共黑龙江省委书记处书记、常务副省长的陈雷,首当其冲被关进牛棚。戴高帽、抹花脸、剃鬼头、上大刑,造反派极尽各种手段折磨这位抗日英雄。哈尔宾军事工程学院的一帮年轻造反派,用军用皮带的钢头轮番抽打陈雷的脑袋,头绽血流,差点儿被打死。

有一次,李敏冒着危险去看他,带去他喜欢吃的东西。看到他被打得血流满面,剃了鬼头,简直无法辨认。在游行时叫他跪在车厢板上四五个小时,膝盖肉皮全脱落、流脓。李敏见状抱着陈雷嚎啕大哭。李敏向造反派们抗议说:“他没有历史问题,他为抗日救国多次受重伤流过很多很多的血。你们不了解历史情况,受了坏人的造谣欺骗!你们不能再打了,你们去调查了解,千万不要再打了。你们会明白打错了……”

但这些话对于那些无法无天的家伙来说,毫无作用。李敏把陈雷的血衣带回来,洗净夹进字条:“……要实事求是、保重身体、坚强的活下去、千万千万要活下去!”

第二年寒冬的一天,在工厂劳动的李敏趁着休息日,买了棉衣棉帽,经申请去看望陈雷。他的伤虽然愈合了,但头上伤疤累累,变得黑瘦。两人无言相视,用泪水代替内心感情。接见时间是有限的。离开后,有人追过来,说陈雷让把他的手表拿回去修一修,李敏接过一看,表是好好的,准时准点,怎么说修一修呢?一种不祥之兆掠过脑际,她整夜未合眼。天一亮,就给看押的人打电话,问陈雷的情绪怎么样?没几天,李敏也被以“苏修”、“朝修”、“反革命”、“里通外国”等罪名投入监狱。她寝食不安,连做恶梦。有一天,她眼前出现一片汪洋。突然,汪洋中露出一块草地,草地上有一床被子,是自己家里的,这不是陈雷的被子吗?打开一看陈雷躺在里面,便“哇”地一声哭醒了。这一定是陈雷不在了,或者自杀了。第二天早晨,她正在掉眼泪,忽然大喇叭里传来“打倒反革命分子陈雷”的口号,她欣喜极了:他还活着!活着就行!要挺住,坚持着活下去!

1975年,陈雷被“解放”,他要做的第一件事就是赶去上海,因为李敏出狱后因患肿瘤正在上海住院。这对患难夫妻是在上海一家医院劫后余生见的第一面。他们依然用心灵用行动续写着忠贞不渝的爱情。

又是几度春秋。夫妻俩相继离开了省级领导岗位。陈雷书画之余,撰写回忆录。如今已出版《征途岁月——陈雷回忆录》、《露营集》两部书;反映建国后工作内容的回忆录也将脱稿。李敏从事社会活动之余,已收集整理出《东北抗日联军(流行)歌曲选》出版。她也正在忙于写回忆录。

(责任编辑:刘家驹)

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中共代表刘鼎

● 王光远

早在西安事变之前，中共代表刘鼎，协助张学良以团结抗日的爱国主义思想教育东北军，加强东北军与红军、十七路军的联系。并帮助张学良筹划军事，培养干部，创办刊物，又和张学良一起去延安，参加了与周恩来的会谈。为红军和东北军的合作做出了重大贡献。

张学良寻找中共代表

张学良是1935年9月从武汉行营主任调任西北剿匪副总司令的，他把全部东北军调来西北。当时他的态度如何呢?60年后他在答日本记者问时说:“我根本不愿意剿共。因为蒋先生对我很好，他要我挑一件事情做，我挑了。但实实在在地说，我对内战、剿共是不愿意的。”同时，蒋介石又对他说：共产党不是什么大不了的对手，只剩下几千人，用不了多少时间就可消灭。因而他也想把共产党消灭之后，可以把西北建成一个发动抗日战争的基地。

谁知和红军一接触，却连吃败仗。两个师长和400多名士兵阵亡，团长高福源以下1500多人被俘，损失惨重。对东北军的损失，蒋介石不但没有抚恤补充，反而将两个师的番号取消。这对张学良的刺激很大。他在《西安事变忏悔录》一文中又说：“当时，共产党‘停止内战，共同抗日’的口号高唱入云，不仅激动着我的心，而且深深地动摇着大部分东北军将士，尤其是深入了那些青年官兵们的心中。进一步剿共已属无望，我不得不反躬自问，承认这些失败都是我的独断专行所致。我征求众人的意见，他们提出要与共产党联络，同杨虎城合作，停止剿匪，保存实力，共同抗日主张。这些意见虽然是他们提出来的，但实际上也确实打动了我的心。只是当时我们还不知道共产党的真实意图所在。大家讨论的结果，决定先设法与共产党取得联系，以知其真意。”

张学良最早是通过被俘的团长高福源与中共取得联系的。高回来后，向张学良详细讲述了他在苏区的见闻。说明共产党是诚心诚意主张停止内战、一致抗日的，并愿意帮助东北军打回老家去。张学良听后，决定派高福源再去苏区，请中共代表前来谈判。

3月4日，张学良和李克农在洛川举行了会谈。会后，张学良提出：希望中共派一相当负责但又不是声名显赫的人常驻西安，以便和他及各有关方面进行联系。张学良回到西安后，恰逢代表国民党去陕北苏区送信的董健吾，希望他回上海后，帮助寻找一位中共代表来西安。董健吾是地下党员，曾在中央特科工作过。

董健吾回到上海后，立即将此事报告给宋庆龄。宋庆龄告诉董健吾，有一个共产党员，自称是“周教授”，现隐蔽在路易·艾黎家中，此人学识渊博，举止不俗，你可以先和

他谈谈。

一天，董健吾接到宋庆龄的通知，要他去法租界一家咖啡馆与“周教授”见面。董健吾来到咖啡馆、见一人已经坐在里面，他正想上前去接头，那人一回头，他一下愣住了：“原来是你！”所谓的“周教授”，竟是他的老战友，原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刘鼎。在险象丛生的环境下，旧友重逢，分外亲热。

刘鼎，原名阚思俊，字尊民，四川省南溪县人，1903年生。1923年加入社会主义青年团。1924年从浙江高等丝业学校毕业，随同孙柄文去了德国。在格廷根大学、柏林大学就读，经朱德、孙柄文介绍，转为共产党员，后又去苏联入东方大学、空军机械学校，边工作边学习。1929年奉调回国，任中央特科二科副科长，协助陈赓工作。

董健吾立即向宋庆龄作了汇报，再经李杜通知了张学良，张学良立即派高级参议赵毅专程到上海迎接。

推心置腹的交谈

3月20日，刘鼎在赵毅陪同下来到西安，第二天到玄风桥金家巷张公馆，拜会了张学良，刘鼎首先对张学良派专人接他来西安表示感谢，并想听取少帅对团结抗日的意见。

张学良和刘鼎的谈话，首先从红军长征开始。张学良说：“在长征那样苦的条件下，红军还能打胜仗，扩充队伍，即使打败了也溃散不了，真是不可思议。”又说：“国民党的军队打仗靠的是武器装备好，子弹给养充足，人多势众，打胜了好办，打败了就溃散。红军撤得开收得拢。我的部队一撤开就收不拢，这是为什么？”

刘 鼎

刘鼎向他介绍说，红军来自土地革命后的农民，他们有阶级觉悟，懂得为谁而战，因而作战勇敢，吃苦耐劳，遵守纪律，所以能够虽败而不垮。红军还有政治工作制度，官兵平等，上下一心，从而产生了红军特有的战略、战术。

张学良问：“国民党及其军队内部，等级森严，与旧军队没什么区别。红军官兵是怎么区分的，你们党内也有大小党员之分吗？”又说：“国民党内派系林立，勾心斗角，共产党内为什么能团结一致？”

刘鼎谈了苏区土地革命、政权建设、军队建设以及政治、经济、法律各方面的情况，指出共产党人虽然来自五湖四海，但是有一个共同的革命目标，一切都为工农兵谋利益出发，这是团结的基础。所以军民之间、官兵之间十分和谐，团结一致。

张学良还同他谈了婚姻制度问题，国民党法律允许一夫多妻制，苏区一夫一妻制是怎样实现的？由此谈到了欧洲的女权运动等，还向他介绍了东北沦陷、南京政府内部的分歧等情况，并表示了他联共抗日的决心。

从此，张学良把刘鼎引为知己，敞开心扉，无所不谈。他曾怀疑刘鼎就是中共领导人之一的王稼祥。他向东北军高级军官们介绍说：“刘先生很有学问，你们有不懂的问题都可以问他。”又对两个“跟车”的师长说：“刘先生有教养，向刘先生多学习。”所谓“跟车”，是张学良创造的一种办法，调两个高级军官随他活动，以便借机培养干部和考察干部。

陪同张学良出席延安会谈

4月9日，刘鼎随同张学

良去延安，参加与周恩来、李克农的会谈。张学良与周恩来一见面就幽默地说："我这里有一位共产党的代表刘鼎先生。"周恩来不知道刘鼎是阙尊民的化名，不由一愣。与刘鼎见面后，周恩来哈哈大笑，"原来是你啊！想不到在这里见面了！"说罢与他热烈握手。

这次会谈取得极大的成功，特别是在对待蒋介石的问题上，周恩来表示：只要蒋介石愿意抗日，共产党是愿意在他的领导下，捐弃前嫌，一致对外的。对此，张学良十分高兴，他说："你们在外面逼，我在里边劝，一定可以把蒋介石扭转过来。"会谈达成了八条协议。

刘鼎到西安不久，就在七贤庄 1 号建立了中共秘密交通站(后为八路军办事处)，公开名义是张学良的牙医诊所，刘鼎通过史沫特莱从上海请来德国牙科医学博士赫伯特·温奇做掩护，由邓中夏烈士的夫人夏明以护士的名义在这里协助刘鼎工作。并以诊所的名义接收由史沫特莱等人从上海购买的大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再由这里运往苏区。后又调来原在中央特科工作的涂作潮，在秘密交通站的地下室安装了一部大功率电台，可以将中共中央在保安发布的消息转播到全国各地，远至苏联、日本、新加坡都能收到。

同时，还建立起一条由西安到苏区的秘密交通线，购置了一部大轿车，张学良援助红军的军用物资、苏区购买的各种物品，都由这条交通线运往苏区。叶剑英、潘汉年、邓发、丁玲等党的干部和斯诺、马海德、史沫特莱等国际友人，都曾经这条地下交通线出入苏区。

张学良的得力助手

刘鼎还帮助张学良建立了军官训练团。这是张学良根据周恩来的建议，并和杨虎城商议后成立的，目的是为了提高部队的军政素质，为抗日作准备。由张学良任团长、杨虎城任副团长，王以哲任教育长(后为黄显声)。地点在西安南郊的王曲镇，每期两个月，主要培训连以上的干部，在筹办期间，张学良征求刘鼎的意见，刘鼎建议以政治为主，以抗日救国为中心，学习中外各国的革命经验。以军事为辅，着重学习部队的组织管理，实现官兵平等，严格纪律，也学点游击战术。张学良采纳了这些意见。

张学良对训练团十分重视，他亲自住在团部附近的太师洞，不但经常给学员讲课，还参加学员的讨论，和学员同桌吃饭，同唱救亡歌曲。第一期 6 月 15 日开学，22 日，张学良作了《中国的出路唯有抗日》的讲话，第一次公开表明他的抗日决心。

刘鼎又建议张学良开办一个学兵队，吸收一些新的抗日青年到东北军来，张学良担心吸收不来，刘鼎表示可以帮助，刘鼎向中央报告后，中央通知北方局负责招生工作，不久，一些生气勃勃的爱国青年学生，应招来到西安，其中有"一二·九"运动的积极分子，有共产党员，如曾任国务院副总理、政协副主席的谷牧等。北平的孔祥桢教授也和学生们一起来了。第一期有 400 多人，学兵队设在张学良的警卫二营，由营长孙铭九兼任队长，刘鼎帮他作政治工作，西安事变后，他们中的不少人都转到中共领导的抗日组织。

在开办军官训练团的同时，张学良还和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刘鼎等人商议，决定在东北军中建立一个秘密核心组织，把分散的抗日力量紧密地团结在自己的周围。这个组织定名为"抗日同志会"，由刘鼎负责拟定章程。抗日同志会 9 月初正式成立，开始只有张学良、刘鼎、孙铭九、应德田、苗剑秋、刘澜波等 15 人，西安事变前发展到 70 多人。

为了宣传抗日，张学良决定办一个《文化周刊》，委托刘鼎物色编辑，恰好上海左翼作家吴奚如(席儒)刚来西安，刘鼎请示周恩来后，把他留了下来。张学良接见了他。《文化周刊》发行后，很快成为西安、兰州地区的畅销刊物，每期印 5000 份。吴奚如写了《蒋委员长身上有日本人的血液吗?》一文，张学良十分赞赏，却引起了蒋介石的不满。宋美龄在《西安半月记》中写道："早在事变之前，上海左翼文化人即

已潜入西安，非法发行刊物，诋毁中央，诬蔑领袖。”指的就是这件事。

红军和东北军的初步合作

张学良和周恩来举行延安会谈之后，就不断地从经济上接济红军。他赠给周恩来2万银元，随后觉得太少，又送去20万元法币。10月，叶剑英、潘汉年去西安，与张学良会谈，他得知边区经济困难，即拨款5万元由宋庆龄转交给苏区。11月，叶剑英回苏区，他又赠程仪10万元。叶高兴地说：“张将军真是雪中送炭啊！”红二、四方面军到陇东后，缺乏冬衣，张学良又送来专为红军制的棉衣一万套。

据刘鼎回忆，张学良还曾想与蒋介石决裂，拉出一部分东北军与红军合作抗日。那是7月初的一天，张学良请刘鼎到王曲太师洞，见面后就对他说：“我的日子很难过，我想了几天，只有把队伍拉出去，能拉多少算多少，和红军一起干。请你向毛先生、周先生报告，我立即派飞机送你去延安。回来时，我到哪里你就追到哪里，告诉我结果。”刘鼎感到突然，问他怎么回事？张学良说：“我的前面是强大的日本鬼子，一面是比蛇还毒的中央军，在整我，迫害我。我的队伍里又矛盾重重，有些很难对付，要他们联共抗日非常困难，不如干脆和你们合在一起，丢开手干，将大有可为。”

7月5日，刘鼎飞到延安，又步行80里去安塞，途中还挨了冰雹打。到安塞时，毛泽东、张闻天、周恩来、李克农等人已在这里等候，刘鼎做了详细汇报后就开始讨论，会议开了一夜，毛泽东指示说：“我们党对东北军不是瓦解、分裂，或者把它变成红军，是帮助、团结、改造它们，使之成为抗日爱国的力量，成为红军可靠的友军。因此，我们不赞成张学良拉队伍和红军一起干。而且拉出一部分队伍来，就要散掉一部分，这不是增强而是削弱抗日的力量。要对张学良多作解释工作，叫他不要性急，做扎实工作，团结更多的人，把全部东北军争取到抗日阵营中来。”

又说：“目前蒋介石正忙于处理两广事件，但他决不会坐视东北军打起抗日旗帜的。叫张学良不要和蒋介石闹翻了，要讲策略，不要太刺激他，从积蓄全国抗日力量的全局出发，对蒋介石要有更大的耐心，准备迎接更大的斗争。”

刘鼎回到西安后，得知张学良在南京参加国民党五届二中全会后去了上海，他按张学良的嘱咐，立即赶到上海，不巧，张学良已回西安，刘鼎在上海采购了一批药品和医疗器械，和潘汉年一起回到西安。向张学良转达了中央的意见，张学良听后表示同意，要想尽一切办法去劝说蒋介石。

西安事变发生的当天夜里，张学良告诉了刘鼎，要他通知中共中央，希望中央能派人来西安共商大计。刘鼎立即向中央作了报告。中央决定16日派周恩来等人前来，张学良要刘鼎乘他的专机去延安迎接。17日，刘鼎去延安接周恩来，在飞机上，刘鼎详细汇报了扣蒋的情况；张、杨两将军对蒋的态度及蒋的反应；南京方面的动向；宋美龄派端纳出面到西安探查与周旋的情况；东北军、西北军内部主张杀蒋和放蒋的争执；全国各地对事变的态度；英美等国的态度；张学良盼望中共来人协助处理的焦急心情等等。对周恩来等人了解全面情况，作好与张、杨会谈的准备，贯彻和平解决西安事变的方针，有着重要价值。

在处理西安事变的过程中，刘鼎参加中共代表团，在周恩来领导下常常是通宵达旦地工作，既要保卫代表团的安全，又要联络和协调各方面的关系。事变解决后，因蒋介石扣押了张学良，东北军一时群龙无首，内部矛盾激化，酿成了错杀王以哲将军的“二·二”事件。

西安事变后，刘鼎调到中共中央工作，历任延安军事技术学校校长、八路军总部军工部长、华北企业部副部长。新中国成立后，先后任重工业部、一机部、二机部、三机部副部长，全国政协常委。1986年7月于北京病逝，享年83岁。

（责任编辑：刘　文）

20年前中科院首次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

● 薛攀皋

1979年7月10日，国务院批准中国科学院关于增补学部委员的报告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随后，原有学部委员在不受行政干预的情况下，按照规定的程序，充分行使民主权利，通过无记名投票，差额选举出283名新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后改为中国科学院院士）。这是20年前，中国科学界实事求是进行改革取得的成果之一。

一

新中国诞生后一个月即1949年11月1日，中国科学院在北京成立。中国科学院不但是国家最高的科学研究机构，同时，按照《中华人民共和国中央人民政府组织法》的规定，她又是组成政务院的政府部门之一。它与教育部、文化部、卫生部和出版总署一起，受政务院文化教育委员会指导。1954年，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政务院改为国务院，中国科学院不再是政府部门之一，但仍然受国务院领导。

中国科学院成立后，就开始探索适应科学发展规律，按照科研机构的特点，不断改进领导方法，建立相应的学术领导和科研组织管理制度或模式。1953年11月19日，中国共产党中国科学院党组向中共中央提出关于目前科学院工作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1954年1月28日，郭沫若院长在政务院204次政务会议上，作《关于中国科学院的基本情况和今后工作任务的报告》。这两个报告的内容基本相同。1954年1月和3月，政务院和中共中央分别批准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中共中央还将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批转中央和政务院各部门以及各省、市、自治区党委就科学研究的重要性、尊重科学家、正确对待知识分子、为他们创造良好的科研工作条件与环境等方面，作了很长的批示。这是新中国建立后，中共中央有关科学研究工作的第一个政策性文件，对中国科学事业的发展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中国科学院在上述两个报告中都提出了依靠科学家的集体进行学术领导的问题，建议成立学部，邀请院内外优秀科学家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学部分工对中国科学院所属的研究机构进行学术领导。

两个报告获准后，着手建立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制度，并准备将来向建立院士制度过渡。经过一年多筹备，1955年6月召开了中国科学院学部成立大会。当时设有物理学数学化学、生物学地学、技术科学和哲学社会科学等四个学部，国内233名优秀科学家被选聘为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1957年，物理学数学化学部改为数学物理学化学部；生物学地学部分为生物学部与地学部。不久，哲学社会科学部划归中共

中央宣传部领导（它后来发展成中国社会科学院）。同时，又增补了21名学部委员。这两批选聘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虽然经过了科学家提名推荐的程序，但最后是由中央有关党政部门协商决定的。

学部成立后在中国科学院院委会领导下，团结全国科学家，在编制国家科学技术长远发展规划，评定全国自然科学奖励项目，审议中国科学院研究机构的设置及其方向任务，协调研究工作，组织全国性或国际的学术活动等方面，做了大量工作，为促进我国科学技术的进步与发展，推动国际科学合作与交流，做出应有的贡献。学部的工作受到国内外科学界的重视，在国际上也有一定影响。

二

好景不长，由于“左”的思想影响，特别是反右派斗争运动之后，中国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被重新界定，戴上了资产阶级的帽子。知识分子政策的摇摆，使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活动几起几落。从那时起，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再也没有增补过；原定的建立院士制度从此也不提了。

1966年“文化大革命”爆发，摧残文化，摧残科学，摧残知识分子。特别是1967年1月，上海市夺权风暴席卷全国，中国科学院北京地区的造反派联合夺取了中国科学院的领导权。他们在夺权后的第一号通告（1967年1月24日）中，即宣布撤销中国科学院学部，诬学部是中国科学院执行反革命修正主义科研路线，走“专家路线”，实行“专家治院”的产物，学部的一切活动被迫停止。接着，在全国各地各部门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都因“反动学术权威”的罪名受到批判斗争，一批学部委员被残酷迫害致死。

带给所有人的共同损失，是时间的损失。至十年动乱结束时，原有190名自然科学方面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中，三分之一以上已经作古，其余近三分之二的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已超过73岁，许多人年老体弱多病，行动不便。原有的四个学部的领导机构——常务委员会及其主任、副主任、残缺不全，其中数学物理学化学部和生物学部的正副主任全部谢世。

三

粉碎“四人帮”后，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决定，从1979年起把全党的工作中心转移到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上来。中国科学院党组不失时机地决定实现战略转移，把全院工作中心转到科学研究上来，加强科研现代化建设，更好地为实现四个现代化服务。

1979年1月15日，中央同意恢复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活动。1月26日，学部委员春节座谈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王震、方毅、邓颖超出席讲话。人民日报在报道中公布了到会的学部委员名单，在客观上起到了为学部和学部委员平反和恢复名誉的作用。春节前夕，中国科学院党组会议决定由副院长钱三强全面负责筹备增补学部委员以及学部的恢复重建工作。

1979年3月29日，中国科学院给中共中央、国务院呈送《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工作和院长、副院长等有关问题的请示》。其中包括增补学部委员，充实健全学部机构、修订学部章程，充分发挥学部委员的作用、建议由学部委员推选中国科学院院长副院长、筹备召开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等四个问题。《请示》勾划了重建学部工作的主要框架及其指导思想，其中最主要的是：(1)更加强调发挥学部委员和科学家的作用，使领导的决策能适应科学发展的形势；(2)民主选举增补新的学部委员。增补工作要注意充分发挥民主，事先要商定学部委员的增补办法；(3)院长、副院长的民主推选，对于发扬民主，促进我国科学事业的繁荣兴旺，会起到良好的影响。当年5月4日，中央和国务院同意这个请示报告，有的中央领导同志还指出：这是一件较大的改进工作。

四

为了使增补学部委员的工作有章可循并有序进行，经原有学部委员充分讨论不断修改完善，最后由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通过并报请国

务院批准的《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出台。

《办法》规定增补学部委员工作分为推荐、筛选、评审和选举等四个步骤。

一、推荐：原有学部委员可直接推荐候选人，但必须有两名学部委员推荐，才能成为有效候选人。此外，国务院各部委、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国科学院和各省、市、自治区直属的研究机构、高等学校，中国科协直属的学会，按系统向其推荐本单位、本学会的人选。

二、筛选：各主管部门对所属单位、学会推荐的人进行筛选后，向中国科学院推荐候选人。

三、评审：原有学部委员分学部对学部委员直接推荐的各主管部门筛选的有效候选人一一进行评审、预选，最后商定正式候选人名单。

四、选举：原有学部委员按差额选举原则，实行无记名投票。

当选名单经中国科学院院务会议核实后，报请国务院审批。

这里需要特别说明的是，关于“推荐”这一步骤之中，为什么《办法》规定既可由原有学部委员直接推荐，又可按组织系统推荐呢？当时作出这样一个两者结合相互补充的规定，是出于以下考虑：一是“文革”十年，全国科研工作正常秩序受到严重破坏，学术交流活动无法进行，大多数科学刊物停止出版，科学著作很少问世，科学界处于被隔绝的状态，即使对本门学科、本专业领域的动态也缺乏全面了解；二是在国防、部队系统工作的研究人员，因工作保密关系，长期埋名隐姓，不能与地方交流或公开发表研究论文报告。他们的成就与贡献更难为外人所了解。采取《办法》规定的这两条途径推荐候选人，恰恰可以弥补上述的缺陷。

原以为这是在当时特定历史背景下采取的权宜之计，所以在中国科学院向国务院的《请示》中，还特别说明了这一条只适用于1979年开始的这一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工作。也许是这两条途径相结合推荐候选人的办法有其可取之处，它竟然一直沿用于后来历届的学部委员和院士的增选中。这当然是后来的事情了。

1979年7月10日，国务院同意中国科学院呈报的关于《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工作的报告》和《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办法》，并批转各省、市、自治区，国务院各部委、各直属机构，总政治部、国防科委、国防工办等执行。中国科学院的《报告》，除了扼要阐述中国科学院学部的性质与作用，学部委员人选的条件，增选名额等等之外，再次强调了学部委员产生办法的改革。《报告》说：原有学部委员是在协商的基础上报请国务院批准后，由科学院聘任的。这次增补学部委员拟由现有学部委员投票选举，由科学院报国务院批准。

对这次增补学部委员工作，各部门，各省、市、自治区都很重视，由学部委员直接推荐以及各部门、各地按组织系统筛选推荐的人选，超过1100人（不重复统计）。按《办法》有关规定，对推荐材料进行审查，经学部主任、部主任、代主任联席会议确认的实际有效的推荐人选共996人。

对被推荐人选的评审工作，分别由各学部组织进行，工作量很大。许多学部委员不顾年老体弱，认真审阅材料，提出意见。评审分两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是通讯评审。每位学部委员在仔细审查被推荐人选的推荐材料及其代表作（研究论文、报告、论著）的基础上，提出可以考虑做为正式候选人的名单；第二阶段，原有学部委员于1980年3月28日至4月2日，集中北京，分学部集体评审，并在民主协商之后，按差额选举的原则，提出了总共367人的正式候选人名单（经国务院批准增补的名额为330人）。

1980年11月26日，学部委员进行无记名投票选举。投票结果获半数以上选票的候选人有283人（比原定增补330人少47人），加上原有学部委员117人，使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总数刚好达到400人。

五

当选的新的学部委员名单报请审批时，产生了小的周折。

民主选举的结果经各学部主任、副主任、代

主任联席会议确认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办公会议核查后，中国科学院于 1981 年 1 月 24 日向中央报送《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

1 月 29 日，中共中央书记处讨论中国科学院的报告时认为，在学部委员中要增加一些有真才实学的中青年科学工作者，学部委员的名额也可以多一点。当天，方毅同志在退给中国科学院的报告上签署：书记处今日已讨论过，请科学院遵照讨论意见研究再报。

对中共中央书记处的意见，可以有两种不同的处理方法。一种是由党政部门对当选名单进行调整；另一种是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向中央说明情况，提出可行的补救措施或办法。中国科学院选择了后者。当时科学院领导考虑到这是学部有史以来，首次民主选举产生新的学部委员，而且增补名单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产生的。抛开了增补办法的程序，由党政部门予以调整是不可取的；同时，按增补办法的程序进行补救，又非短期内所能完成。为此，中国科学院于 3 月 2 日上送一份同样标题的报告。报告说，在这次增补工作中，虽然注意并努力解决学部委员的年轻化问题，补选了一批 55 岁以下的中年科学家，但他们的人数仅占新增补学部委员总人数的百分之十四，比例太小。此外，这次增补学部委员的名额，比原定增补的名额少四十余人。有些学科领域的候选人没有当选；已当选的，各学科人数不平衡，也需要陆续补选若干学部委员。中央书记处的指示，我们完全同意。但是按照国务院批准的增补办法所规定的程序，增选学部委员需要较长时间，而且不通过全体学部委员会议协商，意见很难集中。因此，拟在今年 4 月召开的学部委员大会上，讨论增补一些中年科学家当学部委员的问题，并切实落实，逐步使学部委员年轻化。

中央也充分尊重民主选举的结果，没有要求科学院对增补名单进行调整。国务院于 3 月 23 日批准了中国科学院第二次《关于呈请审批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增补名单的报告》。3 月 29 日，新华社播发了中国科学院新增补的 283 名学部委员名单。

经过增补，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 400 人的平均年龄为 62.8 岁，虽然偏高，但比原有学部委员平均年龄小了近 10.5 岁；其中，50 岁以下的 18 人，最小的 41 岁；女学部委员由原来只有 1 人增加到 15 人。学部委员的专业范围更加广泛，包括了过去在国内是空白薄弱的学科和新兴的科学技术领域。代表性也较以往广泛，分属于 25 个部门。

学部委员增补工作结束后，中国科学院第四次学部委员大会于 1981 年 5 月 11 日至 20 日举行。邓小平、彭真、邓颖超、胡耀邦、赵紫阳、王震、韦国清、乌兰夫、方毅、王任重、薄一波、陆定一等党和国家领导人出席了开幕式，在会前接见全体学部委员并合影留念。5 月 19 日上午，全体学部委员选举中国科学院主席团，随后由主席团推选出严济慈、李昌、吴仲华三人为执行主席，以及中国科学院院长卢嘉锡，副院长钱三强、胡克实、冯德培、李薰、严东生和叶笃正。

5 月 20 日上午，中共中央书记处邀请全体与会学部委员到中南海参观并座谈。总书记胡耀邦同志在座谈会上讲话，他说这次大会选出了新的领导机构，是我国科学史上的一件大事，很值得庆贺。他殷切希望全国科学家奋发图强，深入实际找任务，以主人翁的姿态干工作。

在 1979 年 7 月开始的这一学部委员增补工作，原有的学部委员在不受行政干预的情况下独立思考，从对科学事业的全局利益的责任感出发，充分行使学部委员民主权利，投票选举产生新的学部委员，不能仅仅看做是一件孤立的具体事件。它是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恢复实事求是优良传统，改变观念的必然结果。它是我国科学界改革和民主生活中的大事，其影响超过增补工作本身。

(责任编辑:洛　松)

中国乡村民主化的第一步

● 辛秋水

民主化是中国乡村社会现代化的一项重要主题，而民主化的进程又具体地落实在一些民主程序和民主制度之上，其中表现人民当家自主的最佳方法及完美程序，莫过于民主选举。因而民主选举是中国乡村民主化的重要起点和突破口。

目前，全国各地乡村选举基本上是仿照或借鉴基层“人大”的选举方法，采取平行选举（或分别选举）的方法同时选举村委会的主任、副主任和委员。从选举制度本身来看，它只注重个体素质的选择，却忽视了整体的优化组合，并形成如下的民主悖论：在提名上越是充分发扬民主，越是难以形成协调合作的班子。事实上，由此产生的班子不团结、聚合力差、工作效率低等现象屡见不鲜。据一项权威调查表明，全国处于“松散、瘫痪”状态的村委会占1/3以上。我们认为，之所以产生这种现象与选举制度本身深层次的不合理性不无关系。

中国乡村社会完全不同于城市社会，由于人口流动性差，农民大都是世代定居在一地。由于这一基本特点，村民之间遍布血亲网，存在着错综复杂的血缘和地缘关系；也是由于这一基本特点，某些邻里、门户之间往往世代“冤仇”，见面就眼红，说话就顶撞，如果采取平行选举（或分别选举），一些血亲很近的人，如父子、兄弟、郎舅等很可能同时选到一个村委会班子里。这样，各种家庭、宗族力量就很容易干扰、操纵选举，滋长反民主、反现代化的分离性权威；而把世代冤家对头选到一个村委会班子里，更无法工作。由此可知，这些都是传统选举制度无法克服的弊端。

为此，我们安徽省社科院对乡村选举制度进行了长达10年的探索、试验，积累和创造了一套“组合竞选”的经验，取得了较好的效果。所谓“组合竞选”，就是首先由村民自由推选村委会主任、副主任和委员候选人，然后由村委会主任候选人在村民推选的副主任和委员人选中进行“组合”，即提名各自的竞选班子，参加竞选角逐。为了争取村民的信任，谁也不敢把自己的“九亲六族”拉进来，更不会把名声不好、明显带有某种集团（如宗族、自然村落）利益和经济利益关系的人，作为自己的竞选伙伴，否则他就会丢失选票。当然，他们也不会把同自己谈不来的人提名到自己的竞选班子中来。这样，无论谁当选为村委会主任，他都能驾驭自己的班子，不至于变成“散”班子、“软”班子、“烂”班子，从而达到优化组合的目标。

十年来，我们采取“组合竞选”的办法，先后在安徽省岳西县腾云村进行了三次村委会选举，在来安县邵集乡全乡8个村同时进行试点，都取得了成功。现已经扩展到阜阳、滁州等地。值得一提的是，地处贫困山区的腾云村前后三次民选的村委会主任都不是本村大户，这就充分说明了即使如腾云村这般封闭落后的山村，也并不是某些人担心的那样：宗族、宗派势力会严重干扰民主选举，地处穷乡僻壤的农民没有民主能力。由此看来，社会转型中乡村民主化完全能够健康发展，关键要在某些民主程序、民主制度上进行改革，以适应转型社会的特点。

其实，社会转型问题并不是乡村民主化的主要障碍。我们认为，主要障碍是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

现在学术界有一种流行的观点，很有代表性。这种观点认为:农民文化低,没有民主能力,加之农村家族、宗族力量的回潮，必须加强“国家力量的介入、干预(或曰‘指导’)”。“通过国家权力支撑下的公共权威的作用，抑制家族力量对村民自治的渗透”。可是,为什么1978年以前人民公社强大的行政干预,未能消灭家族力量?恐怕这不仅仅是一个政治性问题，而是一个文化、伦理的问题。因而,仍然采取过去的办法,显然是无用的,只能是重蹈覆辙。在乡村民主化之前，将家族及其营造的传统文化视为社会主义现代化进程的主要障碍，而以一种前所未有的方式将国家的权力渗人、扩展到乡村社会的各个角落,重新组织了一个“政社合一”的准军事化组织。实践已经证明，这种国家权力无限扩张,非但没有推进中国乡村社会的现代化,相反使乡村社会更加凋敝、落后、贫困化。同时,它也导致了国家权力自身的危机。

然而，后来的以村民自治为主要特征的乡村民主化却开辟了另一条道路，它不仅给中国乡村社会注人了生机和活力，促进了乡村社会的复兴、繁荣,而且还挽救了处于危崖的基层政权的危机,这是一条唯一的道路。我们有理由相信:通过民主的不断演习、不断训练，乡村民主化中的许多问题必将在村民自治中逐渐得到解决。村民自治就是广大农民在自己的社区内当家作主的最好“学校”、“训练班”、“操练场”。

大量的事实说明，现在不是国家“政治输出”的不足,而是“政治输出”过多和不恰当,阻碍了乡村民主化的实际进程。例如在村民选举中,乡镇采取各种形式干扰、破坏,许多地方选举是“新瓶装老酒”,与以前指定、委派村干部并没有什么实质性的差别。我们在调查中发现,村委会的候选人大多是由乡镇考察的，也有的是由村党支部提名,上报乡镇党委、政府审查批准确定。选民只能在拟好的候选人名单下划圈圈、打叉叉。选举村委会核心人物的主任一般不搞差额选举,即使实行差额选举,也是找一个与之悬殊明显的弱者陪选。据调查,大多数村委会选举,其候选人基本上是原班人马不动。我们在一个县调查时发现，某村的村委会选举一开始就是由村党支部书记一个人操纵的，他提名的村委会候选人是在原村委会人员的基础上，找了两个近亲做差额。试问,这种选举与过去指定、委派村干部有多大差别?而建立在此种选举制度上的村民自治还有什么意义?

这些指定、委派的村干部只对上级负责,而无视群众的意见和要求。上级要他们多提留,他们就会加倍地提留，以至于农民负担有增无减。一旦实行了村民自治,由村民自己来选举自己社区的领导人,这种权力(利益)结构就会发生变化,村委会的权力来源不是乡镇,而是人民群众。民选的村干部认识到自己头上小小的“乌纱帽”是人民给的,不是上级封的,他们就必然会对人民群众负责,争取人民群众的信赖。这样就从根本上割断了传统的乡村之间利益上的依附关系。

再从政治上分析，国家权力的过多介人势必造成社会的僵化和对个人的压制。“权威”的东西多了,自治的东西必然减少,民主是以尊重个人价值为基础的。政府应在其合法的范围内活动,而不能超出这个范围。《村民委员会组织法》明确规定:乡镇政府对村委会是指导关系而不是领导关系;任何组织都不得指定、委派或随意撤换村委会成员。如果我们为了避免家族、宗族等乡村力量的干扰而去求助于另一个“权威”,那么,一个集权怪物便又会卷土重来,而将中国“草根民主”的希望彻底压碎。

我们应当看到，尽管村民自治在中国农村推行已有十余年了，但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并未很快地退出历史“舞台”，现实的村委会毕竟是从人民公社制度中脱胎出来的，它仍然或多或少地带有“政社合一”的遗迹和准政权的功能。很显然,这种新旧社会结构交织的情形将会持续相当长的时期，传统的乡村权力(利益)结构仍然具有强大的惯性作用。因此,最后我们主张:清除乡村民主化的路障,必须适时进行乡镇一级的民主改革，其突破口就选择在乡镇长的竞选、直选上。只有乡、村同步进行民主改革,才能真正推进中国乡村民主化进程。

（责任编辑:李　诚）

用现代科学探索中医疗法的辛随成博士

● 徐玲玲

如果不是别人告诉我，我不会相信这位俯身在病床前为一位老大娘做了半个多小时按摩的大夫是一位博士。如今满世界都是按摩小姐，洗浴中心、康乐园、健身场所……哪儿没有按摩的呀。所以在我的心目中，按摩，实在只是一种简单的技能。如今看到一位博士如此认真地为病人做按摩，这就有些挑起我的好奇心了。

老大娘姓王，家住丰台区。据她自述，是因剧烈的头疼而住进武警总医院的。"都 14 天了"她说，"啥药都吃了，没用，疼得太厉害，晚上服 2 片舒乐安定都睡不着。昨天下午 6 点多辛博来给我做了按摩，又扎了针灸，昨晚就睡得很好，头疼轻多了。"

病人都叫他辛博，我原以为是他的名字，问过才知道，他的名字叫辛随成，辛博，那是病人对辛博士的简称。辛博告诉我，老大娘昨天住进的医院，他到病房来治疗，是应内科的要求前来会诊。"每天基本上都要在门诊和病房两边跑。"他说。正说着，他的呼机就响起来了。"门诊有病人等我。"他匆匆忙忙就走。门诊确实有病人在等他，且是两个。他为一个病人在两腿扎上了许多银针，趁这位病人在醒针之际，就开始为另一个病人按摩。

认识辛博纯属偶然。但我却产生了了解他的欲望。

"博士而做按摩这类的'体力活'，你不觉有些委屈吗?"我问。

"为什么?"他的脸上是真正的诧异，"只要是治疗需要，做医生的有什么委屈可言?"但他又笑了;"也难怪，你不是学医的，对我国的传统医学不会有真正意义上的理解。"辛随成，武警总医院理疗科主任医师。1992 年于黑龙江中医药大学获中西医结合神经内科硕士学位，之后留校攻读博士，1995 年获神经内科博士学位。1995 年，他的博士研究课题"针灸治疗脑梗塞的研究"获省部级科技进步二等奖，1995 年与 1996 年，中国科技出版社与黑龙江科技出版社先后出版了他的两部学术专著:《内科辩病治疗学》与《神经系统疾病定位诊断学》。

第二次去采访辛博的时候，他在门诊，这次是同时在给 4 个人治疗:还是先给一个病人扎上针，然后给另两位病人号脉开药，再给后一位病人按摩。"辛博的按摩手法确实很好。我的右腿原来上下楼都困难，这才来治疗八次，先针灸，再按摩，我现在感觉抬腿很自然了。"正在接受按摩的老太太说。于是我问辛博那位住院治头疼的老太太的情况。"她是神经性偏头疼，按摩加针灸治疗才三次，头疼就基本消失了。住院只三天就出院了。"辛博乐呵呵地说。

他又给我说起他治疗的另一个病例:一位姓穆的 60 岁女病人，同时患有糖尿病、高血压以及肾功能低下等病症。1997 年底，因脑梗塞致左侧肢体瘫痪，言语困难、饮水呛咳、小便失禁。入院后，经西医扩容、活血、脱水等治疗一周后，病情得到控制。但仍半身瘫痪，饮水呛咳，小便失禁，说话连家人都听不明白。根据病人的情况，参加会诊治疗的辛随成在维持原治疗方案的同时，及时增加了针灸、按摩、中药及功能训练的治疗内容。第一次针灸按摩后，病人就能用语言清楚地表达自己的意思，经过一个多月的西医及中医综合治疗，病人基本上恢复健康，得以重返工作岗位，至今未复发。

辛博士对我说，他认为:搞中西医结合的根本出路在于，医生能汲取中医、西医的诊疗优势，使病人在最短的时间内得到最彻底、最经济的治疗。而要做到这一点，医生必须博采众长。他说，与其他学科相比，实践经验对于一个中医的成长有更重要的意义。

"张晋、与致顺、孙申田三位博士生导师，是全国针灸界著名的临床专家，在理论上造诣精深，在学术上各有所长。六年寒窗，我坚持跟随各位老师出门诊，六年跟师出诊没一次迟到。看到一个个被疾病缠身的病人经他们治疗重获新生，我看到了一个医生的最大欣慰和最高价值，医术也有了很大的提高。"

"那么，你的按摩也是读研时在校学的吗?"

"是读研时学的，但不是在校学

的。那是一次偶然的机会，我认识了在哈尔滨很有名的按摩专家王选章。我看到他给我主治的一位脑出血恢复期的病人作了半小时按摩后，病人十几天来一直不能抬起的腿，抬得离床足有一尺多高，这让我十分惊讶。后来又观察了几次他的治疗，发现按摩确实对恢复期的神经系统疾病有着中西药无法比拟的效果。于是我决定拜王老先生为师，学习按摩。但王先生开始并不答应。他说：你已经是博士啦，学这些是大材小用，我不能让你受这委屈。后经我多次上门拜师，他才对我说了心里话。他说："现在搞按摩的人很多，但真正懂得这门技术的人很少。原因是人们的急功近利和不肯吃苦，学到点皮毛就招摇过市。按摩作为治疗病人的技术之一，以大量消耗体力为特点，所以没有吃苦的精神绝对学不好按摩。你一个文弱书生，学这个恐怕不太合适。"

在辛随成的执意要求下，王老先生答应了辛在他出诊时跟着看一看。得到这个允诺，辛随成马上买来了讲授按摩手法按摩基本功的书籍，从最简单最基本的按摩手法练起。每周一、三、五三个晚上，他则随老先生四处出诊。这样，三个多月后，王老先生收下了辛随成这个弟子，而后来，他更成为了王老先生的得意门生。

"祖国医学实在是博大精深，若想窥其精华，必须终身苦学。"辛随成沉思着说。

"但是，"他话峰一转，"针灸中药的独特疗效虽有很好的实际效果，它的理论却是以古代科技水平为基础，在解释针灸、中药的治疗机理上缺乏现代科学研究依据，这严重影响了其本身的发展和在世界范围内的推广。"

正是基于对祖国医学的热爱，辛随成在三年的博士生生涯中，除了刻苦积累实践经验外，更着眼于在继承前辈宝贵经验的基础上，运用现代科技手段对针灸治疗脑血管疾病的机理作深入的研究。他查阅了大量的资料，并对 194 例脑血管病人进行了临床研究，从而积累了大量的数据。此外他还进行了大量的动物实验研究。他的研究课题"针灸治疗脑梗塞的研究"得到了国家自然科学基金的资助，并获得了黑龙江省教委科技进步成果一等奖和黑龙江省政府科技进步成果二等奖两个奖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项研究，大量定量的数据使他得以从理论上明了针灸、中药、按摩这三种中医治疗方法的相辅相成，其综合运用治疗神经内科疾病，有着单一治疗无法比拟的良好的综合治疗效果。

辛随成兴致勃勃地给我讲述了他博士生毕业正式行医以后的第一个病例：一位患急性感染性多发性神经炎的病人，入院时四肢重度瘫痪，呼吸微弱，双侧等神经麻痹，严重丧失吞咽功能。几家大医院会诊的结论是：能保住生命就不错，站立行走至少是两年以后的事情。在用西药治疗的同时，辛随成每天给病人鼻饲一剂中药，从第六天开始针灸、按摩。第一次针灸后，病人便能咽一些稀软的食物，一个多月后，病人开始下地练习蹲下起立，60 多天后开始下楼散步，不久就病愈出院了。

"这个病人叫崔燕然，当时是武警唐山支队的中队长。从这个病例，我对我今后的努力方向和行医生涯充满了信心。"

"请问你学中医有家学渊源吗？"感觉到他对中医的热爱，我突然冒昧地问。

"家学？渊源？"他楞了一下，"不！我是一个地地道道的农民的儿子。我出生在晋北一个贫困山村。因为读书的人少，在我高中毕业成为回村知青以前，村里一直是雇用别的大队的人当会计。1977 年恢复高考，我原是想报考一所农业大学。但那时我家突然遇上了一个不幸：我的哥哥，一个 29 岁的煤矿工人，在一次塌方事故中胸椎被砸断，造成了下半身的完全瘫痪。全家人尝尽了疾病给人带来的痛苦和求医的艰辛。就在那时，我决定报考医学院。"

"如果说，决定学医是因为这个事故，因为痛感到一个好医生对生命的价值。那么，在后来的学习中，我确实真正喜欢上了中医学，深为它的博大精深而肃然起敬。"

"这不仅是我的职业，也是我的事业。"沉默了一会儿后，他又补充道。　　（责任编辑：致　中）

辛随成在临床诊病

《歌唱祖国》作者王莘风雨五十年

● 陈哲源

“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歌唱我们亲爱的祖国，从今走向繁荣富强……”

《歌唱祖国》以其强烈的感染力、震撼力把中华大地56个民族的儿女紧紧凝聚在一起。1951年9月15日，《歌唱祖国》在《人民日报》上发表，被文化部向全国人民推荐并定为国庆期间传唱的歌曲之一。从此，《歌唱祖国》唱遍了祖国各地，历久不衰。

但占这首歌和它的词曲作者，几十年来却几经风雨沉浮。

“文革”中的风雨

1968年9月22日，驻扎在天津支左的六十六军军长和当时天津市负责人王曼恬对王莘说，首长要见你。王莘知道，他们说的首长，就是指江青。王莘一到钓鱼台国宾馆，只见江青正在排现代京剧样板戏《奇袭白虎团》，休息时，江青对王莘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是聂耳、田汉创作的，田汉是叛徒、坏人，我想改国歌，你有意见没有？”

王莘心直口快：“国歌是人大通过的，要改先得有词，才能配曲。”

江青闻言不悦，说：“你的《歌唱祖国》有缺点。”

“有什么缺点？”

“第一，没有写文化大革命；第二，没有写工人阶级领导一切。”

“1950年我确实没有想到要开展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那时脑子比较简单。”

“我想把这支歌曲改一改。”

“流传已经18年了，恐怕不好改。”

尽管王莘不愿意，但是江青的一声令下，他也奈何不得。原词中的“五星红旗迎风飘扬，胜利歌声多么响亮……”其中的“胜利歌声”改成“革命歌声”，把原词中的第三段“美丽的土地，是我们亲爱的家乡……”改为“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开创中国历史的新篇章。”不久，红卫兵小将们把王莘作为“反动学术权威”、“黑五类”揪出来批斗，毒打，在一些好心人的帮助下，王莘迅速逃到乡下藏了起来。这时，妻子王惠芬正患宫颈癌在医院接受手术，照顾不了他。他在乡下躲躲藏藏一晃就是三年。

1975年，江青来天津看戏，一见王莘，就质问：“《歌唱祖国》谁叫你改的？”

“不是你叫我们改的吗？”

“改得乱七八糟，我呀，现在考虑把《歌唱祖国》的词原本改回来。”

“很好，我赞成。”

1977年5月访日演出归国后不久的王莘，又一场劫难又向他袭来，天津市把他揪出来，说他是“四人帮”余党。这样，王莘坐了三年班房。直到1980年，胡耀邦说《歌唱祖国》应该唱，便问天津有关负责人这支歌的作者现在怎么样？问题澄清后，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在这年5月将这支歌曲作为本台的晨播曲，直到现在。

坐着轮椅，18年来为儿童写了100多首新歌

1982年12月，王莘患了脑血栓。妻子王惠芬推着他上飞机坐轮船，参加20世纪经典歌曲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还深入革命老区看望贫困的群众。他拿不了笔，王惠芬就

替他执笔写词谱曲，18 年来就这样坐在轮椅上，为了孩子们谱写了 100 余首新歌。

是什么原因支撑着老人还要为孩子们写歌呢?

1993 年，中华民族文化促进会组织了“20 世纪经典歌曲演唱会”，并到全国各地巡回演出。王莘夫妇走了一圈后感觉到一个问题，那就是我们中华民族的危机——少年儿童成人化。孩子们没有自己的天地，上学回到家一打开电视，除了亲呀爱呀，哥呀妹呀，大多唱那种港台的流行歌曲，那些不适合儿童唱的歌曲；使他们的身心健康受到很大影响。他们老俩口是唱着抗日救亡歌曲长大，并走向革命斗争的。

王莘说，一支好歌可以奠定一个人一辈子，为什么我们一辈子这么坚定，我觉得这些革命歌曲对我们起了很大的作用。

现在“追星族”追到什么程度? 有的孩子为了要看一场演出，家里没有钱只好去卖血，卖血得到的 200 元钱还只能买一张站票。这事老俩口一听都起鸡皮疙瘩。

王莘他们到成都来演出会怎么样？组织者提心吊胆的。结果出乎意料，很多观众是流着眼泪看的。《歌唱祖国》由 12 人合唱，唱时台上台下拍着掌打拍子……

一位白发苍苍的老人说：“还是过去的歌曲鼓舞人心，你们这些作者应该为我们的孩子多做点贡献，多写点好歌。”

这句话打动了王莘的心，回家途中船过三峡，在船上老俩口商量着打算回去成立一个基金会，为推动爱国主义歌曲创作干点实事。

节衣缩食设立基金会

1994 年除夕，王莘夫妇和子女一起吃团圆饭，老俩口和孩子们商量，想用几十年来节衣缩食省下来的 6 万元钱，成立一个“王莘歌曲创作奖励基金会”，专门奖励那些对爱国主义歌曲创作有贡献的词曲作者。

王莘夫妇参加少先队夏令营开营仪式

孩子们理解父母的用心良苦。儿子王斌拿出了两万元! 小女儿王玉惠从美国归来捐了 2 万元，这样凑够了 10 万元，10 月 26 日，基金会正式成立。

1998 年 8 月，突然来了个通知，基金会活动资金达不到 200 万的将被取缔。王莘怎么也想不通，自已拿钱为国家办事，竟落得如此遭遇。某负责人出点子说：“200 万是活动资金。您找个企业家，款打进来后走一下账就出去了。你们不是为天安门广场铺石写歌填曲吗？人家那是几千万的工程，你们拿来走一下账不就行了吗?”王莘一听愤怒了：“我们作假去呀? 取消就取消，我们绝对不作假。”

后来，民政部门又同意基金会不取消了。基金会得到大家支持，办了很多事。

今年 3 月 25 日，基金会在天安门广场举行了“中华第一石”首唱式，这支歌是由王莘谱曲的，为建国 50 周年，天安门广场地面换了河北易县的花岗岩。5 年来，基金会先后将 3 万盘磁带赠给国旗班和全国 56 个民族少先队的代表，举办全国少儿卡拉 OK 电视赛，捐资兴建易县希望小学等等。王蕙芬说，9 月 18 日，“王莘歌唱祖国纪念音乐会”将在北京中山公园音乐堂举行，届时，台上台下千人大合唱《歌唱祖国》，为建国 50 周年献上一份心意。

（责任编辑：刘　文）

为中美友谊奔波终身的罗森夫妇

● 高 梁

这里，我愿向大家介绍两位多半个世纪以来对中国人民真挚友好而且终生不渝的美国夫妇。他们不是演唱家，然而，当1937年，白求恩大夫来中国途经纽约，在一次集会上介绍中国抗战的情况时，他们当场高唱起中国的《义勇军进行曲》，带头在群众中开展了支援中国抗战的募捐活动；随后他们每年都把募集来的药品、医疗器械和款项，通过在香港的宋庆龄转送给中国前线和敌后根据地；当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宣告成立的这一天，他们夫妇再也抑制不住内心的欢悦，同著名的美国黑人歌王保罗·罗伯逊一起，臂挽着臂地走上纽约街头，高唱已定为我国国歌的《义勇军进行曲》，许多行人听到歌声纷纷参加进来，一起庆祝新中国的诞生。

他们是世界著名的美国耳科专家赛缪尔·罗森，他的夫人积极的社会活动家海伦·罗森女士。

一

赛缪尔·罗森于1897年出生在美国纽约一个穷苦移民的家庭，靠勤工俭学进了大学。医学院毕业后，在妻子海伦·罗森的帮助下，在纽约开了一所耳科诊所。他们夫妇是白人，却对黑人十分同情。他们经常议论，人类之间应当是平等的，人生的价值在于追求公正、和平、相互尊重、充满爱心的人类社会。1936年当德、意法西斯侵略和颠覆西班牙人民共和国时，罗森大夫积极支持了西班牙人民反法西斯的斗争。不久，他们读到了埃德加·斯诺在美国出版的《红星照耀中国》一书(即《西行漫记》)，从书中了解到中国劳动大众的苦难，和中国红军为中国人民解放而进行的艰苦斗争及其举世闻名的长征，他们无比兴奋激动，开始关心和同情中国人民的革命。

1937年他们在纽约“中国城”一次集会上结识了白求恩大夫，听他谈到中国抗日前线十分艰苦和缺医少药，他们立即组织起一个委员会，向社会各界呼吁，并为中国抗战四处奔走，募集药品。开始时，由于政治缘故，他们不便把募集的药品从美国寄到延安，罗森夫人就专程赶到加拿大，从那里寄出。后来，了解到宋庆龄在香港成立了“保卫中国同盟”，他们就同她建立起联系，每年都把募集来的药品等，包括他们用自己收入买来的物品，寄给她，通过她转送给中国敌后抗日根据地。

1949年10月1日新中国诞生，他们热情欢呼和支持，并联系各界积极要求承认新中国和美中关系正常化。他们的行动，激怒了当时仍支持蒋介石集团的美国当局和反华势力。凡支持过中国人民，尤其是在物资方面公开支持过中国人民革命的人，都遭到了非难。罗森夫妇的诊所处于联邦调查局的严密监视下，连病人都不敢再到诊所治病。从此，他们的生活遭遇到连续多年的艰难困苦，连孩子们上学的费用都成了问题。

在这困难的岁月，罗森夫妇在政治信念上毫不动摇，在医务上更加兢兢业业，刻苦钻研，1952年，一个奇迹发生了，一位耳聋了19年的病人，经罗森大夫创新地施行了镫骨手术后，竟然恢复了听觉。这一成功立即在全国引起轰动。但由于政治上的原因和美

国医学界的保守，罗森大夫的创新手术并未被医学权威承认，反而受到抵制。他不得不到国外许多国家行医，医治好大批病人，受到世界的好评，美国医学会才承认了他的成功并给予他应得的表扬与奖励。

他们由于在国内处境困难，曾去到欧洲、非洲、中东、东南亚的许多国家行医或教学，传授耳科手术技法。这使他们在视野上更加宽阔，更加了解了世界面临的问题以及世界人民反对战争、要求和平的强烈愿望。他们为新中国日益发展壮大而高兴。几次路过香港时，都眼巴巴地渴望访问中国大陆，但由于美国当局发的护照有严格限制，不能实现他们梦萦魂牵、情系中国的愿望。

二

在国外期间，罗森大夫曾应邀到列宁格勒参加一次关于耳科的国际讨论会，中国的一批耳科医生也参加了，他不仅向他们示范，同他们一起探讨，而且把自己随身所带的一套器械请他们带回中国。他庆幸自己终于满意地把自己的手术技术传给了中国的同行。

后来，在他们夫妇访问印度时，当时的印度总理尼赫鲁接见了他们，并谈到他的一位堂弟、印度驻中国大使拉丹·库·尼赫鲁犯有传导性耳聋病，希望罗森大夫能给他治疗。但这位大使正在中国任职，当时美国当局不允许任何美国公民访华，他们只得把这位大使请到香港来，精心地给他进行了手术，使他很快恢复了听力。后来，在北京的一次招待会上，周恩来总理发现这位印度大使的听觉完全恢复，非常惊异。这位大使不仅原原本本向周总理叙述了治愈的经过，而且还介绍了罗森大夫如何著名，他们夫妇如何热爱中国和多么渴望访华。

1971 年周恩来接见罗森夫妇

不久，周总理指示中华医学会邀请罗森夫妇访华。这对夫妇意外地接到邀请后，无比激动，立刻整好行装，准备出发。但遗憾的是，由于当时美国国务院插手，这次访问终于未能成行。

1971 年 4 月，随着“乒乓外交”和美国乒乓球队访华，中美人民友好往来的大门打开，周总理立即考虑到这时应该正式邀请罗森夫妇访华了。他指示中华医学会发出邀请，罗森夫妇多年梦寐以求的事终于实现。这次邀请访华的还有其他三位著名的美国医生。他们是中美关系史上应邀访华的第一批美国医生。

1971 年国庆前夕，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举行盛大国庆招待会，罗森夫妇应邀参加。为了表达他们兴奋和感激的心情，这对老夫妇决定在同周总理交谈时，用一句中国话作节日的祝贺，于是，罗森夫人就学了一句中国话“热烈祝贺你们的国庆”。他把这句话的英语拼音写在左手掌，以便忘记时备用。谁知当她面对周总理时，由于太激动，她竟念不成句，发音也不准确了。周总理一边听，一边亲切地帮助她纠正发音，宾主心里都非常高兴。

第二天，周总理又专门会见了他们夫妇，同他们进行了推心置腹的交谈。周总理感谢他们长期以来对中国人民解放事业的同情和支持，赞扬他们对两国人民友好事业所作的努力，并希望他们继续为这一事业做出贡献。

在这次访华中，他们不仅

怀着极大的热情了解了新中国各方面的变化，特别是医学方面的成就，而且走到那里，就把耳科手术的知识和经验毫无保留地传授到那里。他们同北京、上海、广州的医学界进行深入的探讨，并且共同酝酿发起了一项美中医学交流合作的计划。

三

当他们 1971 年 11 月结束访华回到纽约时，世界形势已发生了一个重大的变化，中国恢复了她在联合国的合法席位，我作为我国代表团的先遣小组人员，先期到达纽约。罗森夫妇估计到我人生地不熟，会遇到困难，就主动协助我，并请我到他们家中做客，给我介绍美国各界人士认识。在我们相识中，曾有一段这样的佳话：因为我是从新中国先期到达的第一个人，《纽约时报》把我穿中国制服的大张全身照片，登在显著版面上，并把我的穿着称为“毛式服装”；几天后，这家报纸又以整版篇幅，图文并茂地介绍中国服装，其中一张大的照片就是罗森夫人，她穿着一套从中国带回的竹花锦锻衣裤，双手伸在口袋里，姿态优美而大方。当时中美朋友都在为此议论。我并不认为这是严肃的和有意义的事，而罗森夫人却对我说：“不，我们就是要让人们了解中国的文化。美国人既不了解又十分渴望了解新中国，我们要用各种机会介绍中国美好的形象”。

在此期间，我经常看到他们夫妇四处奔波。他们在大学、医院、教堂做报告，开讨论会，他们还到美国各地介绍他们的访华见闻。他们认为，美国人民虽对新中国缺少了解，但却存在着对中国人民的巨大兴趣和“友谊的水库”，需要人们努力去开发。

1979 年 1 月 1 日，中美两国建立了外交关系。这一天，纽约爱国华侨兴高采烈，举行了盛大的庆祝游行和集会。当天下着倾盆大雨，气候异常寒冷，高龄的罗森夫妇既冒雨参加了游行，又出席了庆祝会，罗森夫人还在会上讲了话；接着，他们又风尘仆仆地乘飞机到华盛顿去参加了中国驻美大使馆的开馆仪式和招待会。他们把多年盼望的这一天，欢悦地称为“冬天的解冻”。

四

1976 年 1 月，罗森夫妇访华期间，周恩来总理与世长辞了。他们夫妇同中国人民一起，不知流下了多少眼泪。当时，宋庆龄副委员长为了安慰他们，把一张周总理生前的照片送给他们，照片背后写着：“送给我们最好的朋友罗森夫妇。”回国后，他们把这张照片一直摆在他们的写字台上，以示永远的思念。

1981 年 11 月是他们第 9 次访华，访问中非常紧张而劳累。在愉快地完成了这次访华任务的前夕，北京朋友们正为他们送行，罗森大夫突然感到身体不适。他们的好友吴蔚然大夫立刻用车护送他到首都医院检查。当夜，在病房由罗森夫人陪伴，他们还情意绵绵地回忆着中美两国建交时两人冒雨参加游行，以及建交后两国关系不断发展的情景。罗森大夫表示，今后他们要多募集一些基金，专用来资助更多的中国青年医生到美国去参观深造。

就在第二天清晨，罗森大夫突然腹部剧烈疼痛，医院医生、护士急来抢救，但他已昏迷不醒，直到下午 4 时半，这位 84 高龄的、中国人民的好朋友，终于因腹主动脉瘤破裂大出血，于 1981 年 11 月 5 日猝然与世长辞了。

他的不幸逝世，中华医学会、对外文委、对外友协等单位于 11 月 10 日在北京沉痛而隆重地举行了纪念会。罗森夫妇的知交、当时任副总理兼外长的黄华同志出席了纪念会并讲了话，对外文委主任黄镇、对外友协副会长侯桐、外交部副部长章文晋、卫生部副部长黄树则，他们生前的好友马海德、吴蔚然、韩素音以及美国驻华大使恒安石等 200 多人参加了纪念会。罗森夫妇的儿女也通过黄华安排，免办签证，从美国赶来向父亲遗体告别。

按照罗森大夫生前遗嘱，他的一半骨灰撒在他热爱的中国土地上。

罗森大夫逝世后，失去爱侣的海伦·罗森并未被悲痛压倒，她继承丈夫的遗志，更加热情地为美中两国人民的友谊而献身。她每年都到中国一次或两次，每次都率领一个

范围更为广泛的访问团到中国参观，从内蒙古到海南岛遍布着她的足迹。后来，她虽患眼疾而双目近于失明，但仍在美国建立了“罗森大夫基金”，四处奔波去寻求支持，募集资金，以完成他们每年从中国选派几名年轻医生到美深造一年的计划。

五

1990年8月，我到美国中西部的堪萨斯城去参加关于埃德加·斯诺的学术讨论会。当时，听说罗森夫人眼疾恶化，已双目失明，我专程来到纽约，同“新世界出版社”主编陈休征一起去看望了她。的确，她不仅双目失明，而且已苍老削瘦，她已看不清我们的面孔，而只能以声音来辨别；我给她带去的一件礼物，她也只能用手抚摸去鉴赏。然而，她那善良美丽的面庞、娴静文雅的神态和爽朗乐观的语音，依然如故；她的一片深情与爱心仍然如一团热火那样，给人以无限的温暖。她已从十几年前的宽大住宅，搬迁到一套一般的公寓里，家中只雇用一个临时仆人照顾她的生活。她这样做，是为了把节省下的钱，用来资助在美的中国留学生。看到她在双目失明的状况下，仍然毫不歇息，拄着拐杖，四处奔走去募集资金，以资助中国医生在美深造，实在使我们感动。

交谈中，针对当时美国反华势力借“人权”为由掀起的“制裁”中国的那股逆流，她斩钉截铁地说：“什么‘人权’？这不过是用来干涉中国内政的借口！让他们看看自己国内黑人的状况吧，哪里有他们所说的‘人权’呢?!”

1993年，她在双目失明后又一次访华，我前去北京饭店看望她，并代表“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聘请她为研究会名誉理事，她欣然接受了。我告诉她，这一年是她和我们中国人民所敬仰的美国黑人领袖杜波伊斯诞辰125周年，研究会计划举行一次学术讨论会以表纪念。她听后极为高兴，并建议在纪念会上播放些黑人歌曲。回国后不久，她就托人给我们带来一套黑人歌王罗伯逊的独唱录音带。我们在纪念会上播放了，其中有这位歌王演唱的我国国歌《义勇军进行曲》和民歌。

一年后，她又给我寄来一篇托人代写的文章，这是她为英文版《罗森大夫自传》补写的后记。文中回述了她同罗森大夫对中国的热爱，并说：“全世界人民有着他们的共同点多于其不同点，而我们必须永远尊重这些不同点；全世界的男女都需要尊严，需要平等和教育，需要幸福的生活和美满的家庭，也需要某种的稳定性……”，“我深感我在中国有许多最亲爱的朋友，我真正地在中国有了第二个家”。

1998年，海伦·罗森夫人91岁了，她因年老而患了重病。她好像预感到不久人世，在双目失明的情况下，挣扎着用颤抖的手给她的知交黄华写了一封短信，字体很大而模糊，信中谈到她对北京的朋友

作者与海伦·罗森

们的思念之情和她时刻关注着中国的改革与发展。就在这封信发出不久的6月12日，中国人民的真挚友人海伦·罗森夫人在纽约溘然长逝了。逝前，她完成了对新中国的第27次访问，她无悔地实现了丈夫的遗愿，一共资助了88名年轻的中国医生到美国深造后回国。

按照她的遗嘱，她的儿女和孙儿携带着她的一半骨灰，来到北京。1998年10月1日，中华医学会、宋庆龄基金会和中国国际友人研究会为她举行了葬礼，把她的骨灰撒在位于长城附近的“国际友谊林”里。她在北京的好友们在撒骨灰处栽种了两棵青松，并准备在明年的10月1日，在这里为他们夫妇树立一座永恒纪念碑。

(责任编辑：致　中)

莲花区旗即将与五星红旗一起升起

● 宁 军

1999 年 12 月 20 日，当世纪之交的钟声即将敲响之时，在澳门主权回归的盛大庆典上，这面区旗也将与五星红旗一起冉冉升起。

标志着澳门特别行政区形象的区旗区徽，有历经了 3 年的一轮轮评选过程，既要表现祖国与澳门的关联，又要表达澳门自身特征，难度可谓大矣。征稿启事发出，海内外人士寄来的应征作品数以千计，但要选出其中最满意者，经各方领导、专家和各界人士充分发表意见，多次反复最后才达成共识。

这个设计方案简洁明了：5 颗星星闪烁，象征国家的统一；一朵莲花盛开，表示澳门的兴旺发达；三个花瓣代表澳门由三岛组成；大桥海水点明澳门的自然环境；区旗区徽的底色选用绿色，衬托着星星的黄色、大桥海水的白色，升华着和平繁荣发展的主题。其中莲花作为图案主体处理，深得澳门同胞喜爱。

设计者肖红是黄河岸边的青年画家，他是古城开封一个普通教师的儿子，一个大学艺术系的美术教师。尽管他高中没毕业就考进大学艺术系，尽管他的作品人选全国美展，尽管他的徽章设计在省市多次采用，可他还属于默默耕耘者，他磨练着画笔期待一个展示的机遇。这机遇在港澳回归前降临了。

在征集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的告示公布后，肖红设计的紫荆花图案在 7 千件来稿中一举夺冠。1990 年 4 月，国家主席杨尚昆发表第 26 号主席令，确定香港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方案即采用了肖红的设计构想。

1997 年 7 月 1 日零时，雄壮的《义勇军进行曲》在香港会展中心响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国歌托举着五星红旗和紫荆花旗升起来。

肖红设计香港特别行政区的区旗区徽大获成功，因为他以丰富的想象力和卓越的艺术表现力，简洁而出色地刻画了紫荆花这个香港的市花。当肖红设计澳门特别行政区区旗区徽时，选定莲花来形容澳门无疑也极为恰当。在澳门区旗区徽征集评比大赛上，肖红方案荣获区旗一等奖，区徽二等奖(一等奖空缺)。

1991 年 2 月，肖红在河南接到澳门特别行政区基本法起草委员会通知，进京参与钱伟长主任亲自主持的修改定稿，然后提交全国人大会议审议。

莲花，位居“中国十大名花”之列。澳门同胞对她情有独钟。每到莲花绽开的时节，扶老携幼去卢廉若公园赏莲，是澳门民间的一大盛事。那碧绿的莲叶，那粉红的莲花，那阵阵的莲香，如都市之中的天籁，托起一片清新的意境。

澳门同胞喜欢莲花，并引申出“莲艺文化”的概念。他们成立“莲艺文化协会”，发掘史迹、文献和艺术珍品，提出了诗词、歌曲、舞蹈、书画、雕刻、工艺、织锦、建筑、宗教、联谊等方面的影响，唤起人们对莲花区旗的亲切感情。

莲花无言，却震撼全球。正如香港《中报》载文所言：收回澳门这一声音，若发自 80 年前的清王朝之口，说不定又会引起列强们的一番抗议，再演一场“八国联军”血洗津、京的惨剧；这一声音，若发自半个世纪前的南京政府之口，殖民地宗主国也完全可能一笑置之，或者出现一场外交危机。

20 世纪末的中国政府向

全世界宣告，在本世纪内收复香港和澳门，主权不容谈判。这是出自中国领导人之口的承诺，是中国扬眉吐气的时刻。

中国的贫弱一去不返，莲花区旗将一洗百年民族之耻。

中原画家肖红期待着。海内外的华夏儿女期待着。这期待因为莲花区旗的诞生变得更加具体更加迫近。一朵莲花图案牵动澳门和内地，永远是一段佳话。因为澳门区旗区徽，溶汇祖国对澳门的深情，也凝聚澳门对祖国的挚爱。

澳门占人口的97%是中国人，他们从来没有忘记自己脉管里的血液。祖国的昌盛，民族的兴盛，使他们和内地同胞一起分享自豪和喜悦。祖国和他们扯着筋连着脉，他们比谁都更能深刻地体会到祖国母亲的深刻含义。

是啊，祖国往昔遭遇坎坷曲折，他们和内地同胞一样迷惘、困惑和忧心忡忡。澳门的朋友谈起文化大革命的浩劫哭笑不得，伤害的何止是祖国内地同胞，澳门也和香港、台湾一块儿列入"海外关系"，株连了内地的亲属成份不好，残酷的内耗居然连常识也不顾忌了，澳门什么时候变成了"海外"？

人们都不曾忘怀，卢沟桥枪声骤响，一直寓居澳门的北伐名将叶挺将军毅然返回内地，出任新四军军长。由于澳葡当局不敢得罪日本，禁止澳门公开的抗日活动，各界民众便在"抗灾"的旗号下汇入了中国的抗日大潮。

澳门上层工商界人士组成"澳门各界救灾会"，青年爱国社团组成统一的组织"澳门四界救灾会"，连沦落风尘的女子也不忘国耻，组成了"花界救灾会"。"起来，不愿做奴隶的人们！把我们的血肉筑成我们新的长城……"站起来与侵略者抗争的中华民族之中，就有千千万万的澳门同胞！

澳门为祖国而含悲。澳门为民族而激奋。从富裕大亨到小商小贩，从穷苦劳工到家庭妇女，包括背着书包的少年儿童，争先恐后慷慨解囊，资助国内购买战机和大炮，声援抗日前线将士。当时十余家舞厅"义舞筹募"是一大新闻，舞女们分文不取，当晚舞票收入全部购买国内发行的"救国公债"。

"七·七"事变一周年，饮食行业店铺"素食筹募"，此日停售荤食，出售印有"毋忘七·七"字样的素食品，所得货款捐献抗日事业。事后，全澳"义卖"活动持续40天，茶楼、酒家、饭店、冰室、咖啡馆、理发店、报摊等各行各业全部参加。澳门同胞岂止是"献金"，分明是献出了对祖国的一片真情！

整个抗日战争期间，先后有几百名澳门热血青年投身于内地的战地服务，他们告别澳门亲人奔赴抗日疆场，有的参加运送弹药和粮食，有的参加救护伤病员，还有的穿上军装拿起武器，面对面地和日本侵略者浴血厮杀……

为祖国神圣抗战的胜利而流血而捐躯的中华儿女成千成万，不乏出自澳门的一代英雄。1939年10月的一次抗击日寇的激战中，抱着炸药包爆破桥梁时中弹牺牲的梁捷烈士，就是其中杰出代表。梁捷烈士倒下了，但他的年轻生命不死，他热盼的灵魂不死，他在中华民族的辉煌崛起中获得了永生。在他的身后，是与祖国生死与共的全体澳门同胞。

莲花区旗区徽的诞生，足以使澳门为国为民奋斗的先驱们欣慰。（责任编辑：刘文）

鼓励记者讲真话

● 杜导正

讲真话，是一个在新闻界长期议论的话题。它在当前仍有着极强的意义。保护和鼓励记者讲真话，反映真实情况，对处于领导位置的同志，尤为紧要。

刘少奇同志 1948 年 10 月 2 日《对华北记者团的讲话》，对这个问题，有透辟的阐述。他说："我们坐在这里，危险的很哩！搞错了没有？这是我们经常要考虑的问题。"他说，党领导的记者和新闻机关，担负着下情上达，上情下达的任务，是党领导与人民最紧要的联系渠道。别的渠道也有，但没有这条渠道这么频繁而便捷。所以党作出一项决议后，党中央是很想依靠你们到群众中去考察，看看这决议执行中有什么问题。对就是对，不对就是不对。群众真正满意，你们反映上来，我们更放心了，那我们便坚持下去；群众基本满意，有不满意的地方，我们就坚持对的部分，修正不恰当的部分；如整个决议错了，那我们就接受群众意见，更改这个决议。所以记者的责任太大了，太光荣了"。他几次语重心长地说，你们反映了真实情况，帮助了党，我们感谢你们。但是如果讲了假话，导致中央做出错误决策，那可就害死人了。

少奇同志这篇著名谈话，教育了一代记者。这一代记者，建国前后，说真话成为一时风尚。但反右派、反右倾后，这个风气便消失了。变坏了。记者多看上级眼色行事，上边喜欢什么，记者报什么。上级厌恶什么，多数记者就绕开不敢写。好了，这便产生了 1958 年大跃进、大炼钢铁、人民公社时的记者竞放高产卫星，徐水县已进入共产主义天堂等等现在说来好笑，当时却信以为真的报道局面。我也是很卖力的一个，广东省北部山区连县星子公社亩产水稻 3.6 万斤的新闻是我批准发往北京的，三餐干饭不要钱的名口号名新闻，是我撰写的。回头看，1958 年三面红旗捅了那么大的乱子，自然是许多因素造成的，但新闻记者的海水般的虚假报道，片面报道，确起了煽风点火的恶劣作用。1960 年、1961 年，大跃进的闹剧酿成悲剧，成千成万人饿死了饿肿了，而新闻机关新闻记者的公开报道甚至内部参考报道，却仍然是莺歌燕舞歌舞升平。它对中央认识并纠正错误，制止悲剧的恶性发展，继续起了粉饰的作用，延缓的作用。至于"文化大革命"中，不实报道，颠倒黑白的报道，导致了什么结果，更不必提了。新闻机关新闻记者，不能如实反映情况的教训，太沉痛了太深刻了。

我是 1977 年夏从广州调回新华总社，1982 年初奉命到《光明日报》工作的。当时，中央在邓小平、陈云、叶剑英、胡耀邦领导下，整个党的求实求真风气越来越好。中央十分重视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真实情况。就是直接领导《光明日报》的邓力群同志，那时也是很保护报社与记者如实反映下情的。在这种良好的氛围里，加以我本人在反映实情上有过切肤之痛的体会，所以在这个重大问题上，我以为《光明日报》记者那几年做得是较好的，《光明日报》领导成员，也还是称职的。

那五年《光明日报》歌颂

优秀知识分子如孙冶方、蒋筑英、张华、华山抢险英雄群体等等，一是一，二是二，事实准确，歌颂有度，读者是信服的，已经受住了历史的检验。对党政领导中有关政策执行中的偏差、漏洞、错误的揭发与批评报道，《光明日报》也作了有声有色的积极报道，连续报道。山西太原"关系香烟"的报道，就是这样。这烟厂成十条成百条的被上级领导人无偿索取，或本厂领导人为讨好上级，成十条成百条的送礼，职工看在眼里，极不满，就是不能反映，反映无效。《光明日报》用列表格的方法，将姓名、职务、收受香烟条数、时间，在报上一一公布。引起震动，以后又将按价还款的姓名、职务、时间公布，效果极好。当时全国正轰轰烈烈地贯彻知识分子政策，而北京市怀柔县却发生了村干部殴打三个女教师的事件。《光明日报》抓住这个事件，作了连续三个月的报道，发表批评新闻、特写、评论74篇，5.4万字。都引起小平同志注意，指示了处理意见。《光明日报》还做了许多典型的批评报道，效果都很好，根本没发生什么负效应。《光明日报》那五年，还鼓励记者，采写了大量只供领导机关参考，不公开发表的内部材料，内部信件。鼓励记者本着对党对人民负责的态度，将看到听到的真实情况，大胆发到报社，在报社内部刊物上发表。有些，报社作为手抄件，报告了中央和有关部门。少奇说："鼓励你们去考察，依照你们的材料、看法提出问题来，如果政策正确，就说正确，如果政策错了，就说错了。你们不仅可以这样做，而且你们的任务就是如此——在群众中考察党的政策执行得怎样。你们不要怕反映黑暗的东西。"这一条《光明日报》记者那时大体上做到了。

少奇同志对华北记者团谈话，用很多篇幅谈了掌握真实情况很不容易。说你一个记者，初来乍到，群众有些话不会跟你说的。必须坐在炕头上，慢慢扯，一礼拜不行，两礼拜。我从我这个老记者的亲历中，包括《光明日报》那五年，则感到掌握真实情况，并非那么困难。表扬报道，批评报道，内部反映情况，真实，准确自然是第一位的，不可马虎一丝，但不是很难的。难的，最难的，是真实情况已完全掌握了，但是考虑到这事触及到高层领导干部的痛处，可能引起决策者也就是领导人的不愉快，有时甚至给自己招来横祸——对报道者的打击报复，当记者的此时便犹豫起来了，报社领导也犹豫起来了。《光明日报》那五年，这样情况，不能说没有发生过。我的想法是，反映真实情况，一要准确，二是积极，即反映的后果对党对国有利，三要勇敢。这三点中，最难的是勇敢，这要有一点无畏精神。我的体会是，是非不清，不要说话；是非清了，情况清楚了，又事关紧要，就要学习彭德怀、胡耀邦、邓拓、田家英，像刘少奇对华北记者团讲话要求的那样，挺身而出，不计个人得失，道出真情。这个问题上教训太多太多。《光明日报》那五年大体上做得还好，还是可以告慰老朋友的，我心里至今也觉得踏实。

（原载国家新闻出版署主管《报刊管理》）

编辑先生：

贵刊今年第八期王珺先生所写《中共特别工作开创者李克农》一文，介绍了李克农的丰功伟绩。该文中说："1945年党的'七大'选举中央委员，康生虽然没有落选，但名次在李克农之后，给他刺激很大"。据中共党史出版社所编《历届中共中央委员人名词典》查证，李克农在党的"七大"时只是正式代表。直到1956年9月在党的"八大"时，李克农才当选为中共中央委员，名次确在康生之前。以上事实，请予更正。

吴永胜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钱理群

北大百周年校庆庆典活动的帷幕已经落下，喧嚣过去，一切归于平静。这正是反思的时机。

这些日子，我们谈了很多——关于北大；也写了许多——关于北大。但凭着我的直感，我们仿佛又无意地遗漏了，甚至是有意地遗忘了不少——同样是关于北大。我想起了刚收到的一位老同学的来信，说到校庆那天，“怀了不少旧，但似乎都局限在‘反右’以前，这也难怪，后面的事不好说了……”我懂得他的意思：在我们这些老校友的北大记忆里，原是深藏着那一段或难堪，或痛心，因而“不好说”的历史，谁愿意轻易搅动——“避重就轻”本也是人之常情……

如果这仅仅是个人的记忆，不好说就不说，生活中类似的事太多，哪能老是念念不忘呢？

但如果这是一所学校，以至一个民族，一个时代的记忆呢？——我翻遍为北大百年所写的令人眼花缭乱的各类图书，竟然发现：关于1957年的这一段，在北大的历史叙述（记忆）中已经消失，变成一片空白，仿佛什么也不曾发生，不留半点痕迹！仅有的一本却仍然把这段历史描绘成一小撮“右派”学生在“诬蔑”、“攻击”……让人仿佛又回到了当年……

我不禁打了一个寒颤。——无论遗忘或坚持，都令人恐怖！

我于是想起了那一本书——那是“大批判”时，校方发给每一个学生，作为反面教材的“右派言论汇集”；当时我有个收集资料的习惯，朦胧中仿佛意识到这或许将是一个历史文件，就把它小心地保存了下来（可见我大概从头就是一个“谬种”），文革后期退还抄家材料，它又奇迹般地回到了我的手中，却不料在向周围的年轻朋友炫耀中不知被谁“没收”而后悔莫及——连一本书的命运也会有这般的曲折……

于是我又四处打听，寻问，终于通过某个途径找到了，而且还有好几本，真是喜出望外！

我迫不急待地打开了书……

我首先要寻找的，是因为聚集全校最出名的“右派”而引人注目的《广场》的“发刊词”，那是可以视为这个思想群体的宣言书的——

“大鸣大放成为这次运动的精神实质。毫无顾虑地发言，为真理而作好争论，以及为证明一些新生的主张、观点，天才的创造，都将如雨后春笋般地诞生！（注：原文如此）中国将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春秋诸子百家争鸣，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以少年事叶（注：原文如此）为风骨的、建设文学的再生，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盛（唐）般的诗的创造，会到来社会主义时代的‘五四’新文化运动！”

“伟大的马列主义的不朽理论会得到进一步更全面更正确的运用、阐明和发挥！党会因此而更强大更有生命力！人也会因此而返老还童，而具有十分鲜明可爱的社会主义个性！”

历经人世沧桑之后，再来重读这即使掩没在历史的尘埃中也依然熠熠闪光的文字，怎能不令人感慨万端！正在总结与反思20世纪历史的我们，惊喜地发现：这发生在世纪中叶1957年的当事人所说的“社会主义思想意识的改造运动”，与世纪初（1919年开始）的五四新文化

运动，以及世纪末（1978 年开始）的思想解放运动，从语言到思想，竟是那样的相似!

或许这只是外在的印象，不足为论；那么，我们就再进一步，来比较、分析下面这些论述吧。

△“我们的制度不健全，民主权利不够，这都是产生三害（按：中共中央当时发动整风运动，以反对党内的官僚主义、宗派主义与主观主义，群众概称“三害”）的根源”；“目前除三害都停留在表面上，似乎把三害的根源只归结到领导者的思想意识，并没有追究三害的社会根源，我认为这是不对的。……三害的社会根源是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和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的原因：一，法制问题，宪法的人民权利尚未得到绝对保证。二，领导与群众的关系问题：由于尖锐阶级斗争而形成权力高度集中使领导与群众绝不是真正的被监督与监督的关系，而是绝对服从的关系。……三，言论自由问题。……在反动帽子满天飞的时候，在政治的压力下，更可怕的是在‘对领导不满，便是反党’的舆论下，任何反面意见都遭到毁灭性的围攻，任何片言只语都可以列入肃反材料，将来有无穷后患，在这种情况下，真正民主是不存在的”。

△“主要要从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健全社会主义法制来根除三害”，“严密健全的民主法制，大公无私的人事待遇制度，健康活泼的民主生活的习惯性气氛，……是最强大的现代化武器”。

△“我们有一个社会主义工业化，还应有个社会主义民主化”。

△“如果有人问，你们标榜的是那一种心，我们答：是从‘五一九’开始的（按：1957 年 5 月 19 日，北大部分学生自发贴出要求民主的大字报，当时就称为‘五一九民主运动’），在民主广场自由讲台上出现的，正在继续形成与发展的这样一种民主，不是硬搬苏联的形式，更不是贩卖西欧的形式，而是在今天中国的社会主义土壤中土生土长的民主制度，我们要把它巩固下来，并逐步推广到全国范围中去，这就是我们的要求，我们的目的”。

△“我们最感兴趣的问题是如何保证公有制名副其实，就是说公有了以后，如何正确的分配。我们反对绝对平均主义，但目前问题不在于此，而是不合理的悬殊的差别。这样纵然占有公有，但实际上在分配的过程中，无形中一部分占有了另一部分的劳动”，“（由于特权的存在）在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已出现一定矛盾，现在还不甚尖锐，叫内部矛盾也未尝不可。但必须指出来，如果管理、分配、社会地位等问题不得到更好的完善，矛盾可以向前发展，而且基本上满足‘阶级’关系的定义”。

▲“我们过去发生的许多错误，固然与某些领导人的思想、作风有关，但是组织制度、工作制度方面的问题更重要。……斯大林严重破坏社会主义法制，毛泽东同志就说过，这样的事件在英、法、美这样的西方国家不可能发生。他虽然认识到这一点，但是由于没有在实际上解决领导制度问题以及其他一些原因，仍然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这个教训是极其深刻的。……如果不坚决改革现行制度中的弊端，过去出现过的一些严重问题今后就有可能重新出现”。

▲“解放后我们没有自觉地、系统地建立保障人民民主权利的各项制度，法制很不完备，也很不受重视，特权现象有时受到限制、批评和打击，有时又重新滋长”，“不少地方和单位，都有家长式的人物，他们的权利不受限制，别人都要唯命是从，甚至形成对他们的人身依附关系”，“也还有些干部，不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公仆，而把自己看作是人民的主人”。

▲“权力过分集中的现象，就是在加强党的一元化领导的口号下，不适当地、不加分析地把一切权力集中于党委，党委的权力又集中于几个书记，特别是集中于第一书记，……党的一元化领导往往变成了个人领导”，“党成为全国的执政党，特别是在生产资料私有制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权力过分集中，越来越不适应社会主义事业的发展。对这问题长期没有足够的认识，成为发生‘文化大革命’的一个重要原因，使我们付出了沉重的代

价。现在再也不能不解决了。”

以上凡标以“△”的，都抄引自《言论汇集》，作者分别是徐克学（数学系学生，岑超南（物理系学生）、张景中（数学系学生）、庞卓恒（系别不明）、龙英华（哲学系学生）、陈爱文、江文（中文系学生）、钱如平（数学系学生）；标以“▲”的，则摘自人所熟知的《邓小平文选》中《党和国家领导制度的改革》一文。今天人们不难发现，1957年青年学生议论与1980年党的领导人对历史经验的总结，或有不同之处，但一些重要的观点，例如，社会主义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与“制度的弊端”有关，必须进行制度改革；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反对领导与群众关系中的不平等；主张扩大社会主义民主，加强社会主义法制，这些认识都是一致或相似的。但正是这些基本观点，在1957年是被视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言论的，所有的作者都受到了严厉的惩罚；而80年代以后却成为了中国的改革的指导思想，像“民主”与“法制”这类概念差不多都成了人们的口头禅——当然，这还存在着是否认真实行的问题，但至少再也没有人斥之以“反动”了。

这反映了时代的进步，但这事实本身却是应该好好想一想的。

1957年是什么时候？正是我们所引述的邓小平的文章中所说的，“生产资料的社会主义改造完成以后，党的中心任务已经不同于过去，社会主义建设的任务极为繁重复杂”，在这样一个历史的转折关头，这些年轻人提出了反对权力过分集中，反对特权等问题，要求民主与法制，应该说是及时的，表现了可贵的敏感与先见；但也正如前引的他们自己在大字报中所说，尽管“制度上的弊端”已经引发出了各种矛盾，但“现在还不甚尖锐”，还有一个发展的过程，因而更不容易为大多数人所察觉与认识，于是，尽管警告已经发出，国人依然处于盲目与盲从的不觉悟状态。这样，这些忧国忧民的“广场”上的年轻人陷入鲁迅笔下的夏瑜那样的命运，几乎是不可避免的。他们必然为自己思想的“超前”而付出血的代价。

但对先觉者的远见卓识的拒绝，更不用说运用权力对之进行“反击”与镇压，也是要付出代价的。这就是邓小平在他的文章中所一再谈到的，由于不承认集权、特权等问题的存在，拒绝扩大民主与实行法制，进而将现行制度中的弊端推到极端，终于“导致了‘文化大革命’的十年浩劫”。在这个意义上，有些研究者认为，1957年的“反右派”打开了“通向‘文化大革命’的道路”（见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这是符合实际有道理的。历史确实捉弄人：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彻底性”，相当多的“右派”的批判者落入了被批判者同样的命运，人们用他们当年批判“右派”同样的（或更为极端）的语言与逻辑批判他们，在自身陷入了同样的绝境以后，才逼出了最后的觉悟。——自然，也有始终不觉悟的，在恢复了原有的地位以后，又重新使用起与权力结合在一起的原有的思想、逻辑与语言。但毕竟还是出现了这样的历史现象：先驱者的思想终于在某种程度上被他的批判者所接受，并且在批判者手中得到或一程度的实现——当然，批判者是在自己的利益驱动下去实现的，这已与先驱者无关，而且先驱者的历史污名也未必因此而得到洗刷，更不用说他们应有的历史地位的恢复与确认，不继续“整”他们就已经够“人道”的了。在大多数人的眼里，甚至在后代人的心目中，他们依然是“有罪（至少是曾经有罪）之人”。——这样的结局，无论对先驱者自身，还是当年的批判者、后来的遗嘱执行人，都是无情而无奈的。

面对这种无情与无奈，我们所能做的，仅是指明这样一个事实与这样一种历史联系：1957年“广场”上的思考和呐喊，正是80年代中国思想解放运动的先声；举世瞩目的中国的改革的思想基石，正是这样一些中国民间的年轻的先驱者以“非法”的形式，用自己的生命与鲜血奠定的。而在他们之后，也还有新的牺牲。——但愿在这世纪末的狂欢、表演中，至少还有人能够保留一点清醒的历史记忆。

关于这些1957年的北大学子，似乎要说的话还很多。

人们，甚至是历史学者，在谈论与研究1957年的“风波”时，往往注目于那些“右派”头面人

物，特别是政治上的风云人物，这大概也是一种思维的惯性吧。其实如果仔细研究当时的种种“右派”言论，就不难发现，那些“右派”政治家所关注的主要是政治权力的分配——这当然也关系着他们自己的政治理想的实现，并非完全为了私利，因而自有其意义，需要另作讨论。但更多地体现这场风波在思想、文化上的深度与意义的，恐怕还是被称为“右派学生”(也包括一些“右派”教师、知识分子)的思考。这是一些尚未涉世的青年，因此他们的探索的热情，并非源自利益的驱动，而纯是(或基本上是)出于对“真理”的追求——前引《广场》“发刊词”就宣称他们是“为真理”而“毫无顾虑地发言”的。因此，他们的思考，除了前文已略作分析的现实社会、政治、经济问题之外，还包含了更为广泛、更深层次的思想、文化问题——政治学的，经济学的，法学的，伦理学的，心理学的，哲学的，等等，出现了一批着重于理论探索的长篇论文，以及诸如《自由主义者宣言》、《利己主义者宣言》这样有关世界观与基本立场选择的宣言书。今天看来，这些讨论自然是粗疏的，但确实又是反映了时代的思考水平的。——顺便说一句，这一时期，专门从事理论研究、创造的那些知识分子，除个别人之外，大都表现出惊人的“理论上的沉默”：即使是仍然保有独立思考品格的，关注的也限于现实的政治、社会问题，而鲜有理论的探讨；更不用说为现行权力政治作理论阐释与辩护的。这就迫使这些尚处于准备阶段的青年学生远非成熟的理论“习作”，充任这个时代理论水准的代表，这实在是中国思想理论界的悲哀，中国知识分子的失职。——不过，这已是题外话。

我们还是拉回来说。或许是受着五四传统的影响，这些北京大学的学子们在观察与思考中国的问题时，除了前所分析的社会制度方面的弊端之外，更关注这种制度的受动者——中国国民的反应。如前文所引，他们把“社会主义民主遭到压制”与“党团员的盲从成风”看作互相关联的“三害”的社会根源。另一位学生的文章就说得更加尖锐，他指出，“任何时代，权力的高度集中，都是极大的危险”，而“当人民群众被麻痹被愚昧，就更加百倍的危险”，因为一旦权力的集中者“犯有严重错误或变质，就没有任何力量足以克服它！”(王书瑶：《从斯大林的错误中应得的教训》)对群众不觉悟状态的这种焦虑，显然是五四“改造国民性”思想的继续，这些“广场”上的北大学生把他们发动的这场思想运动称之为“启蒙运动”，大概就已经自觉地意识到他们与五四时期发动新文化运动的前辈之间的血肉联系。可以说，他们所要揭露、批判的，正是在新的历史条件下新的国民性的弊病。共和国的敏感的年轻人在考察自己时代的国民精神状态时，同样面对着“人”的奴化与自我的丧失。他们这样论述着自己的痛苦的发现：共和国初期在中国共产党及其领袖领导下所取得的辉煌成就，“中国（所发生的）巨大变化”，使人们“陶醉”，由“陶醉”进而产生“迷信”(气三一群学生：《现实的社会主义并非世外桃园》)以至形成了对“党，国家，领袖”的“崇拜”与“宗教式信仰”(参见王书瑶前文，朱庆圻：《领导的艺术》)，制造出了种种“神话”，仿佛“党，国家，领袖”具有天然的、绝对的正确性、真理性，“过去是正确的，现在是正确的，将来也就永远正确”，“在任何情况下都是正确的”，并且这种“正确性，真理性”是唯一的，“垄断”的，只要是“不同意见”，“就一定是错误的”，是“不能允许存在”的(参看蒋兴仁：《宗派主义的鼻祖，官僚主义的根基》，谭天荣：《又一株毒草》)。而在实际的操作过程中，这种抽象的“党，国家”的绝对真理性，正确性，就变成了具体的上级领导，以至个人的绝对正确，于是，“神话”就变成了“上级的一切指示都视为圣经”(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在这样的绝对理念支配下，人们所能做的唯一选择只能是“跟着走就万事大吉”(前引王书瑶文)，这种“无条件的绝对服从”不仅是“盲从”，更导致了人的工具化与奴化———一位青年诗人这样自责：“这根无形的铁链没有丝毫的强力；然而，扪心自问，在过去，我们曾多少次说出了违心的话，做了它驯服的奴隶。”(杜嘉蓁：《组织性与良心》)而尤其让这些觉醒了的年轻人感到痛心的是，这样的“形而上学思维方式。”一旦成为定势，就形成了“习惯的机械势力”(谭天荣：《教条主义产生的历史必然性》、《我们为了什么》)：

"只要不同意领导就是思想有问题，或者可能是反党"(岑超南:《再论"铲草除根"和"党团员想一想"》"喜欢思考"或"不按照规定的方式思考"，就是"落后分子"，"听说是反对分子就不分皂白地群起而攻之，就这样不自觉地，机械地，反射式地，每日每时地伤害着别人与自己"(谭天荣:《第三株毒草》)"一旦有人提出新的问题，没把问题弄清楚就盲目地加以反对"(刘奇弟:《论当前的整风——民主运动》)，以至"造成了对一切不懂的东西的无条件的仇恨"(谭天荣:《救救心灵》)。正像鲁迅当年面对着"无物之阵"一样，今天新中国有思想的年轻人又为这样的"习惯的机械势力"所包围，欲挣扎而不能，陷入了无以摆脱的困境。正是在这"习惯的机械势力"的支持与拥戴下，对"不合人们胃口的思想施予暴力"，竟成了共和国精神生活中的常规(谭天荣:《我们为了什么》)，这样的实现在欢呼声中的"群众专政"(这只是共和国的一个专有名词)，是真正令人恐惧的。当人们欢天喜地地将自己的有头脑的兄弟姐妹送上审判台时，他(她)们自己的心灵也受到了扭曲与损伤，"造成了不堪忍受的知识的贫乏，思想空虚和意志薄弱，造成了习以为常的言行不符和自欺欺人，造成猜疑冷酷和互相残害"——面对这样的新的国民性的弱点，一位"右派"学生领袖这样写道:"我看到了这一切，希望改变这一切，而又被那些诚实的人所反对，这件事对于我，更大的痛苦是不可想象的"(谭天荣:《救救心灵》)。这发自内心的深沉的悲叹，使人不能不想起当年同样是"哀其不幸，怒其不争"的鲁迅。

于是，与1918年"救救孩子"的呐喊相呼应，1957年的中国又响起了"救救心灵"的呼唤。而人们首先要争取的，就是人所应有、独有的精神的自由，独立思考的权利，他们庄严宣告:"世界上没有什么不允许怀疑的问题"，"任何人都有探讨一切问题并坚持自己见解的权利"(刘绩生:《我要问、问、问???……》)，"我们要思考，除了我们自己谁又能禁止我们思考?不让想吗?偏要想，……我们要走自己的路!"(谭天荣:《又一株毒草》)同一篇文章还引用马克思主义的经典论述，宣布我们:不承认任何种类外界的权威。宗教、自然观、社会、国家制度——一切都受到最无情的批判，一切都要站到理性的审判台面前，或者开始证明其存在的理由，或者放弃其存在的权利。思维和理性成了测定一切现存事物唯一的尺度"。这样的引述，自然有策略的考虑，借此使自己的主张具有某种合法性。但确也表明，这些自称"强壮而又心怀恶意的小家伙"，比起他们的批判者，那些自命的"卫道者"，是更懂得、并且真正把握了马克思主义的彻底批判精神的(谭天荣:《一株毒草》)。他们因此而不愧为五四新文化运动与北大精神的真正传人。可以说，他们所发动的，是继五四以后又一次"新文化运动"——在一个高度集权的社会主义国家里，争取思想的自由，精神的解放，进行新一轮的"国民性的改造"。

如果说五四新文化运动胜利了，从而开启了中国思想文化，以至整个民族现代化的历史新纪元，那么1957年这一次悲壮的努力，却是以所有参加者的"一网打尽"而宣告失败，但他们的思想与精神却事实上在80年代以来的思想解放运动与改革运动中得到延伸，尽管后者未必完全自觉意识与承认这一点。更为重要的是，他们当年所提出的问题与任务，仍然是今天的中国的改革者需要继续解决与完成的，他们当年的思考今天仍然保持着新鲜的生命活力，他们思考的成果，以及思考过程中可能有的不足与失误，对于后来者，都是极其宝贵的启示，遗忘、不承认、漠视、拒绝这份浸透着鲜血的思想遗产，不仅愚蠢，而且有罪。——其实，那些"广场"上的牺牲者在光荣地倒下的那一刻是曾经预言过"明天将属于我们"的(谭天荣:《给沈泽宜》)，他们毫不怀疑:"'五一九'和'五四'(一样)将显明地留在我们弟弟妹妹脑海里，永远鼓舞着后来的年轻人"(谭天荣:《救救心灵》)，他们甚至直接呼唤:"历史学家们，重视这些伟大深刻的社会思想变革吧!"总结历史经验，作为现代政治史、思想文化史、知识分子心灵史……的重要组成部分，为正在进行的"中国人与社会的改造"提供思想资源。——现在"是时候了"!

(责任编辑:洛　松)

包拯千年诞辰纪念存疑

● 李 邨

包拯是我国北宋时期的名臣。今年是他诞生一千周年。包拯来到世上一千年，却被人们颂扬了九百六十年，而且今后还会被人们永远颂扬下去。今天我们纪念包拯，不论史学界法学界还是文学、社会科学界，都不能无视或者小视这一社会历史现象。不仅中国人需要他喜欢他歌颂他，海外也有不少人研究他歌颂他。他是中国漫长封建社会里少有的清官，对于贪官污吏他是可怕的形象。而对于小民百姓，他则是黑暗中的一轮太阳。在包公身上，既体现出清正廉洁、刚直不阿、铁面无私、执法如山、体恤民情等优秀品格和高尚情操，也反映了人民群众的政治理想与愿望。包拯精神体现了中华民族的优秀文化传统和价值取向，也凝聚着普通民众对官场腐败的憎恶，对清廉政治和向往，虽然这种向往还是比较幼稚的，但是，他的优秀品格和法治精神，是值得今人认真效法、继承和发扬。

然而，世间的一切事物都不会完全顺从人意，人站在不同的角度亦会得出不同结论，这是毫无办法的事。你看，当包拯千年诞辰之际，国人正准备隆重纪念这位历史伟人的时候，却有人大声说“不”，并且摆出一大套冠冕堂皇的理由来吓人，于是准备了多时的纪念活动统统被取消；当学术界的上百位专家、教授、学者齐集一堂，从不同侧面论述包公精神以及清官文化的正负面影响的时候，又有人下令不要宣传，并说即使宣传“也要低调处理”，结果使一个全国性的学术会议竟然在当地的党报上占不了一席之地。与会者奇怪，不知什么样的“新闻”才是新闻！笔者孤陋而又愚钝，于是便将胸中的诸多存疑和盘托出，以就教于各位专家大师。

存疑之一：包拯是普通的封建官吏，还是对国家、社会进步有重大贡献的好官？

按有些人阶级论观点，包拯的所作所为，都是为了维护皇权、巩固北宋王朝的黑暗统治；而且他的精神和做法“在一定程度上起到麻醉（人民的）作用”。而历史的、客观的、辩证的观点则认为，包拯在那个时代能够厉志改革，并身体力行，对国家和人民都做出了不可磨灭的励史功绩。例如，他力主改革旧政，反对北宋王朝的腐败与“三冗”，主张裁减冗吏、冗兵，历行节约；他忠心辅国，体恤民情，在制定政策时，要“于国有利，于民无害”，主张“薄赋税，宽力役，救荒饥”，他要求皇帝“大缓吾民，以安天下”。在皇权专制和人治社会环境中，他力倡法制，“臣闻法令在，人主之大柄，而国家治乱安危之系焉，不可不慎”。又说“法存划一，国有常格”，“朝廷凡处置事宜，申明制度，不可不慎重”，“于赏罚无所私，尤不以贵近废法”，并且强调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王子犯法”，与庶民同罪”。对于官场腐败他进行深刻的揭露与批判，并提出一系列改革意见。再加上他的廉洁奉公的

品格和刚直不阿、执法如山的精神，终于使他成为一位彪炳千秋、光照日月的历史名臣。

当然，包拯生活于那个时代，也是时代造就了他。他多次直面批评仁宗皇帝，仁宗不仅容忍还采纳了他的许多建议，这说明仁宗还是比较开明而且支持改革的，不然也就不会涌现像王安石、范仲淹等一大批改革家，也就不会有包拯。包拯极其卓越地完成了时代赋予他的历史使命，人们不应超时代地苛求他去做不能做的事。那就太幼稚了。如果今天有人说，你包青天为什么一个人包打天下、不去唤起民众的自我意识，不去砸烂那个黑暗的皇权制度？那不是太可笑了吗？遗憾的是，就是有人这样想这样说，而且为数不少。

存疑之二：包拯主张人治，还是倡导法治？

先让我们看看包拯是怎么说，又是怎样做的，然后再下结论。

关于封建时代的法治思想，包拯有许多精辟的论述，他认为法治乃“治道之要，无大于此”。“法令既行，纪律自正。则无不治之国，无不化之民”。他的立法主张是：德主刑辅、法简刑轻，利国便民、经久可行，适时更法、不可数易，博采众议、不要独尊；在执法实践中，他也有不少令人钦佩的成就。其一曰观察入微。他担任天长知县时，有农民报告他的牛舌被人盗割，没留下任何线索；他不动声色令其回家杀牛卖肉，不久有人来告那人私杀耕牛。包拯当即审问告发者：你为什么割人牛舌又告人杀牛？来人惊以为神，于是承认与牛主有隙，欲以此陷害。一桩无头公案，就这样轻而易举地被他利用私杀耕牛犯法和心理学推理侦破了。其二曰铁面无私。据史料记载：包拯性格峭直刚毅，“与人不苟合，不伪辞色悦人。平居无私书，故人亲党皆绝之”。当时，官场的风气很坏，案例经常不通过正常渠道，不按正规程序处理，而是拉关系托人情走后门，谓之“通关节”。包拯厌恶那一套，老百姓中流行一句谚语：“关节不到，有阎罗老包”。他秉公执法，不循私情。他知庐州时，“新朋多乘势扰官府。有从舅犯法，希仁挞之”。就是舅舅也不能免，因而胡作非为的达官贵人都很怕他。其三曰开门办案。当时，封建的等级观念森严，官民不仅不能平等对话，而且连状纸也无法直接送到审判官的手里。“凡诉讼不得经造庭下”，老百姓呈递状纸要先通过府吏，得到允许后才能来到庭下，跪在离官员很远的地下申诉。包拯认为这种规定，既容易造成府吏敲诈作弊的机会，又不利于审判官直接了解案情，于是下命撤销，让衙门大开，告状人可以直接到庭前陈述曲直。他这样做的结果，不仅可以直接听取诉讼双方的申诉，明辩是非，有利于对案情判断处理，而且缩小了官民间的距离，解决了老百姓见官难的问题。在维护特权的封建社会里，这是个了不起的司法改革！这个改革不仅仅是司法程序上的，也是思想观念上的，而他这一改革的动力，正是他爱民恤民的民本思想。

试比较一下，包拯的法治理论与近现代的法治思想，他的执法实践与近现代的审判做法，有没有某种联系或相近相似之处呢？应当承认是有的。例如，法治的核心是依法办事，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包拯敢于惩办那些违法的权贵显要，就说明他在努力实践着法治，一生都在依法办事。虽然他和以他为代表的改革者不能从根本上改革封建特权人治的社会本质（真正动摇了皇权，皇帝也不会同意），但包拯的法治思想和实践，也不失为历史上一次有益的尝试。虽然有些尝试还很不成熟，但也无损包拯法治思想以及他清正廉洁、刚直不阿、铁面无私、关心民疾的高尚品德的光辉。

包公是位十分难得的清官。千百年来，当人们遭遇悲惨又无处伸冤时，往往把自己命运托付给包公以及像包公那样的清官，这些清官就是民众心上的“青天”、“救世主”。而民众的带有浓厚人治色彩的政治理想，是残暴统治长期压迫的结果，并不是包拯的错。人民群众的美好愿望也是没错的。

存疑之三：有人说，宣传包公容易让人产生联想和对比，会说我们共产党干部不如包公。

这是一种“吃不到葡萄就说酸”的阴暗心态。被先进思想武装起来的共产党人，从来不拒绝人类的任何优秀遗产(包括思想文化遗产)，也不拒绝资本主义的先进东西。只有落后者才怕先进，黑暗才怕阳光，腐败分子才怕包公。

老百姓喜爱包公，他们从他身上能看到爱和恨，理想和愿望，从而实现他们在现实生活中不能实现的愿望。

焦裕禄、孔繁森等一大批党的领导干部，也喜爱包公，他们从他身上学到许多优秀的思想品德和敬业精神，这些品德和精神正是我们的民主法制建设中不可缺少的呀!

例如包公的清正廉洁。他在端州任知州，那里生产一种名贵的砚台，前任很多知州都借进贡之名，加倍勒索，弄得民不聊生，怨声载道。包公则不然，除定额一块也不多取，一块也不多送，离任时，一砚也不带，留下了“岁满不持一砚归”的美誉。这与“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官场腐败，形成何等鲜明的对比。

例如他的不循私情、执法如山。从舅犯法，包拯照样依法打他鞭子；他还提倡开门办案。这在“一人得道，鸡犬升天”、“衙门朝南开，有理无钱莫进去”的封建社会里，又是何等不易!

再如他刚直不阿、不畏权贵。他任台谏官时，恪尽职守，弹劾了一大批权臣显要，其中包括转运使王逵，当朝宰相宋痒，仁宗宠妃的叔父张尧佐等。尤其难能可贵的是，面对仁宗皇帝他也能不顾个人的荣辱安危犯颜直谏，当着文武大臣的面，包拯简直就是指骂皇帝：“臣等累次论列，陛下欲务保全，仍曲假宠荣，并领要职，求之前代则无例，访以人情则不安。”他甚至“音吐愤慨，唾溅帝面而帝卒为罢之”。包拯的这种精神真可称得上震古铄今了!

包拯精神，经过后世的不断加工塑造，“已升华为超越时空的理性精神，公理正义的象征，美好社会人格的寄托。”也可以说，包拯精神已经成为推动社会进步和文明发展的重要精神力量。

宣传包拯精神既是对各级干部提供学习的道德参照，也是对腐败分子的思想鞭笞。试问，这有什么不妥呢?

(责任编辑:致　中)

全国第一家大型科技文化月刊

科技潮

以全新风貌

迎来新世纪

邮发代号:82－404

大16开,160页,铜版纸彩色精印

每期定价:16元 全年定价:192元 国外定价:16美元

科技潮杂志社 地址:北京市西城区锦什坊街265号

邮编:100032 电话:(010)66011194、66011193

· 高科技产业化的权威报道
· 科技与经济发展的全面展示
· 科技与文结结合的多彩阵地
· 信息服务与咨询的特别桥梁

谈 韬 晦

● 官伟勋

“收敛锋芒，隐藏才能行迹。”——《辞海》对韬晦的解释。

“切当韬晦，勿露圭角。”——《宋稗类钞》载杜正贤告戒门生的话。

《淮南子·缪称训》提醒人们：“铎以声自毁，膏烛以明自铄，虎豹之文来射，猿猱之捷来猎，故子路以勇死，苌宏以智困。能以智知，而未能以智不知也。”显赫的名声、聪明、漂亮、敏捷，都会招来灾难；勇敢、智慧也不妙，勇敢会导致死亡，智慧能引来杀身之祸。

谚云：“树大招风风撼树，人为高名名丧人。”正所谓：“木秀于林，风必摧之；堆出于岸，流必湍之；行高于人，众必非之。”亦即人们长说的：“枪打出头鸟”，“出头的椽子先烂”者也。

不求锐利，求圆滑；不求名声，求无闻；不求以智知，求以智表现为不知；不求有用，求无用——这就是通常所说的韬晦。

因韬晦的目的不同而有不同的韬晦。有的以韬晦为手段，用以追求荣华富贵、权力地位；有的以韬晦迷惑麻痹敌人，克敌制胜终成大业；有的则以韬晦为全身养命之道——概叹那“千古是非心”，不过是“一夕渔樵话”；沉心于“一生几见月当头”、“万事不如杯在手”；欣赏那“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的悠闲；追求那“无丝竹之乱耳，无案牍之劳形”的清静高雅——安于“无咎无誉”地了其一生。

《周易》“坤”卦是个专讲以韬晦求仕进固权位的卦

《周易》之八卦，相传是伏羲画的，并传说是文王作的卦辞，周公作的爻辞。冯友兰先生认为这些传说都缺乏根据，不可信。但《春秋左传》中的人物对话，的确已屡屡引用《周易》中的卦辞作为格言警句了，这至少可以说明，《周易》早在《春秋左传》成书之前，就已存在并已被人们奉为经典了。由此可见《周易》对我华夏民族意识形态影响之深之远。

《周易》“坤”卦，是个专门告诉人们怎么做官，怎样才能保住官位的卦。该卦卦辞开宗明义就说：“元亨利牝马之贞。君子有攸往，先迷后得主，利西南得朋，东北丧朋，安贞吉。”《周易全解》等专著，对这些天书般佶屈聱牙的卦辞作过通俗注解。

“元亨利贞”四个字，本来是用来提纲挈领概括“乾”卦的，是天行健、永恒不息的意思。现在用来作“坤”的卦辞，中间却增加了“牝马”这个字眼，而这正是“坤”卦的“灵魂”之所在。这就是说，“坤”的地位，就是牝马的地位，牝马必须受牡马（乾）的约束，顺从牡马的管辖。牡马，也就是公马，而公马注定是刚健自强的；牝马，也就是母马，则注定应是柔弱顺从的。“先迷后得主”，就是当“坤”与“乾”相处时，绝对不可以抢先，抢先越位就会迷失方向，就会失去主子的信赖，就危险！一定要时时注意

跟在“乾”的后面，顺从“乾”的意志，就会得到主子的信任，就吉祥；《易》认为，“西南”为阴，“东北”为阳。阴即“坤”，阳即“乾”。交朋友的时候，要跟那些像自己一样顺从“乾”的人(“西南”方面的人)交往，不要跟那些与“乾”争统治地位的人(“东北”方面的人)交朋友。这样，就会吉祥。反之，与反对“乾”的人接触交往，就要大难临头了！

按“坤”卦原则行事，正是历代若干著名宰相的共同特点。他们之所以能久居高位而不败，与他们自觉不自觉地严格地实践了“坤”卦的各项行为准则与处世原则，有很大关系。这种宰相，遇上所谓明君，他可以风助火势，把事业经营得更加红红火火。遇上昏君，这种人一般不会干那种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勾当，并可能力求把灾难减小到最低限度，但他却不可能采取孟子所说的：“民为贵，社稷次之，君为轻”、“君有大过则谏，谏之不听则易位”、“闻诛一夫纣矣，未闻弑君也”等反映着民本思想的认识与主张，断然改变“乾”的主宰地位。因为这种人在“乾”与“坤”、君与臣的关系上，是绝对不敢、也不肯越雷池一步，突破以“乾”为先为尊这一原则的。对于这种严格按“坤”卦行为准则行事的人，与其说他完全是出于个人利害得失的考虑，不如说他更多的是出于其根深蒂固的传统信念。

“坤”卦有关韬晦的阐述，熏陶培养了一代又一代的政治家，他们对政局和社会的稳定，发挥了极其关键的作用。但同时也由于在那“朕即国家，国家即朕”的时代，这种人所忠于的，主要是君主个人，而不是国家人民，因而他们的所作所为，对于人们追求革新追求体制变革的意愿，有意无意地起了遏制或削弱的作用。

“坤”卦所概括的是一部地地道道的专制时代的做官学。影响是广泛深远的，以致在后专制时代，我们仍能感到它的顽强生命力。稍稍留心观察一下就不难发现，学历相同、能力差不多、又同时参加工作的人，大凡自觉不自觉能像“坤”卦说的那样行事的人，一般“发展”都比较顺利，甚至能青云直上；反之就不那么容易“进步”了。如果再有些“恃才傲上”，动不动跟“乾”对着干的“毛病”，不要说“进步”，碰上五十年代那种政治气候，十有八九还会“弄个右派当当”！

例外也是有的。若能有幸遇上一位真正能事事以人民利益为重的好领导的话。但这种机会不多，正如人们常说的：千里马常有，伯乐不常有。

狐之图雉，必先卑身弥耳——韬晦的另一特殊功能

还有一种韬晦。

石勒（274－333），“五胡十六国”时代后赵国的建立者，上党武乡人，羯族，是当时众多少数部族英雄人物中一个十分杰出的领袖人物。

石勒早期的势力范围，已经活动到如今的晋、陕、豫、鲁等部分地区。但当时在整个河北地区还有一个庞然大物，这就是被西晋王朝正式封为博陵公、侍中、大司马、并早已在处心积虑篡晋之位，朝思暮想当皇帝的王浚。王浚见石勒的实力一天一天强大起来，一直有降伏或消灭石勒之心。石勒自然也把王浚视为发展道路上的绊脚石，想搬掉他。

石勒要下手之前，需先了解王浚的实力。便决定派一个心腹带上信，以问候为名，去实地观察一下。这封信怎么写？石勒的谋士们展开了一番议论。有的强调高屋建瓴给以威慑；有的强调应以对等地位，不能比他矮了。谋士张宾却说：“王浚名义上是晋国的大臣，实际上早就想篡位自立，但怕四海英雄不跟着他干，所以还没敢动手。他现在之急于想得到将军您的归顺，就像当年项羽之急于想得到韩信一样。将军如今威振天下，您卑辞厚礼折节奉戴他，还怕他信不过呢！若再跟他分庭抗礼怎么行吗？大凡要谋取一个人，而又让人家发觉，是很难成功的！”

石勒是个十分聪明的人，立即领会了张宾的意思，说：“好！”当即按张宾的思路写了封信，信中说：“勒本小胡，遭饥乱，流离屯厄，窜命冀州，窃

相保聚以救性命。今晋祚沦夷，中原无主，殿下州乡贵望，四海所宗，为帝王者，非公复谁?”他劝王浚赶快“应天顺人”，宣布当皇帝，说他把王浚看作“天地父母”，请王浚把他看作亲儿子。同时还送去大量的珍宝，重赂收买王浚身边的重臣。

王浚相信了，派人下书表扬了石勒，并送给石勒一把麈尾。石勒表示不敢用，恭恭敬敬地把这一麈尾用香案供起来，每天早晨一次晚上一次，对着麈尾顶礼膜拜以表忠心。自称看见麈尾就像看见王公一样。当王浚那边来人时，石勒还故意选些老弱残疾站岗放哨，用以表示自己部队的战斗力多么不堪一击。王浚听了石勒对自己种种无限忠诚无限崇拜的表现，以及其军力薄弱情况，完全信以为真了，丝毫不再警惕了。后来，有人报告石勒在加紧练兵，他不信；有人报告石勒要出兵了，他不信；石勒的大兵过了河，杀了王浚派去的人，他还不信；兵临城下了，他还不信，硬说是来拥戴他做皇帝的。直到石勒俘虏了他和他太太，抱着他太太审问他侮辱他，要杀他了，他才信了。

越王勾践被吴王夫差打败后，甘当吴王的奴隶，回国后，卧薪尝胆、身自耕作、食不加肉、衣不重采，卑躬屈膝侍奉吴国，十年生聚十年教训，终于灭吴称霸，用的自然也是“鸷鸟之击也，必匿其形”的韬晦策略。

最典型的韬晦——庄子不求有用求无用的消极避世哲学

如果说，《周易》“坤”卦中所讲的韬晦，是教给人们的以退为进、以柔克刚、以消极的形式隐藏着积极内涵的话，庄子所教给人们的韬晦，就完全是另一回事了。

《庄子·山木》篇有这样一段话：庄子在大山中行走，看见一棵大树，枝叶茂盛，伐木者走到这棵大树旁，却没伐它。有人问，为什么不伐这棵大树呢？回答说，这棵树的木料没有用处。庄子因此得出一个结论：“此木以不材得终其天年夫！”

啊！有用的被杀了，没用的反而活了下来。他通过一棵树，对人生概括出一个“无用”才能终其天年的结论!

在《庄子·人间世》里，庄子对这一思想，有着更具体地描绘：

匠石来到齐国，抵达曲辕，见到一棵栎社树，树冠大到可以遮蔽几千头牛，树干有一百多尺粗，树梢跟山一般高，光溜溜的树干好几丈以上才长树枝，能挖做独木舟的树枝就有十几根。来观赏的人群像赶集一样，可是，匠石走到树下，看都不看一眼就走过去了。他的徒弟却站在树下看了个够。然后追上师父说：“自从我拿上斧头跟夫子学手艺，还从来没见过这么大的树呢，夫子您怎么看都不看一眼就走了?匠石说：“算了，别提了。那是没用的散木。用它做船会沉，用它做棺材会烂，用它做器具很快会裂，用它做门户不久就会流污浆，用它做房柱易被虫蛀，这是不材之木。它为什么能有这么长久的寿命？就因为它没有一点用处！”

庄子此文的用意是显而易见的，正如他借梦中栎社树反驳匠石的话所说的：“你想拿我跟那些所谓的有用之木相比吗？瞧那些楂梨橘柚瓜果之类，果实熟了就遭剥落、扭打，大枝断，小枝落。这岂不是它们自己要显露才华才招来的灾难吗？它们一个个正是因为想显示他们的能力，才不能享尽天年而夭折，他们怎能跟我比呢?”

千百年来这种以韬晦为目的，避世绝俗与世无争的人生态度，深深影响着一代又一代的士子，它不仅不被看作一种腐蚀剂，反而被认为是一种超脱于名缰利锁的高雅情操。它使历朝历代不知多少本可以大有作为才智之士，虽说也避开了倾轧刑杀甚或牵连九族的灭顶之灾，但同时也使自己像深山老林中的草木一样默默无闻，自生自灭地了其一生!

这是众多士子的悲剧，更是我整个民族的悲剧。

这门最具中国特色的韬晦学，将伴随我们多久?

《周易》“坤”卦所提供的

做官学，不是什么人主观凭空杜撰出来的，它是当时经济基础与政治体制的产物。

一家一户自给自足的小农经济，是一种既脆弱又顽强的经济。为了保证这一小小的生产单位，春播夏长秋收冬藏能得以正常运转，以及维持男耕女织、老有所养、幼有所长和劳动力再生产的需要，最重要的就是安定，就是保证适应这种一家一户生产生活的道德观念和政治体制的稳定性延续性。“父母在不远游，游必有方”，游远了，正常的生产生活就得不到保障。农业生产方式几千年不变，谁年龄大，谁的经验就多，就是权威。在这种生产条件下，不存在知识更新与知识爆炸的客观需要与压力。这是形成家长制以及重老不重幼、重旧不重新等保守观念的最根本的原因。“坤”卦所说的行为准则，为保持“君君、臣臣、父父、子子”的封建专制等级原则所必需。也就是说，只有君像个君的样子，臣像个臣的样子——所有处在“坤”位的人，心甘情愿地遵守为臣、为子、为妾的本分，封建专制政体才能巩固，才能顺利运转，天下才能太平。

封建专制政体早已灭亡了。但其意识形态作为一种习惯势力，还将影响我们相当长一个时期。只有包括多种经济成分的现代经济发展到一定程度，它才会逐步消亡。

只要不可调和的阶级与阶级、国家与国家之间的斗争还存在，“卑身弥耳”“鸷鸟匿形”之类的韬晦，就总会被作为战胜敌人保存自己的手段加以运用。在敌强我弱的情况下需要韬晦，在我强敌弱的情况下，也需要韬晦。然而也应看到，韬晦是一把双刃剑，在法制不健全的情况下，它也很容易被某些心术不正的人，用来对付自己人。韩愈所谓：“由来骨鲠材，喜（容易）被软弱吞”，指的就是这种事。这是不能不加以警惕的。但经验告诉我们：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这种现象又往往是防不胜防的事。要完全避免韬晦的滥用，只有在充分发扬民主、加强法制，彻底贯彻依法治国的情况下才有可能。

庄子消极避世的处世哲学，是当时残酷激烈的阶级斗争与政治斗争的反映。古人有“仕途乃蛇蝎汇聚之地”的说法。金字塔式的封建政体结构，越往上权力越大，越往上位子越少，你不下来，我上不去。做官是这种时代光宗耀祖和获取富贵荣华的唯一途径，同时也是惹火烧身惨遭杀身之祸的高效诱因。“避世”哲学不仅庄子有，许多思想家都有，只不过程度不同。孔子虽然是主张治国平天下的人，但也有“贤者避世，其次避地，其次避色，其次避言”；“天下有道则见（出来工作），无道则隐”，以及“邦有道则仕，邦无道则可卷而怀之（把本领收藏起来）”等说法。曹聚仁说：“这些人，有知识，有学问，但见了世乱难以挽救，便采取消极态度，不过问世事。”自古以来，中国文人多山水画山水诗，不能不说与此有关。留传下来的这些作品，是我们的一笔宝贵遗产，但对于那些为避世而完全沉浸于山水的作者来说，那代价也太大了！中华大地物华天宝，人杰地灵，一代一代拥有多少才智之士，他们本可以将更多的精力用于创造发明、发展经济、治理国家，却为“避乱世”，躲倾轧，免遭杀身之祸，而不得不将宝贵年华轻抛却！

封建专制制度统治了我们几千年，封建专制制度下形成的某些民族性格特征也左右了我们几千年。目前我们正处在一个历史大转变时期，新时期需要反映新经济新政治新文化的新的民族性格，新的民族性格的形成，既需要继承发扬我传统文化中的优秀健康部分，批判扬弃不健康的部分，也需要学习借鉴其他民族一切先进的部分。

当人们不再以“切当韬晦，无露圭角”为戒，而是以敢想敢说敢于竞争敢于充分发挥聪明才智之时；当人们的前途命运，不再由“乾纲独断”，而是由能力强弱、知识多寡、品德好坏、贡献大小等科学的民主的人事制度决定之时，必将是我堂堂中华，以最繁荣最富强最富有活力的姿态，屹立于世界民族之林，对全人类做出更大贡献之时！

（责任编辑：致　中）

林则徐澳门巡阅记

● 邱远献

为行使中国政府主权，林钦差巡阅“天朝疆土”澳门

林则徐是我国伟大的爱国者和民族英雄，也是我国开眼看世界的第一人。160年前(即1839年) 9月3日亲自巡阅澳门，不仅在中国近代史上有重大意义，而且也是澳门历史以及中葡关系史上的一件大事。

澳门自古以来就是中国的领土。1553－1557年间，葡萄牙人据澳门，此后又通过向明朝政府交纳地租和税饷，把澳门变成他们的居留地。1685年，清政府在广州设粤海关以后，允许来粤贸易的西方各国商人，在贸易季节以我们时间到澳门暂住，澳门又逐渐成为葡、亚、荷、英、法、美等西方各国商人的共同居留地。澳门又是广东沿海仅次于虎门海防要地，也是在中国封建闭关政策下了解外部世界的最重要的窗口。在1849年葡萄牙殖民者强占澳门以前，中国对澳门享有完全的主权。明清一直在澳门设置官吏、推行政令、征收关税、驻扎军队，有效地行使统治权。同时，明清政府允许葡人在遵守中国法律的前提下，享有一定的自治权；同意他们自设官吏，管理内部事务，驻扎少量军队，以资自卫；并在贸易上给予优待。当时中国高级官员，为了代表中国行使对澳门的主权，也通过澳门这个窗口。获得关于西方的知识，不断巡阅澳门，并成为一种惯例。

1839年时期的澳门，不仅是以英国为首的西方列强对华走私鸦片的据点，外国鸦片贩子藏身抵抗禁烟的基地，也是各国商人来华贸易的立足点。

林则徐有鉴于澳门的特殊地位，所以1839年3月10日他一到广州上任，便把澳门当作“重灾区”。3月18日林则徐在谕令英国领事义律缴烟之时，就饬令澳门同知密查中外烟贩行踪，并转谕西洋夷目委黎多遵守中国禁烟法令，自行查治。当澳门同知提获烟犯纪亚九，查出澳门山水园晏多尼夷楼公然售卖鸦片后，4月25日，林则徐当即谕令委黎多呈缴夷楼所贮烟土，并拟由省中委员密带纪亚九赴澳指认，还表示：“本大臣、本部臣（西广总督邓廷桢）一俟虎门收缴完竣，即当日赴澳门，一体查办。”6月3日至25日虎门销烟之后，以英国为首的鸦片贩子，并不甘心，一方面利用澳门抵抗禁烟，另一方面于1839年7月7日在九龙尖沙咀制造林维喜血案，并蓄意破坏中国法制，拒交凶手。为了对强横的英国侵略者稍示惩儆，8月16日，林则徐等命令封锁澳门，禁绝柴米食物运人，撤退买办、工人，进而驱逐义律和英人出澳。并与两广总督邓廷桢率员进驻香山县城，8月21日林则徐在致广东巡抚恬良的信中说：“澳门情况日来颇称严肃。”“日来急欲赴澳门一行。”

1839年9月3日上午，林则徐以清朝钦差大臣、两江总督的身份，会同两广总督邓廷桢巡视了澳门。其目的是：争取澳门葡萄牙当局宣布中立；清查华夷户口，搜查囤贮鸦片，以清敝薮；察看民情，抚

慰华夷居民。

中国居民“夹道欢呼”，澳门炮台鸣礼炮19响隆重欢迎

林则徐在来前正式通知了澳门葡萄牙当局将赴澳门巡阅。澳门葡萄牙当局十分重视，回禀表示要预设公馆，准备隆重接待。林则徐批示澳门知呈文，嘱转告葡澳当局：“本大臣奉命前来，专为查办公事，凡所驻扎之处，于地方州县，尚不许供应丝毫，况肯令夷人预备乎？该夷等总以恪遵训谕，谨守法度，即为良夷，毋得妄拟趋承，习为华靡。该署丞等务即传谕，严切禁止。”这表现了林则徐勤于国事，刚正廉明的一贯作风。

1839年9月2日，林则徐暨邓廷桢率众离开香山县前往澳门巡阅。

他们在陆上行走108里，在前山寨宿了一夜，澳门同知新驻守在那里。第二天即9月3日，“喜值天时晴雾”，又是林则徐55岁生日（农历七月二十六日）。他怀着既严肃又喜悦的心情，在日样早的时间里，偕邓廷桢率众从前山乘轿南行10里，到莲花茎，8时经关闸入澳门。关闸前，葡澳官兵百名列队欢迎，兵总四人，戎服佩刀，夷兵肩鸟枪，排列道左，队内箫乐齐作，导引入澳。

当地的中国居民在好几个地方搭起了牌楼，用绸花和写满颂词的对联装饰得堂皇雅致，在钦差大臣必经的道路上，人们在家门口和店铺门口摆上香案，上面堆满鲜花等物。这是为了表达他们对林则徐的感恩戴德之心。是他来戒除了他们的恶习，又销毁和禁绝了鸦片，从而将他们从一场死劫中拯救出来。

林则徐经过与实地考察三巴、娘妈阁、南湾各炮台的时候，均受到鸣礼炮19响的隆重欢迎。

澳门莲峰庙前的林则徐雕塑

驻节莲峰庙，在友好合作的气氛中中葡官员进行会谈

9月3日上午8时，林则徐一行到达望厦村后的莲峰庙，在那里驻节，会见澳葡官员。莲峰庙原是一座禅院梵刹，是澳门三大古刹之一。该庙入门正堂门楣上挂着1602年题刻的“中外流恩”的牌匾。在昔日，这里通常是华人商贾议事和中国官员驻节的处所。

本来城中的议事亭，是当时澳葡市政机构，在历史上曾作为中葡官员会谈的场所。在事前澳门当局打算在这里“预设公馆，虔洁铺陈，恭迎大宪驾临”。但林则徐对这次巡阅的要求是严禁华奢，不允澳葡当局隆重接待，因而澳葡当局放弃了在议事亭的接待计划，而以莲峰庙作为驻节和中葡官员会谈的场所。这可谓林则徐下车伊始便申明禁令和高洁廉明雷历风行的作风。

莲峰庙祀关圣，林则徐先在诸神前行香。之后用一张木

神台作临时办公桌，接见澳葡理事官和葡官员。澳葡理事官和葡官员进见时，“免冠曲身，意甚恭谨”。林钦差申明为维护中葡友好关系：(一)澳门不准囤藏鸦片等违禁品；(二)澳门不得收容通缉犯；(三)澳门要驱逐卖买鸦片烟犯和走私贩。葡方官员“点头领会”，表示遵守，并通过翻译声称：我们“仰沐天朝恩德二百余年，长保子孙，共安乐利，心中感激出于至诚，何敢自外生成，有干法纪。现在随日官宪驱逐卖烟奸夷，亦属会内当为之事。”

林则徐结束同葡方官员谈话时，当即赠送葡官员以绫绸、折扇、茶叶和冰糖等礼物，对葡兵则赏以牛、羊、酒、面、腊肉等物，洋银400元。并与澳门订立贸易章程，每年运人澳门茶叶连箱给50万斤，以3年为约。葡方官员“再辞乃委”，“以手柱额者三，敬谨退出”。

会谈进行了半个小时，自始至终，气氛热烈。体现了澳葡当局与中国的友好合作关系，在中葡关系史上写下了友好合作的一页。

澳门历史上中葡合作的首次正式人口普查

林则徐为了“一体查办”澳门鸦片，切实维护澳门主权，十分重视加强对澳门的户口管理，行使行政主权。

澳门究竟当时有多少户口？根据关天培在1835年1月（道光十四年十二月）的统计，住在澳门的我国人共五百余家，男丁一千余人，黑夷奴二百余人，英国人十九人，美国一、二人，法国七、八人。

4年之后有什么变化呢？林则徐在巡阅澳门之前，委派佛山同知刘开域、澳门同知蒋立昂、香山县知县三福、香山县县丞彭邦晦等，在澳门“仿照编查保甲之法，将通澳华一体按户编查，毋许遗漏，并请同该夷目（指葡澳当局）搜查夷楼有无囤贮鸦片。”全澳进行户口登记得到了葡澳当局的积极配合，经过认真仔细普查，当时全澳共有华人1772户，7033人；葡萄牙人727户、5612人。此外还有英国人57户，因流动性大，没有统计出人口实数。合起来，澳门人口总数为12000余人至13000人之间。这是澳门历史上的首次正式人口普查。

林则徐在掌握基本情况后，于1839年6月5日关于《杜绝鸦片章程》中议定：“照得本大臣，部党昨将澳门华夷一体编查保甲，业经派委该丞等会同妥办在案。”

林则徐亲临澳门巡视，抽查户口，责禁鸦片，自然是个重点。9月3日上午9时再次从莲峰庙出发后，入三巴门，经关前街、妈阁庙到夷商聚居的南湾一带，林则徐“督率随关抽查夷楼民屋”，看户口是否与登记的相符。林则徐这种点面结合，重点抽查的结果，其实际情况，均与册造相符。后又复加访察，该西洋夷楼实无存贮烟土情事。

这是一系列精确的数字，不但在当年禁烟运动中有实用价值，时至今日，也是中、外研究澳门历史者不能忽视的数据。是中葡合法的一次具有历史价值的人口普查。

为了进一步搞好对澳门的行政管理，林则徐根据澳门人口普查的经验，还计划今后“于每年秋间，照查现在编查之法，激饬澳门同知，督同香山驻澳县丞，编查一次，造册通详，再由督抚两司（总督、巡抚、按察使、布政布）分年轮替，前往抽查”。

林则徐强化中国对澳门的户籍管理，是行使国家主权具有深远意义的措施。他给道光帝的《巡阅澳门情形折》中，把自己的上述想法报告给了道光帝。可惜的是，道光帝认为“该处华夷杂丛，保甲之法难以施之，夷人且由日知县丞每岁编查，恐有名无实，易滋流弊。至督抚两司分年轮往抽查之外，亦涉烦锁。”未予批准。

视察澳门的城市风貌，体会澳门的风土人情

林则徐巡视澳门所经过的地方，除了当年外国人居住的集中地区，也是鸦片走私贩卖的中心地域之外，还有一些地方是澳门当年主要的商业

和文化中心。譬如花王堂、三巴门教堂、风顺堂。大炮台是当年澳葡最有名的宗教建筑，军事设施。三巴门教堂即圣保禄教堂，曾被誉为“东方的梵蒂冈”，1835年大火之后留下的牌坊仍是那么气势雄伟。澳门是天主教东方传布的中心，这些宗教及军事建筑是澳葡和外国人举行重大活动和仪式的场所。又如英前街等澳门的商业枢纽，昔日名行府店云集，四方行旅出人，车水马龙，熙来攘往。

林则徐要了解澳门，就得视察澳门最主要的、最具表象的城市风貌，体会澳门的风土人情。9月3日通过巡阅，他对澳门中西文化交汇的城市有了初步的认识。

他在日记中写道：“凡夷楼大都在目矣。夷人好治宅，重楼叠层，多至三层，绣闼绿牌，望如金碧。是日无论男妇，皆倚填衢而观，惜夷服太觉不类。其男浑身包裹紧密，短褐长腿，如演剧扮作狐、兔等兽之形。其帽圆而长，颇似皂役，虽暑月亦多用毛绒之类为之，帽里每藏汗巾数条，见所尊则摘帽敛手为礼。其发多卷，又剪去长者，仅留数寸。须本多髯，乃或薙其中，而留一道卷毛，骤见能令人骇，粤人呼为鬼子，良非醜诋。更有一种鬼奴，谓之黑鬼，乃谟鲁国人，皆供夷人使用者，其黑有过于漆，天生使然也。妇女头发或分梳两道，或三道，皆无高髻。衣则上面露胸，下面重裙。婚配皆由男女同择，不避同姓，真夷俗也。”可见，林则徐充分利用亲自巡阅澳门的机会，对西方人的屋寓、服色、发式装饰、礼仪、婚配等情况，无不一一认真观察，可谓细致而周详。

林则徐在巡视澳门过程中及其在此前后，充分利用澳门这个窗口，开启近代中国开眼看世界的新思潮。这也是他“欲制外夷者，必先悉夷情始”的一次重要的实践。他自己说过：“所得夷情，实为不少，制驭准备之方，多因此出。”当年，澳门出版的《广州周报》评论道：“中国官府全不知道外国之政事，又少有人告知外国事务”，“至今仍旧不知西边”，“骄傲自足，推慢各种蛮夷，不加考究。惟林总督行事全考上相反”。

林则徐巡阅澳门，从上午8时至11时，前后共3个小时，整个视查中，葡方的一一合作，3小时之巡视极一时之盛，林则徐等由南湾返前山，澳葡首领恭送玉关闸。林则徐等回到前山寨用午饭。饭后他们沿着同样的路线往北走，但不久就被暴风雨所阻。他们在离前山寨40里远的郑氏祠避雨。由于大雨使山路难以通行，林则徐、邓廷桢便在雍陌林中留宿了一夜，次日返回香山县。

林公丰功伟绩，永远值得人们纪念和崇敬

林则徐巡阅澳门后，及时于9月18日写了《巡阅澳门情形折》，向道光帝汇报了“巡视澳之实在情形”，“此次因查办鸦片，执法綦严，澳夷震慑天威，是以倍形逊顺。”10月11日，奏折送到了北京，道光帝看过之后，批“知道了”3个字。

林则徐是清朝历史上唯一以钦差大臣身份巡阅澳门的官员。前后时间虽仅有3小时，但他以清朝皇帝代表的身份，体现了当时中国政府对澳门主权管理的高度重视。同时还起到了争取澳葡当局中立服从中国法律、孤立打击英国侵略者、增强中国在外交上是一次成功的突破。在巡阅澳门期间，他拒绝一切礼品，在澳门葡人和其他外国人中间留下了极为深刻的良好印象。澳门炮台鸣礼炮19响，表达了极为尊重的“大礼”。当地中国居民，更是“感恩戴德”，“夹道欢呼”，大大增强了向心力和热爱祖国之情。

为了缅怀林则徐的丰功伟绩，1989年，在纪念林则徐巡阅澳门150周年的日子里，经澳门新闻文化界人士倡仪，莲峰庙值理会主席龚树根在众值理的支持下，在当年林则徐驻节，会见澳葡当局官员的莲峰庙前，建立了林则徐像，以供后人瞻仰。

（责任编辑：致　中）

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

● 马龄国

1980年初秋，在上海外语学院任教的中国比较法专家、名律师裘劭恒接到“火速进京”的通知。第二天上午,裘劭恒飞往北京,他到全国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报到时,被告知已内定任命为全国人大法制工作委员会副主任,要他与邹瑜（曾任司法部长、中华全国法学会会长）一起，代表全国人大常委会对外进行解答“两案”的一些法律问题。当时的工作,主要是翻阅由公安部调查取证、预审后送来的一迭迭有关林、江集团案的材料。每天上午8时前由公安部派专车 、专人,将有关档案放在裘的办公桌上,下午5时准时来收回,如在翻阅的档案材料里发觉有疑点，可另夹纸条附上,说明自己的意见，供特别法庭在审查时参考。

一个星期天的下午,特别法庭庭长江华告诉裘劭恒,经全国人大常委会批准,决定任命他担任特别法庭的法律顾问。裘劭恒耳朵重听,他告诉江华，对自己生理上的缺陷,感到力不从心。江华安慰他说,你参与审判东条英机等日本甲级战犯,又在东京美国第8军的军事法庭上陪审过轰动世界的涩谷案，与美国、日本等法律界名人打过交道,是见过大世面的比较法专家。这次公开审判林、江反革命集团主犯举世瞩目,我们的司法制度应逐步向国际接轨,所有的审判程序，都要以惯例进行，既要体现出讲社会主义民主,又要讲社会主义法制。特别法庭在审理过程中有不清楚的地方,要随时来向你咨询。

江华交代任务后,精神矍铄的裘劭恒说：“我遵照法庭的布置。我建议:审判台后面用紫红色的金丝绒帷幕,上悬挂国徽。审判席在国徽左侧,检察席在国徽右侧，让全国人大常委会第十六次会议任命的35位审判人员，24位检察人员全部到庭出席参加审理。特别法庭要成立律师辩护组，据说，彭真委员长已邀请一些刑法学家、名律师来参与特别法庭的工作。他们的席位应设在检察人员的左侧。在审判台的正下方，放一排高椅，用铁栏栅围住被告席。开庭前要在法庭内响两次铃声:第一次铃声，是武装法警进入庭内;第二次铃响,书记官入席，特别检察厅的正副厅长以及全体检察人员就座,同时特别法庭的正副庭长与全体审判人员鱼贯进庭,辩护律师也紧随着出来。”

裘劭恒还举出了几个其他国家对一些重大案件的庭审布置与程序的记载情况。

江华十分赞赏他的建议。

特别法庭在审理过程中，首先遇到的问题是江青不认罪，张春桥一言不发，对他们能否定罪?

我国刑事诉讼法第35条规定，没有被告人供述，只要证据充分确实的,可以认定被告人有罪和处以刑罚。因之,江青不认罪,张春桥在法庭上一言不发，都无关紧要，法庭在充分确凿的证据面前同样可以认定他们罪行。可是,特别法庭考虑到这次审判在我国历史上是破天荒的,审判的场面不仅国人会关注,而且世界各国也会踮足相视,就得使每一措施,都得找到国际上相关的判例。比如,起诉书指控江青直接控制“刘少奇、王光美专案组”,对刘少奇、王光美进行诬陷迫害,致使刘少奇遭

受监禁，被迫害致死。对此，江青在特别法庭上，不仅抵赖不认罪，而且咆哮公堂。庭上如果命令法警将江青押出去，是否有法律依据？庭长在判决时能否认定她的这一罪行？裘劭恒对上述问题都一一作了答复。

为了避免国际上一些站在我们敌对地位的国家，从审判江青上借题发挥，破坏我国声誉，攻击我国剥夺人权。特别法庭以特事特办的速度，把这些问题的材料放到裘劭恒的桌面上来了。裘劭恒早就得知江青关在狱中还十分嚣张的情况，预料到江青会不认罪的。裘劭恒想，倘若江青对一切所犯的罪行，往毛泽东身上一推了之，这怎么办？于是他在浩如烟海的美国联邦最高法院的判例中觅寻到一个类似的判例：1977年，美国北卡罗莱纳州夏洛特市逮捕了一个江洋大盗。法庭尽管人赃俱获，他却拒不认罪，还对证人威迫利诱，对法官辱骂不止。法庭命令将此猖獗一时的江洋大盗扌出去了，继续开庭，根据指控的罪行，依法判了他18年有期徒刑。裘劭恒将此英文版原件的判例，翻译成中文，第二天清晨就送到了特别法庭正副庭长手里。

同样，张春桥对证明他是上海反革命武装叛乱的主要策动者，依旧是一言不发，由于王洪文、徐景贤、王玉珍等原上海造反派头头都作了供词，国内证据充分确实，尽管张春桥拒不供认，法庭还是以事实为依据，依法认定了他的这一罪行。

韩学章与张中，是被告人姚文元的辩护律师。起初，他们为姚文元辩护是从反革命犯罪中主犯或是从犯的角度去思考的，后来读到了起诉书上指控姚文元为上海武装叛乱制造舆论准备这一条。两个律师查阅了有关证据，证明姚文元在天安门事件后虽然曾说过有关暴力的问题，但这与后来的上海武装叛乱并无直接关系，所以两律师准备在这个问题上为姚文元作无罪辩护。但此举事关重大，一时拿不定主意。这一棘手的难题，很快地又用书面传递到了裘劭恒的手里。裘劭恒认为，既然公诉人对姚文元指控的材料，不能证明其犯罪的事实，那末应该予以否定。

1974年，王洪文去长沙毛泽东那里，告周总理的状，裘劭恒认为这是工作范围的事，他向中共中央主席反映领导人的问题，不管是否正确均不构成犯罪。

另外，还有罪行被否定的是，特别检察厅指控江青同康生串通，由康生写出一份中共北方局“61个叛徒集团材料”的绝密件，由江青转送毛泽东主席，陷害中央一大批高级领导干部的事。江青否定后，裘劭恒看到了有关部门核实后的材料，认为这一罪行的证据不足，终于在特别法庭对江青的判决书上不再列为罪行了。

众所周知，吴法宪是紧跟林彪的。但他确实并不知道林彪的儿子林立果利用他交给的权力进行颠覆活动。他也未参与谋害毛泽东主席事件，也没进行反革命武装政变的活动。裘劭恒支持辩护律师的主张，吴法宪对以上这些罪行，是不该负刑事责任的。这种法理上的分析，得到了特别法庭的认可。

（责任编辑：仲　文）

欢迎订阅
1999年《大江南北》杂志

《大江南北》主旨：弘扬爱国主义精神和革命优良传统。特色：历史与现实结合，学术性与文学性兼备，主题深刻严肃，风格真淳纪实。

由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主办。大江南北杂志社地址：上海市中山东一路33号9号楼1楼。邮编：200002。电话：(021)63291031。

全国邮局办理订阅零售。邮发代号：4——443。每期订价：4.10元，全年49.2元。本社发行部亦办理订阅邮购。发行部地址：上海市茅台路690弄22号101室。
邮编：200336。
电话：(021)62333247。

一个革命家庭与反革命家庭的恩恩怨怨

浩望

一

1952年，为了巩固刚成立的新中国政权，全国各地都掀起了镇压反革命的政治运动。

长沙市梧桐里湖南省监狱在押犯洪宗扬被判处死刑。

处决之前，时任湖南省政府副主席谭余保的女儿谭木兰声泪俱下地要求父亲免洪宗扬一死。谭余保知道洪宗扬对自己女儿有救命之恩，而且抗战期间曾做过一些好事。但自己无权改变洪的死刑。此事报告到周恩来总理那里。周总理传下话来："洪宗扬是黄埔二期生。他的情况我知道。可以不杀，另行处理。"

洪宗扬被改判终身监禁，在湖南省耒阳煤矿新生劳改场服刑。

谭木兰为什么要营救洪宗扬？

二

谭余保，湖南省茶陵县舲舫乡洮水村人，生于1899年12月，世代务农。家境困难，仅读3年书即辍学。在家耕田种地，砍柴挑脚。闲时，与穷苦人家子弟一道学耍狮子，练习武功。因不畏权势，成为洮水狮子班的领头人。

1926年10月，中共地下人员来到洮水，以狮子班成员为骨干，开展农民运动。谭余保被推举为洮水乡农民协会主任。农会第一个打击对象，是他的姑母周谭氏。周谭氏是财主周大德的老婆，为人极为刻薄，当农民拥进她家杀猪出谷时，她自恃侄儿是农会的头头，破口大骂农民是"痞子"、"强盗"，被扭送到农会。谭余保的祖父跟着赶来，要求放人。不少人估计谭余保会袒护她。谭余保坚决按农会会员的要求，将周谭氏处决。1927年2月，谭余保加入中国共产党。

长沙"马日事变"后，他成为国民党反动派通缉的"暴徒"，12月底，跟随毛泽东率领的革命军上了井冈山。1928年回乡担任茶陵县苏维埃政府主席。1934年1月，率团参加在瑞金召开的第二次全国工农兵代表大会，当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执行委员。

1934年8月，工农红军从湘赣边界突围西征，由谭余保等组成新的湘赣省委，继续领导湘赣边界的革命斗争。这时"围剿"湘赣边区的敌人共6万多人，10倍于红军和游击队的数量。敌人长驱直入，分进合击，三里一碉，五里一堡，将原来连成一片的苏区分割成10多块。还强化保甲制度，实行"十家连坐"，推行"自新自首条例"。红军和游击队的钱粮、医药、弹药、被服及伤病员安置极感困难。几个月时间，省军区司令员彭辉明等大批指战员牺牲，省委书记陈洪时，政治保卫局局长刘发荣等相继叛变，整个湘赣革命根据地濒临崩溃的边缘。

在湘赣边界革命红旗将要倒下的危急关头，谭余保于1935年7月果断地通知四散的同志，到茶陵、攸县、莲花三县交界的棋盘山集中，召开有40多人参加的会议。他在会上分析形势，指明革命的前途，在与上级断绝联系的情况下，会议根据他的倡仪，撤销原有机构，成立中共湘赣临时省委和游击队司令部。他被推举为临时省委书记和游击队支队政委。他主持制定"保存力量，稳步发展，以待时机"的战略方针，起草《告群众书》。这次会议结束了当时湘赣边界的混乱局面，是湘赣边界革命从失败走向艰难发展的起点……

三

1932年，蒋介石对井冈山苏区发起了围剿，同时，派飞机助战。一天下午，谭余保家的房子被炸成一片瓦砾，母亲、妻子都被炸死；父亲被白军用枪捅死。谭余保8岁的女

儿谭木兰躲进一个三合土筑成的水缸才幸免于难。她从瓦砾中爬出来，望着鲜血淋淋的亲人尸体，大哭不止。

太阳下山了，暮色起了，逃上山的村民下山回村了。一位老爷爷告诉木兰："别哭了，到永新县去。你父亲在那里当了共产党的大官哩。告诉他，早早打回来，解放受苦受难的穷人们。"

她在爷爷、奶奶、母亲的尸体旁哭着坐了一夜。第二天清晨，老人催她启程："你亲人的尸体我们会掩埋的。"

木兰光着脚，步行五百余里，来到永新县城。她四处打听父亲的住址。

一天，她在街上走，忽见一个穿军装带手枪的高个子，挑着担从身边走过。仔细一看，不正是父亲吗？她飞跑上前，双手抱着父亲的腿："爸爸，爸爸！"一边大叫，一边哭。

谭余保很快认出了木兰："娇仔、娇仔(木兰的乳名)你受苦了。"放下担子，紧紧抱住衣衫褴褛、面黄肌瘦的女儿不放。

女儿向他哭诉着："爷爷、奶奶、母亲都被蒋介石的飞机炸死了。"

谭余保听了，跺着脚，大骂："蒋介石狗娘养的！我和你势不两立！"

从此，木兰随父在永新城里生活。

一天，谭余保对女儿说："娇仔，我带你见毛主席、朱总司令去。"

谭余保牵着木兰的手，朝坐落在城中心的列宁小学走去。来到列宁小学，只见大厅里坐满了"兵"；讲台上坐着几个"官"。有个会议即将召开。

谭余保牵着女儿走上讲台，来到毛主席身边："娇仔，叫一声毛主席。"

"毛主席。"声音充满孩子气又十分亲热；娇仔对毛主席鞠躬。毛主席爱抚地摸着娇仔的头。

"叫朱总司令。"

"朱总司令。"木兰鞠一躬。朱老总很高兴。

接着，娇仔又对方维夏、任弼时、甘泗淇、陈毅各位中央领导叫"伯伯、叔叔"，鞠躬。方维夏抱着谭木兰，用胡子扎她的脸，亲她。

娇仔的伶俐引起首长的兴趣。毛主席发话了："谭余保，你的女儿千里寻父，难得，难得。我的几个孩子都失散了，你的女儿却寻到了你身边。娇仔，娇仔，共产党的骄子，天之骄子！"

谭余保

四

1934年，中央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二万五千里长征。谭余保奉命留在苏区打游击。

冬天，谭余保领导的游击队与白军在棋盘山遭遇。白军以数倍的兵力围困了游击队。

白军的包围圈越来越小，子弹呼啸着从身边飞过。谭余保领头杀出一条血路。队伍终于冲出了棋盘山。他正要殿后出山，只听得女儿在后面哭叫："爸爸，爸爸。"谭余保心疼了，停住了脚步。女儿从柴草丛中奔过来，衣裤被荆刺扯得稀烂，腿上是一道一道的伤痕，鲜血直流。谭余保一手握枪，一手紧紧抱住女儿，进退两难。

"抓活的，抓活的！"白军围了上来。

警卫员谭冬仔急了："首长！革命利益为重！快跑！"

父女情深，谭余保岿然不动。

"抓活的，抓活的。"白军就在身边不远搜山，情势万分危急。

谭冬仔当机立断，箭步上前，从谭余保怀中抢过木兰，朝身边一丛冬茅窝扔去。

"首长，此时不走，更待何时？"

"娇仔！我对不起你，对不起你母亲、爷爷、奶奶！"谭余保痛哭失声，和谭冬仔一道冲出棋盘山……

娇仔被扔进冬茅窝，昏了过去。一个打柴人路过，发现了娇仔。打柴人把她背回了家。打柴人安慰她，问她叫什么名字？是谁家的孩子？

聪明的木兰说："我是个'土豪仔'，'掉羊'(绑票)过来的。"

打柴人是善良的山里人，决定将她送到白军里去。他想：白军一定会把她送回财主家。

打柴人将谭木兰送到国民党攸县凤岭乡(今柏市镇)乡公所。乡长朱贯群将木兰收留下来，安排在自己的情妇家。

半个月后，湘东铲共义勇队总队长的洪宗扬和太太何文秀来到朱贯群情妇家打牌——洪宗扬黄埔二期毕业后，在北伐军中加入共产党。后来参加红军，是红军著名将领方维夏的部下。大革命时，回攸县担任农民自卫队队长。当时，何健任湖南省省长，疯狂镇压农民运动。洪宗扬被捕，何健知道洪宗扬是黄埔生，很有军事才能，任命他为湘东铲共义勇队总队长——洪宗扬听说朱贯群收留了一个‘土豪仔’，吩咐领来看看。

朱贯群将谭木兰从里屋领出来。

“你家在哪里?你父亲叫什么名字?”

“我家在茶陵县乡下，我被‘掉羊’，没有钱交给土匪，父亲母亲都被土匪杀了。”谭木兰显出伤心的样子。

洪宗扬对谭木兰产生了恻隐之心，眼睛有点发红了。这时，站在一旁的洪宗扬的太太何文秀一把将娇仔搂在怀里：“这孩子给我做干女儿吧!”

原来洪宗扬和何文秀结婚七八年未曾生育，很想过继一个孩子。

谭木兰望了望朱贯群，似是征求意见。

朱贯群点了点头。

谭木兰对洪宗扬叫了一声“爸”，对何文秀叫了一声“妈”。夫妇俩非常激动。

从此谭木兰成了洪宗扬的义女，洪家给她穿好的、吃好的，爱抚十分周到。

过了不久的一天晚上，洪宗扬和谭木兰闲谈，问他一些过去的经历。谭木兰不慎说出了红军将领方维夏的姓名。

听到方维夏这个名子，洪宗扬大吃一惊：“哪个方维夏?你见过?”

谭木兰自知失言，但经不起义父的反复盘问，终于说破自己是谭余保的亲生女儿的真实情况。

洪宗扬不无紧张。过了一会，他坦然地对义女说：“这些情况今后要守口如瓶，千万不能对任何外人讲，讲出来了，你便有生命危险，连我这个当官的义父都很难搭救你了。”

谭木兰连连点头。

洪宗扬将娇仔取名洪木兰（解放后改为谭木兰）并带她回老家攸县漕泊乡拜见族人，扫坟祭祖。夫妇俩都很钟爱这个义女。有一回，木兰重病，夫妇延医治疗，悉心照料，终于转危为安。以后，洪宗扬又设法送木兰进入省立攸县师范附属小学读书。

五

1937年10月2日，国共两党为合作抗日达成协议，将南方8省13个地区的红军和游击队改编为新四军。10月下旬，陈毅奉命到湘赣边界开展改编工作，几经曲折，在九陇山找到谭余保。陈毅出示新四军副军长项英的信和党的《抗日救国十大纲领》。谭余保一听国共两党要合作，游击队要改编，火冒三丈，大骂陈毅是个叛徒，将其捆绑、禁闭起来，还用烟管敲他，口口声声要杀掉他。陈毅循循善诱地解释，谭余保半信半疑，当即派人按照陈毅提供的路线，找到新四军驻吉安通讯处证实，才深信不疑。他亲自给陈毅松绑，又用绳子将自己绑起来，向陈毅请罪。陈毅安慰他说：“你警惕性高，斗争坚决，做得对嘛!”后来，毛泽东谈起这件事，夸奖谭余保“粗中有细”。

遵照中共中央东南分局的指示，散驻在各地的湘赣游击队于当年11月集中到莲花县陇上，进行整训。整训毕，谭余保先后赴攸县等地和国民党当权者进行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谈判。《攸县文史》载：

谭余保等同志来攸县首先去洪宗扬家，是因为在此以前，茶、攸、莲三县铲共义勇队在“围剿”革命根据地的战斗中，谭余保的女儿谭娇仔与省苏机关部队失去了联系，由洪宗扬收留抚养……洪宗扬夫妇对娇仔的感情是好的，先到洪家和洪宗扬先谈谈，可增加会谈成功的可能性。翌日，洪宗扬陪同谭余保、谭汤池等同志去攸县县政府赴宴会谈。谭余保向对方讲述了中共中央建立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一致抵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宣言和抗日救国十大纲领；向他们提出三项具体要求：一、双方今后在言论上、行动上必须符合捐弃前嫌，合作抗战的原则；二、国民党攸县县政府应全部释放在押政治犯；三、应保障言论、集会、结社、通讯、出版的自由，充分发动群众一致抗战。洪宗扬发言赞同谭余保的意见。其他各人也表示赞成。

会议后，洪宗扬亲自动手打开牢门，释放了二十多名共产党人。这是木兰亲眼目睹的。1939年春，经张治中推荐，蒋介石委任洪宗扬为杭嘉沪抗日别动队中将司令。赴杭州前，洪宗扬秘密将12支步枪，200多个手榴弹，一门山炮，留给了苏区抗日游击队。

在攸县期间，洪宗扬曾陪同谭余保去攸县师范附小看望娇仔。这是棋盘山失散后父女的第一次相见。身着学生服的娇仔快步走上前，一声“爸爸”刚出口就大哭起来。谭余保紧紧抱住娇仔，又一次流下了英雄泪。洪宗扬站在一边也唏嘘不止。

谭余保要带女儿到根据地去，女儿想起可怕的游击队生活，摇头。谭理解女儿的心情，对洪宗扬说：“洪先生，女儿就继续由你扶养吧。”“你放心，我一定带好娇仔。”洪宗扬深情地回答。

1938年9月，谭余保奉命去延安，再一次来到攸县。他想带女儿到延安去。饯别小宴上，洪宗扬却依依不舍，抱着义女抽抽噎噎哭了起来。女儿也动了情，竟改变主意，不肯去延安。谭余保再一次放还女儿。(已75岁的谭木兰告诉笔者，当初由于一时激动，使自己失去了去革命圣地延安的机会，还背上了与

反革命分子洪宗扬划不清界限的罪名。几十次申请入党，都未获批准；直到1976年才解决组织问题。她不无遗憾地说："一'失足'成千古恨啊！"）

六

抗日战争胜利，蒋介石又挑起内战。谭余保、洪宗扬二人再次成为敌对人物。但对待女儿的态度，都很关心爱护。两个父亲一样情！

1949的8月，谭余保出席全国政治协商会议回到长沙，就派人到攸县接娇仔，安排她在"革大"学习。毕业后分配在湖南公安厅四处工作。这时的洪宗扬却因蒋家王朝的崩溃，回到老家漕泊乡务农；时局的剧变，使他感到前程渺茫，但一想到义女木兰的新生活，就感到高兴……

洪宗扬在耒阳煤矿服刑期间，他与后妻（与前妻何文秀离异）刘淑珍所生的女儿洪湘君因父亲的历史问题而找不到工作。她只身一人从攸县前往长沙，请谭木兰帮忙。谭木兰带她去见父亲谭余保，经谭余保亲自介绍、推荐，洪湘君被安排在湖南省制药厂工作。后来谭木兰介绍洪湘君与在长沙工作的高级农艺师龙望云先生结婚，建立了美满幸福的家庭。

谭木兰在湖南省公安厅工作期间，她和洪湘君都忘不了在狱中服刑的父亲洪宗扬，每年总要千里迢迢，去耒阳看望洪宗扬一两回，给他送点吃的、穿的。她俩曾一起照了个半身像，一张送给谭余保，一张送给洪宗扬。照片背后的题词是：

送给爸爸们留念

女儿　谭木兰　洪湘君

1963年5月15日

文革期间，谭余保（时任中共中央中南局常委）受到批判。挨批的主要原因是他与洪宗扬的关系。造反派在大字报中指责谭余保和洪宗扬"合伙"演出了"一出双保险的丑剧"。谭木兰此时也已陷入受批斗的困境，但她勇敢地写了《为"丑剧"说几句话》的答辩词寄给父亲，再转交造反派。王震听人说到该文的内容，赞扬"写得好，做得对。"

谭余保

1980年3月，谭余保在京逝世。木兰和湘君以及弟妹们将父亲骨灰迎放在湖南省革命公墓。

1975年，洪宗扬被大赦出狱，担任了攸县政协委员。笔者其时也是攸县政协委员，曾聆听洪宗扬在小组讨论会上激情洋溢的宣读《致台湾旧友的一封信》；这封信后来在福建前线广播电台播出后，效果很好。同年，洪宗扬在长沙参加了湖南省黄埔军校同学会，被选为理事，为统一战线做了很多有益的工作。

1993年91岁的洪宗扬在长沙去世，谭木兰将洪宗扬的骨灰送往湖南省革命公墓安葬。

青山不改，绿水长流。每年清明节，谭木兰和洪湘君都要到湖南省革命公墓祭奠两位父亲的在天之灵。

（责任编辑：刘　文）

欢迎订阅

安徽老年报

邮发代号 25－42　全国统一刊号 CN34－0051

《安徽老年报》创办之初，省有关领导出于尊老目的，确定给每位离退休人员赠订一份《安徽老年报》。专门发了皖老字[1989]17号文件和皖人退字(1992)第20号文件。离休干部订报经费在老干部公用经费中列支，退休人员按省人事局、省财政厅皖人字(92)07号文件规定，从退休人员活动经费中开支。希望离退休同志按此规定订阅《安徽老年报》。

欢迎各界为长辈订阅《安徽老年报》

欢迎企事业单位给困难老人赠报

2000年《安徽老年报》改为旬二刊，逢5逢10出版，每份单价0.30元，月价1.80元，全年21.60元。各地邮局均可订阅。

台湾探亲

● 戈 金

难去的台湾

去台湾探亲，可以说难上加难，为办理入台的手续，前后耗费了四个多月的时间。虽为中国的领土，比去欧洲、美国的申请时间还长，手续还复杂。台湾当局为了限制大陆同胞去台湾，蓄意设置了种种审核手续，还要大陆司法部门的公证处出具公证。为协助台湾的庶母为我办理入境手续，我在美国大学任教的大妹妹，专程到了台湾，好不容易才办好入境。

从北京去台湾要绕道香港，我事先与在香港教书的小妹妹打了电话，请她趁星期休息陪同我一同去台湾。

从香港到台湾，只要一个多小时，正当我思绪翻腾之际，空中小姐告诉旅客，飞机在下降。我从窗口眺望，郁郁苍苍的群山，在海岸线上，呵：到了，我一直在梦想的祖国宝岛台湾到了。

台湾的桃园机场又叫中正机场。在这儿办入境花费了二十多分钟，他把你的旅行证扣下，发给一个临时的身份证明。他们这样作的目的是防止你长期居留下来。

半个世纪后的会面

我怀着极为复杂的心情走进庶母的家门。整整五十年，半个世纪我才来到台湾给我父亲上坟，与我庶母相见。

1947年，晋冀鲁豫军区（刘伯承司令员、邓小平政委）情报处派我到北平作军事情报工作，我找到父亲，住到家里。那时庶母在北平四中教高中的历史，她是北师大历史系毕业的老教师，妹妹、弟弟都年幼，我与她们相处的很好。1948年11月，我在北平解放前夕，奉召回石家庄华北社会部汇报工作，与家人不辞而别，这一别就是五十年。

一进屋，见到庶母，感慨万端，她变化太大了，当年她体态端庄、丰腴，如今，怎么成了脊背佝偻、枯小的老太婆。我望着她，怎么也与她过去的形象联系不起来。她可能觉察出我的心思，一坐下来，就向我讲述来台湾后这几十年的生活，她不适应这里的气候，得了风湿病，后来脊椎骨作了大手术，腰挺不起来。这些年来，又添了膝盖疼的毛病，不能走路，弄得自己失掉生活的信心。我劝慰她，安心养病，身体会逐渐好起来的。为了转移她悲观的情绪，我向她讲述北京这几十年来天翻地覆的变化；讲她任教的北京四中，已成为北京尖子中学，毕业学生升大学的数字最高。她过去在北京上师大，然后教书，对北京有很深的怀念，她询问了北师大的情况，东单、西单、王府井的变化。越谈越兴奋，一直谈到深夜。

观音山祭父

到台湾头一件事，就是去观音山祭祀父亲，这也是庶母关心的大事。

父亲是1978年逝世。就在这一年，我与于树德商量争取父亲脱离台湾回归大陆。于树德是全国政协的常委，他与周恩来总理从年轻时就一起干革命。由他找到总理的秘书童小鹏，征得中央统战部的同意，我给父亲写了一封长信，寄给在美国的大妹妹，由她转给父亲。信发出后，很长时间不见回音，于树德大爷为此非常生气，后来才知道，这封信转到台湾时，父亲已经离开了人世。

清早，台北天空弥漫了一层薄雾，我在大妹妹和小妹妹陪同下乘车去观音山祭祀父亲。观音山在台北郊区五股乡，是一个不高的小山。大妹妹告诉我，给父亲买这座墓地花了30多万台币，拥有这个小山的农民都发了财。汽车从山脚下顺蜿蜒的上山路爬行，两边是松柏长青树。在汽车爬行到一个转弯处，我蓦地看见一个墓碑上“吴国祯”三个醒目的字，呵！吴国桢，这不就是周恩来提的那个吴国桢吗?!北平刚解放，电车厂着火，周恩来率公安、情报部门的领导去现场回来，向同志们说起了国民党重庆市长吴国祯，每当日本轰炸重庆引起大火他都亲自赶到现场。哦！吴

国桢也长眠在这里。

汽车爬行到半山腰时，大妹妹说:“到了。”司机把车停在路边，我们来到父亲的墓地。墓地由于有人定期清扫，显得整洁。墓座北向南，南眺豁然开朗。墓座是灰色大方砖砌成，四周是浅褐色瓷砖铺地。墓前为白条石的供案，上放一香炉。碑立墓后，碑后为三米多高石墙，墙上镶嵌着蒋经国题写的“谠论流徽”四个大字。

我环顾了父亲安息的地方之后，拿出从北京带来的香和烧纸，在妹妹们协助下点上香，点燃了烧纸，霎时，两眼涌出热泪，无限感慨，无限悲伤，我哀父亲从孙中山先生北伐，最后竟跟随蒋家王朝飘零到台湾，成为不能落叶归根的孤魂。……

戏谑李登辉

一次庶母谈起台湾的前途时，忧心忡忡地说:“令人担心，明的“台独”，暗的“台独”，相互勾结，不时的兴风作浪，一些老国民党员无能为力，新党还好，可他们目前还势单力薄。”老人叹了一口气，话锋一转:“这都怪蒋国经选错了接班人!这是最不能原谅的失误。当初他没有认清李登辉这个人，他叫李登辉假象蒙蔽了，李登辉熟谙官场的权术，善于迎合，听说初次晋见蒋经国时，只把屁股坐在椅子边上，以示诚惶诚恐地尊敬。关于蒋经国选定他作接班人，在国民党流传着一个笑话。就在蒋经国病入膏肓时，国民党几个核心成员讨论将来由谁来接班的机密问题。与会者提出几个人，讨论到了紧要关头，每个人都表了态，就等蒋经国一锤定音，这时，蒋经国急忙站起，他憋着一泡尿，急着要走厕所，一位没有眼力见的人追问:“你说是谁?”蒋经国一边走一边说“你等会，你等会。”他那带着宁波口音的话，与会人们都听成:“李登辉，李登辉。”

参观故宫博物院

对台北市的参观访问，大妹妹向我建议首先去故宫博物院。小妹妹一听要去故宫博物院，非常高兴，因为她从辅仁大学毕业后，头一次工作就是去的故宫博物院。她向我说:“由我来给你当讲解员。”

故宫博物院坐落在台北外双溪，是依山建起宫廷式的建筑，外观甚为雄伟。院内收藏多为宋、元、明、清宫廷的旧藏珍品，数量近七十万件，以陶瓷、书画、青铜器最为完整。此外有玉器、漆器、珐琅器、文具、雕刻、织绣、善本图书及满蒙档案文献。品类之多，品质之精，世无匹比。

这里收藏的是中华民族文化的瑰宝。其由来是1924年冯玉祥将军强制清朝末代皇帝溥仪迁出故宫，1925年成立了故宫博物院，将历代帝王继承之私有文物，回归到人民手中。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蒋介石把北平故宫博物院文物先迁南京，后迁四川，抗日战争胜利后又迁到南京。1948年，蒋介石反人民的内战失败后，又把故宫文物迁到台湾。

两位妹妹领着我去故宫博物院参观了一整天，中午在博物院对外餐厅吃的午餐。在参观中给我留下印象最深的是陶器和瓷器。在这里看到完整的中国陶瓷发展史，从五千年前的彩陶，三千年前的青釉陶片，秦汉的绿釉陶器到六朝的青瓷，直到驰名世界的宋代单色釉高温瓷和元代以后的青花、彩瓷。

琳琅满目的陶瓷器，数量之多，质量之精美，恐怕世界独此一院。我在往返浏览，突发遐想:等到台湾回到祖国怀抱，这些稀世珍宝，就应该名正言顺地回到北京故宫博物院他的老家了。

炎热的台北

台北市坐落在小盆地，气候异常闷热，尤其在七八月，高温经常在三十八、九度，令人喘不出气来。怪不得我来台北之前，在台北居住的朋友劝我，最好不要在七八月去台北，人受不了。到台北之后，躲在有空调的家里，只在推不了应酬时，才

作者在台湾

外出。一次，庶母执意要请我到台北有名的圆山大饭店去吃午饭，那天出奇的炎热，当妹妹们邀我在圆山大饭店的牌楼前摄影留念时，我感到地上像火烤，人站在烈日下难受极了。

台北市的各区分散几个小山脚下，集中地区街道狭窄，几乎没有人行道，因为在窄小的人行道上放满摩托车。在台北骑摩托车的人就像北京骑自行的人一样，到处都是。

由于街道窄，商店的牌匾，宣传标语，都悬挂在人行道的上端，这一点像美国纽约的华人区商店。

街道一般还清洁，就是行人走不到的窄街小巷垃圾随处可见。台北的公共交通设施，比北京好，各种车辆质量高，清洁程度、服务态度都比较好。

一天下午，小妹妹建议全家去一个北京饭馆去吃“北京抓饼”。这个饭馆的侍者都说闽南话，我一句也听不懂，我悄悄问庶母，怎么台湾不说国语？庶母面露愠色：“这都是李登辉搞的，我们来到台湾后，大力提倡说国语，李登辉上台后，为搞台独，倡导人们说台湾的闽南话，我也听不懂。”

台湾物品价格高过美国，北京饭馆，一盘炒面，就要你 95 元台币，折合人民币近 30 块。听说他们个人的收入高，至于高到什么程度，没有调查，不好发言。

忘根之徒

在一个偶然的场合，我与一位国民党的退役少将相见，他一听我是从北京来的，像见了亲人似的，抓住我的双手久久不放。这位原籍山东的将军，具有侠肝义胆的燕赵风骨，说起话来大嗓门透着豪爽。谈起台独来，他义愤填膺，他说：“一伙忘根之徒！ 他们不想想他们从哪儿来的，从他往上倒三代，看看他们的根在哪儿？……”

“没有中国传统道德，还搞政治，一开会大打出手，不是打得鼻青，就是打得脸肿，哪有一点政治家的风度，‘君子动口不动手嘛！’纯粹一伙政治流氓！”

谈到国民党的现状，他非常伤心，他是国民党老党员，他伤心现在国民党屈服于李登辉。

谈到台湾经济发展有今天，他有感慨地说：“一些人说到台湾经济繁荣，生活水平高于大陆就觉得不能和大陆统一，统一台湾就吃亏。他们哪里知道老蒋从大陆逃来台湾时，把大陆老百姓的黄金成吨成吨运来台湾，这笔债台湾还欠着大陆的呢?!

环游台北

一位知我来台北的阎先生登门来访，执意邀我环游台北。盛情难却，就乘他的车开始环游。先到阳明山公园，这是一个依山而建的大型天然公园，汽车直接开到园内，每到有景色的地区就停下来观赏一会，然后登车游玩。转完了阳明山公园又驱车去于右任陵。于老先生是我景仰的人，他的人品、书法为世人称道。他的陵紧挨公路，非常雄伟，我一边攀登，一边赞叹。阎先生寓意深长地说：“如果老先生现在逝世，就不能修这么好了。”

从于右任陵又驱车去金山。在路上谈起来，阎先生原是我河北省的同乡，当年随国民党撤退来台湾的老兵，后升为军官，退役后在台北经商。对老兵的情况，他非常了解，他说：“有一部分人退役后享受优厚养老待遇，忘了家也忘了国，这是可悲的。对国民党，对李登辉，不敢说个不字，我是老国民党员，我敢骂李登辉，我骂他不是中国人！”

车到金山，阎先生介绍到一家小吃店去吃烧鹅。这家小吃店像座小庙，一进门正面供奉着几位不知名的神仙，大厅里热气腾腾，排队买鹅肉的人群像赶庙会。阎先生说：“这里远近闻名，生意兴旺。”

我们坐下来，阎先生排队买来鹅肉，在品尝中我觉不出有什么特色，只好客气地说：“还好，还好。”

从金山又到淡水，阎先生忽然想叫我去看看李登辉的老家三芝，又绕到三芝，在返回的路上他说：“三芝西瓜好，咱买两个带回去，客随主便，我没说话，他在一个西瓜摊上买了两个西瓜。

新竹大龙虾

大妹妹安排我新竹一行。我有一位表妹在新竹，当年我来北平作地下工作时，她正在北平上中学，就住在家里，我庶母是她亲姨。她留给我的印象，不爱与人交谈。这次她听说我来台湾，打了几次电话，邀请大妹妹带我去新竹游玩。

我们带了点小礼品，上午九点从台北动身，近两个小时就到了新竹。

进到表妹家，一见表妹，我非常惊讶，她给我直观的印象判若两人，这种感觉不仅是容颜、体态，主要体现在风度、气质上，她变得那样豪爽大方。一交谈，才知道，她如今是新竹电视台的节目主持人，而且还是业余歌唱明星，五十年之别，更当刮目相看了。

表妹夫是国民党退役的老兵，在新竹经商发了财，他有了嗜好，收藏各国的货币。他兴致所至，就领我们观看他货币收藏室。

午餐，表妹早在一个酒楼订了包间，十二点，大家边谈边去酒楼吃午餐。看来这位表妹夫在新竹是个活跃人物，酒楼老板亲自出来照应。就座后，没有点菜，看来事先都安排好了。上的菜非常丰富，鸡鸭鱼都上了，其中最为突出的是大龙虾，一个大龙虾足够一个人吃的。这是见过的最大的龙虾。

饭后，大家又回到表妹家，在喝

茶的时候，拍照留念。大家相聚到下午四点，大妹妹提出该回台北了，这时，表妹拿出她的一张照片，在后面写下如下的诗句：

离别五十年，相聚匆匆
来也匆匆，去也匆匆
恍如梦境，梦也匆匆

花莲的观音

来到台北之后，应办的事，应访问的人，应参观的地方，基本上都完了，大妹妹最后动员我去台湾风景优美的花莲游览一天，怕我一个人寂寞，她找了一个表弟陪同我前往。找旅行社、订机票，都是大妹妹一手操办的。

那天早晨，我和表弟动身去机场，机场在市区，名之曰："国内机场"。在机场办登机手续时，一位年轻的小姐说："你们老人可以买半价票，你们在旅行社买的整票可以到他们那里去退。"表弟一算时间来不及了，就持整票办了登机。

飞机起飞后，沿着海岸飞行。这时空中小姐送来一杯热咖啡，我和表弟边喝边谈，一杯咖啡还未喝完飞机开始下降，时间不到半小时。到了花莲，一出机场就看到美仑大饭店来接我们的汽车，登上汽车不到一刻钟就来到美仑。时间还早，我们安顿之后，就去花莲市区游览。花莲是台湾有名的风景旅游区，台内、外来旅游的人很多，街道上熙熙攘攘的人群穿梭不断。商店的货物堪称丰富。这里出产的大理石闻名，人行道上铺设的是各色各样的大理石，这是花莲的一大特色。

表弟是河北省保定人，来到花莲他非要请我吃北方菜。为了找理想的北方菜馆，他一连三次叫了计程汽车到处去找，直到天色黑下来也没有找到理想的北方菜馆。最后只好在一家名为鲁菜的饭馆吃了一顿台湾味的鲁菜。

翌日清晨，吃过早餐，从美仑乘旅游大巴士去风景区游览，先到太鲁阁国家公园，去太鲁阁游览后，大巴士沿着在陡峭山崖开凿出来的汽车通道到神密谷，在一条宽阔的大铁桥上停下来，旅游的人们纷纷下车到桥下沙滩上去寻求各式各样的石块。据说这吉祥的石块，给人带来好运。然后，人们又徒步沿着山崖上开凿的小路去长春祠。长春祠上面的山里有一急湍泉水，流到长春祠形成水花飞溅的瀑布，非常壮观。人们在山泉流淌的清澈见底的水渠里洗洗手，洗洗脸，非常惬意。

游览完了风景区，大巴士又开到圣大法师在北投的农禅寺。在这个寺里收容了一些虔诚的佛教徒进行各种生产劳动。这里的工作环境清静，人们的精神状态良好，给人一种安祥的印象。

在临公路处，有一商品展厅，里面有很多各种各色玉石雕琢的艺术品。我去浏览时发现一尊白玉雕琢的观音像，形态自然优美，神采栩栩为生，我越看越爱。大妹妹是研究观音的专家，我想把这尊白玉观音送给大妹妹。我向女售货员询问价钱，她说 2600 元，在一旁的表弟说："这位是从北京来的客人，你就 2000 元卖给他吧。"女售货员笑了，她听说我是从北京来的，就爽爽地说："好吧！对北京来的贵客，我们让利。"我付了 2000 元，为大妹妹买了这尊白玉的观音像。

告别了台湾

离开台北的前一天夜里我失眠了，想了好多，我想到，父亲远葬海岛，能否魂归故里？九十高龄的庶母体弱多病，无亲人侍奉怎么办？妹妹、弟弟各人为了事业天各一方，何时再能团聚？台湾政治形势如此险恶复杂，何时才能实现统一，完成全国各民族人民的心愿？一个又一个问题，想来想去寻求不到答案，隔室望着天空的星斗，觉得台湾的夜好长好长。

黎明，庶母很早很早就起来了，在这离别之际，她的心情是悲伤的，从她翻来覆去询问大陆上的亲人上可以看出来。早饭后，到外地讲学的大妹妹打来给我送行的电话。我从电话里听出她激动的心情，她几次叫我保重。告别的时刻来了，当我对庶母说："我会再来看望您！"我看到她眼里噙住泪水，我忍受不住了，我像孩子似的失声痛哭。

小妹是个爱说爱笑的人，可是在送我去机场的路上，她竟沉默无言。当她帮我办理完登机手续，送我登机时说："祝您一路顺风，到北京后给家里来个电话。"我握着她的手，泪眼对泪眼，默默地相互祝福。

飞机腾空升起，瞬时钻入云端，我临窗下眺，隐隐望见台湾岛，我默默地自语："告别了台湾，我希望我再来时，只有欢笑，没有眼泪。……"

（责任编辑：吴　恩）

欢迎订阅《传记文学》

《传记文学》是国内外公开发行的传记类大型月刊。设有二十余个栏目，集知识性、史料性、趣味性于一体，16 开本，图文并茂，读者可以从中充分领略到人生的多姿多彩，也能体味到其中的苦辣酸甜。这里既有历史的兴衰更替，也有时代的风云际会。名人的辉煌与风采，寻常百姓的五味人生，让读者在真切感受生活中获得真、善、美的启悟。

《传记文学》邮发代号 82－370，每期定价 6.00 元，全年 72 元。全国各地邮局均可订阅，亦可直接向杂志社发行部订购。

地址：北京市丰台区万泉寺甲 1 号　邮编：100073

电话：(010)63457069

豫剧名旦赵晓梅

● 鲁　煤

今年6月1—3日，河南省文化厅和洛阳市政府在京庆祝豫剧大师马金凤舞台生活70周年期间，马金凤率洛阳市豫剧团演出三场戏。第一场，马本人主演她的代表作《穆桂英挂帅》。马金凤今年77岁，身心矫健如壮年，每年带剧团下乡演出200多场。而这一场演出，果然风采依旧，青春常在，给观众和同行巨大惊喜。众口一词，称赞为中华戏曲史上空前奇迹，可入吉尼斯世界记录，云云。人们渴望看她另两部代表作《花打朝》和《花枪缘》的演出。但她却把另外两场黄金时机完全让给了中年表演艺术家赵晓梅。这是为什么？

3日上午，在前门饭店，马派艺术研究会结束前，马金凤向到会的专家，学者致诚挚的谢意，最后谦逊地说："我能有今天，是多年来许多专家、编辑、记者把我'捧'出来的。我恳求大家，也像爱护、帮助我一样，爱护、帮助我们的年轻人，我的徒弟、学生。这次主演《情系小浪底》的年轻演员赵晓梅，不是我的徒弟，是我师姐阎立品的徒弟，我师姐'走'了，我有责任把她的徒弟带起来，让我师姐的在天之灵安息，所以我多给她向首都专家、观众演出的机会……"她说这番话时，一直激动得流着眼泪的。

赵晓梅，"文革"前夕以优异成绩毕业于洛阳戏曲学校，"文革"后在马金凤领导的洛阳豫剧团当演员。她攻刀马旦、花旦、闺门旦等各行当，青春年少，扮相、嗓音好，基本功扎实，很受观众喜爱。1993年，她看了豫剧五大名旦之一阎立品演出的青衣、闺门旦剧目《秦雪梅》《藏舟》等，被阎派艺术唱腔婉转甜润、表演含蓄端庄的艺术魅力倾倒了，迷住了。早在解放初期1954年，戏曲大师梅兰芳就曾赞扬阎立品"音色美，唱腔纯，扮相秀丽，表演深刻含蓄"，是"地方戏中少有的闺门旦"，并在天津把她和新凤霞同时收为徒弟，给予精心点拨，以致后来阎立品荣获"豫剧里的梅兰芳"美誉。赵晓梅觉得自己身材比较瘦小，脸型清秀，嗓子音质又和阎立品接近，认定自己适合学阎派戏，于是决心拜阎立品为师，全面学习"高精尖"的阎派艺术，以便自己得到系统的深造和提高。

马金凤幼年曾同阎立品同拜老艺人马双枝为师学艺，两位师姐妹关系亲密。马的合作伙伴何凌云（改编《花打朝》剧本的作家）也是阎的好友，她二人帮助实现晓梅的愿望，马金凤亲笔写了介绍信让晓梅去找阎。但阎对收徒弟要求非常严格，不仅看艺术才能，更看重人格和艺德，绝不随便收自己了不解、不满意的人。晓梅千方百计争取。当时，阎立品所在的河南省豫剧团先后在徐州、安阳、封邱等地流动演出，晓梅就自费追赶着剧团到各地去看阎立品的戏。后来，阎立品就吸收晓梅一起来

演出。经过将近两年的认真、多方考察，阎立品终于在1985年6月正式收晓梅为徒弟。

阎立品在1958年曾被错划成右派，"文革"中又横遭摧残，整整二十年脱离舞台，因此对自己的劫后余生抓得很紧，不仅自己多演出，而且要把自己的艺术完全传授给徒弟。为此，在1988—1989年一年多时间里，她约集包括赵晓梅在内的三位徒弟，组成河南立品剧社，赴安徽、山东、河北、河南各地流动营业演出，一边给学生排练自己的代表性剧目。阎立品大师，这位身材矮小，年近七十的老太太，每天带领徒弟过着最紧张的教学生活，早晨7点开始练功，上午、下午排戏，晚上公演后还排两个钟头戏。她在台上演出时，让学生在台下看，学生在台上演出时，她在台下看。针对学生的不是，一字一句地讲，一板一眼地教，一招一式地示范。讲如何从生活出发运用戏曲程式，如何把内心体验和外部体现统一起来。从老师的言传身教，赵晓梅不仅学会了阎派全部代表作《秦雪梅》《蝴蝶杯》《碧玉簪》《姐妹告状》《西厢记》等，还悟出了戏曲表演的基本规律，能自主创造了。一年后，剧社结束，晓梅又回到洛阳豫剧团，把同事们惊呆了：一是她在剧社的艰苦生活，使她体重由原来110多斤，降到90多斤，人都瘦得变型了；二是她的艺术实现了质的飞跃，令人耳目一新，刮目相看。

阎立品因劳致疾，患了胰腺癌，1990年住进医院，从此永远停止了舞台演出。1992年河南省领导为她在郑州举办舞台生活60周年纪念，阎派弟子们举行折子戏专场演出，赵晓梅唱压轴戏《秦雪梅吊孝》。当时，戏剧界同行都在为阎派绝艺是否有人继承下来而担忧。但当看到晓梅的演唱不仅完全能传达阎派神韵，有的细节还有新发展时，爆发了一阵阵狂热的掌声与喝彩，在28分钟的演唱中，竟达七次之多。演出结束，省委宣传部长于友先同志上台告慰阎立品："阎派艺术后继有人，青出于蓝啊，我们放心了。"前于1985年拜师时，阎立品曾题词勉励晓梅："艺术上能超师，方为继承人！"此刻，她病苦的脸上流着热泪，欣慰地笑了。她于1996年与世长辞。

赵晓梅饰秦雪梅

这些年，晓梅置身在马派艺术的宝库之中，早已学会了与阎派风格迥异的马派帅旦、泼辣旦、老旦行当的代表作"一挂二花"，成为与阎派剧目轮换上演的保留剧目。她和许青枝等马派弟子、学生一起，被社会公认为最有实力的后继人之一。马金凤以代师姐阎立品"托孤"的心情培养晓梅。每逢出席演唱会，马金凤总是这样向听众介绍晓梅："我的学生比我年轻，嗓子好，比我唱得好。"器重和寄予厚望之情，溢于言表。

晓梅在继承前辈的基础

上，创建自己的独特风格，已演出过大批其他剧目。她这次主演的现代戏《情系小浪底》饰演一位农村女支书，带动村民迎向新生活，完成移民任务，在表演和唱腔上，融合阎派、马派两家并加以发展，呈现出细腻深刻与雍容大方、泼辣奔放相结合的、成功创造的大家风度，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

近十年来，她于1994年成为中国剧协会员，曾先后五次获奖，《河南日报》发表评论，把她这位后起之秀和自解放初期就享有“洛阳牡丹”美誉的马金凤大师联系起来，称为“洛阳牡丹又一枝”。台湾《中州剧艺》连续三期发表赞扬她的文章及多幅照片。中国唱片社及上海分社灌制了她主演、主唱的盒带和唱片向国内外发行。去年华东五省声乐教学研讨会在上海音乐学院举行，特邀晓梅讲授豫剧音乐。她的“金嗓子”在演唱中把真假声结合、由低音到高音转换不露痕迹、浑然天成的技巧，引起音乐大师周小燕及从美国回来的专家啧啧称奇，说这是他们正在研究解决的课题。

赵晓梅集两派艺术于一身同时肩负双重的重任。如今她是阎派艺术硕果仅存的唯一传人！阎立品生前没有拍过一部电影，据说录相艺术片也很少。这就需要趁赵晓梅正当壮年，把学到的阎派杰作原封原样、原汁原味地拍成电影和录相。这是抢救国宝，当务之急。梅兰芳先生生前曾由吴祖光先生指导拍摄《梅兰芳舞台艺术》电影片，当年人们对影片褒贬不一，但今天已成为最为珍贵的无价之宝，另外，马派代表作于80年代曾拍成电影，但限于当年条件，有的摄制有嫌简陋，今天进行录相是完全必要的。赵晓梅如何把马派进一步学到家，甚至像学阎派那样青出于蓝，使这些经典代代相传，也是豫剧剧种发展的要求。当然，晓梅更要取百家之长，排演新戏，发展个性，独创新声。晓梅正肩负重任，奋战在继承与发展的前沿上！

（责任编辑：致　中）

代购代邮

一个时期以来，函询季羡林、李锐、韦君宜等同志作品的读者日益增多。为方便读者，现就以下书籍本社开展代购、代邮服务：

书　名	作　者	定　价	邮费
牛棚杂忆	季羡林	19.50	3.00
思　痛　录	韦君宜	13.00	3.00
百年聚焦	史义军	59.80	6.00
世纪三伟人	龚育之等六人	28.00	4.00
我亲历过的政治运动	萧克 李锐 龚育之等	28.00	4.00
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	戴　煌	28.80	4.00
直面人生	戴　煌	19.80	3.00
毛泽东与莫斯科的恩恩怨怨	杨奎松	29.80	4.00
冤假错案是这样平反的	何　载	15.00	3.00
大转折的日日夜夜	张湛彬	80.00	8.00
石破天惊	张湛彬	29.00	4.00

（**《石破天惊》**记叙了以下内容：胡耀邦为什么要给右派平反；陈云为什么提出康生有问题；为什么只有290名中央委员、候补中委参加十一届三中全会；华国锋是怎样离开最高权力顶峰的；僵化的计划经济体制是怎样一步一步被突破的。）

欲购者可直接将书款汇至炎黄春秋杂志社。

社址：北京东城区戏楼胡同1号　邮编：100007　收款人：炎黄春秋杂志社发行部

炎黄春秋

习仲勋参加国庆五十周年庆典后返回深圳

著名法学家[illegible]

20年前中科院民主选举学部委员纪实

为中美友谊奔波终生的罗森夫妇

张学良引为知己的中共代表刘鼎

不容抹煞的思想遗产

鼓励记者讲真话

谈韬晦

ISSN 1003-1170

11

国内统一刊号：CN11－2581/K

邮发代号：82－507

定价：4.80元